

AOMENXINSHIJIAO

第34期 2024年5月
ISSN 1995-8250

澳門新視角



《澳門新視角》 第三十四期

總編輯：劉成昆

副總編輯：江 華

出版者：澳門青年研究協會

電 話：（853）2852 6255

傳 真：（853）2852 6937

電 郵：macaomyra@gmail.com

網 址：www.myra.org.mo

創刊日期：2007.11

出版日期：2024.05

封面設計：劉新宇

印 刷：嘉華印務

發行數量：500 本

定 價：非賣品/Not-for-sale

編者的話

今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七十五週年以及澳門回歸祖國二十五週年的“雙慶之年”，也是澳門“一國兩制”實踐進入中期檢討的重要時間節點。在新的時代背景下，中央因應國內、國際發展新格局，根據澳門“一國兩制”實踐的經驗以及實際情況，對澳門“一國兩制”實踐提出了一些新的要求。除希望澳門繼續堅定不移、全面準確地貫徹“一國兩制”方針外，還希望澳門能不斷增強治理能力，提升治理水平，促進經濟適度多元發展；同時主動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積極助力國家對外開放，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更好發揮作用。本期《澳門新視角》刊載的多篇文章均與上述主題相關，是對中央對澳門“一國兩制”實踐新要求的積極回應。

《澳門新視角》

副總編輯 江華

二〇二四年五月，澳門

目 錄

編者的話	江 華
博物館數字化與館際交流合作——以故宮博物院為例	雷文昌 李 略 1
企業綠色行爲如何溢出影響員工工作、公共和居家綠色行爲？	
——基於認知—情感加工系統理論視角	莫紫瑩 馬 裕 劉丁己 11
房地產企業績效風險的影響因素研究	
——基於我國上市房地產企業資料的實證研究	周 團 李 新 24
澳門婚育政策探討	余惠鶯 黃翠萍 張 雲 36
佛港澳跨境數據規則銜接的現實困境與法治進路	鍾浩忠 馮澤華 43
結構重塑：粵港澳大灣區公共衛生應急管理協同理念的調適理路	劉向東 52
區域合作與澳門高等職業教育發展路徑	高勝文 61
澳門普通學校教師特教教學調整之質性分析：	
基於特教專業知能與學校行政支持的影響	董志文 73
從社會理論的視角談自殺行爲及預防策略	羅琨瑜 82
《澳門新視角》徵稿啟事	90

博物館數字化與館際交流合作——以故宮博物院為例

雷文昌¹ 李略²

摘要：博物館作為歷史文化的一個重要載體，在一個國家和地區的文化建設中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要充分發揮博物館的作用，數字化與館際交流合作必不可少。本文通過分析故宮博物院的數字化進展、面臨的挑戰及交流合作的成效，認為博物館的數字化與館際交流合作，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互補，並提出相關政策建議，包括：大力宣傳數字化的豐富功能、講好數字化文物背後的歷史故事、製作精良的解說視頻、整合數字化應用、加強博物館間的交流合作、注重生活場景的重現、重視影視劇的創作和大力開發文創產品等。

關鍵詞：博物館；數字化；館際交流合作

前言 文化強國建設與博物館功能的發揮

2020年，中國共產黨第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了到2035年建成文化強國的遠景目標，2022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和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十四五”文化發展規劃》明確指出，“文化是國家和民族之魂，也是國家治理之魂”，提出建設文化強國的措施之一就是要完善公共文化服務體系，“推進……博物館等公共文化場館免費開放和數字化發展”。

博物館作為歷史文化的一個重要載體，在文化強國建設中占據重要作用。國際博物館協會（2022）對博物館的最新定義指出：“博物館是為社會服務的非營利性常設機構，它研究、收藏、保護、闡釋和展示物質與非物質遺產。它向公眾開放、具有可及性和包容性，促進多樣性和可持續性。博物館以符合道德且專業的方式運營和交流，並在社會各界的參與下，為教育、欣賞、深思和知識共享提供多種體驗。”

要達成博物館的上述目標，數字化與館際交流合作必不可少，本文以各地故宮為例，採用案例分析、比較分析、深度訪談等方法，分析內地及港澳臺博物館的數字化的進展、挑戰及交流合作的成效並提出相關政策建議。

一、博物館數字化的主要內容

¹ 雷文昌，澳門理工大學人文及社會科學學院公共管理碩士研究生。

² 李略，澳門理工大學人文及社會科學學院教授，澳門新視角學會副會長。

在信息技術的大潮中，博物館的數字化為其上述功能的實現提供了極大的便利。博物館數字化，是指博物館各個工作方面全面地採用數字技術、信息技術為常用工具，使電腦成為日常的工作平臺，更高效地為文物的保存和利用服務。博物館數字化是為適應當代信息化社會而對博物館功能、組織、工作的再定位（祝敬國，2016）。

博物館數字化涵蓋了文博工作的收藏、保管、研究、陳列、教育、市場等所有的工作內容。例如，文物保管中的出入庫管理、盤點工作，文物修復工作的色彩輔助分析、碎片輔助拼綴，陳列展覽的虛擬展示和安全防範，文物存放環境的溫濕度監控等等（祝敬國，2016）。

另一方面，數字化博物館是以博物館物理實體為基礎，在信息網絡平臺上建立的一個信息服務體系。數字博物館是物質博物館在數字網絡空間的再現和反映，具有網絡化、智能化、虛擬化的特點，有時也被稱為虛擬博物館。這些概念的涵義大多是重合或相近的。

關於博物館數字化建設，國內外已經有一整套成熟的理論體系。有學者總結美國博物館數字化建設的六大內容是：博物館網站、數字化博物館、講解導覽及虛擬模擬系統、數字化圖書館和辦公自動化系統、藏品數據庫系統。發現博物館數字化建設中高科技和高素質的人才支撐、國家重視博物館的數字化建設、以及多種途徑的經費來源，為數字化建設提供資金保障是美國的博物館數字化建設的優勢（王裕昌等，2013）。也有學者認為博物館的數字化建設首先是對博物館資源的數字化，當然這是以藏品為中心的數字化，但其目標是以觀眾為中心的服務數字化，必不可少的是管理數字化，這樣就漸漸形成了博物館的數字保護（以藏品為中心）、數字服務（以觀眾為中心）、數字管理（以人員為中心）三大板塊的工作（趙豐，2022）。在世界各大博物館數字化建設中，也大多是按照這樣的思路來進行。

二、兩岸四地故宮數字化建設與館際合作的進展

北京故宮是世界上規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木結構宮殿建築群，建立於其上的故宮博物院，占地 112 萬平方米，藏有超過 186 萬件文物，成為中國博物館的代表。目前，北京和港澳臺地區擁有多座展示著故宮文化和故宮珍貴歷史文物的展館。

（一）北京故宮與故宮北院

清朝遜帝愛新覺羅·溥儀遷出紫禁城後，大批宋、元、明、清之稀世珍品留於宮中，構成故宮博物館館藏的基礎。之所以稱為基礎是因為故宮博物院的文物不僅僅來源於紫禁城中的文物，還收藏了其他皇家禁地中宮觀、壇廟、園林、行宮、圍場、陵寢、王府等地中的眾多珍貴歷史文物等。根據清宮檔案記載，清朝末年，清內務府就曾陸續將北京西郊萬

壽山清漪園、香山靜宜園、玉泉山靜明園等皇家園林中一些不常用的宮殿室內陳設移至紫禁城保管。

長期以來，北京故宮博物院受空間和條件的限制，展出文物約 3 萬件，僅占故宮 186 萬件文物藏品的 2%，無法展示故宮珍貴文物的整體面貌，特別是大量大型珍貴文物（如家具、地毯、巨幅繪畫、鹵簿儀仗等）因場地局限而長期無法得到及時、大規模的科學保護和有效展示，同時受到文物建築特性的限制，衆多文物藏品得不到及時的保養和修復。爲解決這一問題，北京故宮博物院於 2022 年在北京海澱開工建設故宮北院，選址三面環水，與北京西郊的“三山五園”相鄰，皇家園囿宮城一脈相承。

北京故宮除了建設故宮北院以外，數字化建設也成效顯著。

故宮博物院從 1998 年開啓數字化建設，積累了豐富的數字化經驗和成果。

北京故宮的數字故宮社區基本架構分八個方面（馮乃恩，2017），分別是社交廣場、文化展示、資訊傳播、參觀導覽、學術交流、公衆教育、休閒娛樂和電子商務八個功能板塊。在網站內容方面，北京故宮的官網頁面包含 8 個專欄，分別是首頁、導覽、展覽、教育、探索、學術、文創和關於（主要是介紹故宮博物院的歷史和機構設置等）。

故宮博物院數字影像資源管理在 20 年的發展歷程中取得豐碩的成果（石秀敏 2022），數字影像資源管理覆蓋影像采集、加工、檢索和利用的全生命周期，故宮博物院通過使用科學成熟的信息化建設方法論，引入穩定可靠的新技術，構建起一套規範、高效、可擴展的數字影像資源管控和服務體系，對博物館數字影像資源管理具有借鑒意義。

故宮博物院 2015 年推出每天更新一件院藏文物的《每日故宮》、2016 年推出隨時隨地“雲逛展”的《故宮展覽》兩款手機 APP 應用。2022 年發布《紫禁城 365》APP，爲廣大觀衆線上欣賞故宮美景、瞭解故宮古建築文化增添新窗口。該應用通過美圖、答題、知識、故事四種體驗形式，貼合當下移動閱讀習慣，多角度詮釋紫禁城建築文化，全方位展示故宮文化遺產保護研究成果。

爲了進一步提升日常管理工作的數字化深度，故宮博物院 2022 年與釘釘（中國）信息技術有限公司簽署戰略合作協議，共同探索故宮數字化辦公新場景。2023 年故宮博物院還與騰訊集團開展跨界合作，利用數字科技爲博物館賦能，建立“故宮·騰訊聯合創新實驗室”，進一步激活、強化、釋放博物館的力量（蘇怡、張沛沛，2022）。故宮博物院院長王旭東（2021）對數字故宮 20 多年來的工作概況進行了非常全面的梳理和系統介紹，特別提到昨天、今天和明天三個不同時期數字故宮的建設，“數字故宮”的總體目標是利用先進的信息技術，遵循真實、完整、可用的數字資源長期保存原則，更好地保護和展示古老的紫禁城文化遺產，助推文化資源的全人類共享，是 21 世紀故宮博物院發展建設的重要目標。

（二）臺北故宮

1925 年，故宮博物院在北京開院，之後因抗日時期北方情勢緊張，文物南遷避難。幾經輾轉，最後在臺北安定並於 1965 年建立了臺北故宮（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重新開

放。博物院正館為中國傳統宮殿式建築，樓高四層，綠瓦黃脊，與館藏珍寶相互輝映。從此開始，中國出現了一南一北兩座故宮，許多精品文物離開了故土北京，至今無法團聚。

臺北故宮因應數字時代來臨，首要任務是要將近 69 萬 6,344 件文物予以數字典藏，從 1997 年起，逐步建立起 21 個資料庫，無論在文物管理、預防性維護、展覽規劃與設計、教育推廣、研究出版、新媒體數字藝術製作、文創開發及觀眾服務等業務上，都提升了效能與品質，讓故宮豐富精緻的典藏，在資訊科技襄助下產生更大的價值與影響，也徹底改變了故宮原有的作業方式與思維（馮明珠，2015）。

也同樣是在 1997 年，故宮博物院架設了中、英文雙語全球資訊網，並陸續增加日、韓、法、德、西、俄及阿拉伯文等至九種語文版；此外，二〇〇二年十二月始，故宮發行中、英文版“故宮電子報”，7 陸續推動各種文物數位學習、開放典藏資料庫，並製作超過 300 個主題網站及環場虛擬展示等，觀眾可通過電腦設備，彈指之間盡覽之，故宮儼然已成為一座無牆博物館。

臺北故宮博物院的官網分為參觀、展覽、活動、典藏、學習、出版、研究七個板塊。值得注意的是臺北故宮自 2022 年 12 月 28 日起，在典藏數據庫中開放院藏書畫類、器物類、織品類文物低階圖像（100 萬畫素）計約 40 萬幅，無須申請、不限用途、不用付費即可公開使用，且不須注明出處。自 2023 年 12 月起，開放中階圖像（600 萬畫素）計約 40 萬幅，中階圖文件及網站文字均無須申請、不限用途、不用付費即可公開使用，臺北故宮在未來將持續落實開放數據政策，配合數字化進程開放其餘圖檔，給研究人員和有興趣愛好的人們提供了極大的方便。同時網站中還有一些關於重要文物的短視頻介紹。

臺北故宮博物院還可對館藏史料（尤以清宮檔案居多）進行個性化的文獻計量分析和共現圖譜分析，共現圖中關聯綫越粗代表字詞出現頻率較多，越細則表示字詞出現頻率相對較少。人們也可以按照不同歷史時期進行資料檢索，也可以通過關鍵詞查閱檢索各類資料檔案，這是北京故宮和香港故宮等沒有的。

（三）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

隨著時代的發展，我國除北京故宮及北院、臺北故宮以外，又興建了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

2022 年 7 月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正式對公眾開放，坐落在香港特別行政區油尖旺區西九文化區博物館道 8 號，來自北京故宮博物院的 914 件珍貴文物在香港故宮展出，當中部分藏品更是從未對外公開展出。這也是北京故宮博物院建院以來，規模最大、級別最高的文物展覽。

香港是中西文化交流融合之地，紫禁城是明清兩代帝王與後妃的主要居所，來自北京的精美的文物讓港澳地區的觀眾瞭解紫禁城內從清晨到夜晚的生活點滴，探索宮城內人員豐富的物質與精神世界。故宮文物是中華民族五千年的精粹，文物是教育非常好的載體。香港故宮的建成對於促進香港與內地的文化事業融合發展，讓香港的文化發展融入國家文

化發展大局，同時將中華傳統文化傳播給世界觀眾，助力香港發展成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都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香港故宮開館後，故宮博物院陸續提供《紫禁城·天子的宮殿》、《養心殿》、《靈沼軒》和《韓熙載夜宴圖》等 7 部虛擬現實（VR）節目，以高精度數字影片形式向香港觀眾更直觀展現故宮文化遺產古建築群和院藏文物。故宮博物院還提供了《月朗風清暮合紫禁》、《八大作》、《故宮新事》三部視頻專題節目，聚焦故宮文化遺產保護成果，以便香港觀眾瞭解到故宮博物院古建修繕、文物修復等非物質文化遺產以及學術研究最新理念與成果。

在參觀展廳中精美文物藏品之餘，意猶未盡的觀眾朋友可繼續通過故宮博物院官網（www.dpm.org.cn）、“數字故宮”小程序和“故宮出品”系列 APP 隨時隨地“雲遊故宮”。

“全景故宮”讓觀眾足不出戶，在香港就可沉浸式體驗故宮宮殿建築的宏偉壯觀與精工巧做。“數字文物庫”裡展出超過 83,000 件各時代不同類別的故宮精彩文物。觀眾可以在“故宮名畫記”仔細欣賞品味院藏珍貴書畫影像，包括《清明上河圖》《千里江山圖》共 600 餘幅作品。“每日故宮”APP 每日甄選一款館藏珍品，“故宮展覽”APP 讓香港民眾可以隨時走進故宮看展。

（四）澳門藝術博物館的故宮文物展覽

在澳門特別行政區，澳門藝術博物館經常展出來自故宮的文物。2023 年 12 月，“吉祥殊勝——故宮與扎什倫布寺珍藏文物展”在澳門藝術博物館揭幕，展出故宮博物院和扎什倫布寺的 137 件珍稀藏品，為觀眾帶來歷代班禪及宮廷佛教藝術專題展覽。展覽分別以“從須彌福壽之廟至紫禁城”、“來自扎什倫布寺的藝術”、“六世班禪的遺珍”三個單元，引領觀眾走進歷史深處，感悟藏傳佛教悠久歷史的文化積澱和藝術瑰寶的歷程。展品中以六世班禪赴京覲見乾隆帝的相關文物最受矚目，觀眾可從皇帝冊封班禪的金印金冊、乾隆皇帝與六世班禪之間的貢賜往來文物、佛像敕文等，見證清代西藏地區與中央政府的密切往來。在此之前，澳門藝術博物館還展出了“紫禁城裡過大年”主題展覽，依托北京故宮博物院館藏文物資源，兼顧學術性和通俗性，通過仔細研讀清代檔案史料，展出與春節元宵節有關的歷史文物，讓觀眾體驗皇家、宮廷的真實節慶活動。

澳門藝術博物館還常年在線上展覽故宮的有關主題文物，例如：賀歲迎祥——紫禁城裡的春節文化、禦瓷菁華——故宮博物院藏明代禦窯瓷器展、一代昭度——故宮博物院藏清代帝后服飾等，使得大家可以隨時重溫精美的文物展品。

澳門藝術博物館具有線上 VR 虛擬導覽功能，提供繁、簡、葡、英四語介紹，公眾可透過電腦或手機裝置，掃描指定二維碼（QR Code）或登入文化局線上虛擬參觀網站（vr.icm.gov.mo），只需滑鼠點擊或屏幕觸碰，便可以自在暢游各個展廳，觀賞廳內 360 度環境，通過點擊展品位置，即可瀏覽展品高清相片，同時查閱文字說明，隨時隨地線上參觀博物館。

（五）文物資源數據庫

正如上文所介紹，兩岸故宮的數字化建設和數字博物館建設都取得了不錯的成績，國家文物局（2017）發布的《第一次全國可移動文物普查工作報告》中也提到，建立文物資源數據庫和文物身份證制度，改變過去各單位文物信息零散孤立、互不相通的信息孤島局面，實現全國國有可移動文物信息的統一集中存儲。登錄文物照片 5,000 萬張，數據總量超過 140TB，有效構建全國可移動文物大數據。但是如何讓這些數字化資源物盡其用，發揮出最大的價值，並且隨著時代的發展煥發出新的活力，而不僅僅是將其變成數字代碼，成為塵封的歷史標本，甚至某一天由於存儲媒介的變更而導致丟失，這應該是後續更進一步探討和研究的，也是我們這個時代所肩負的使命。

三、博物館數字化的挑戰與建議

（一）加大宣傳博物館數字化的豐富功能

作者針對 211 工程院校的在校大學生進行隨機街頭採訪和問卷調研，問卷調查顯示，90%以上的受訪者表示不知道故宮博物院官網有上述功能，甚至從未登錄進故宮官網瀏覽或查閱資料。只有不到 5%的學生登錄進故宮官網瀏覽過，但目的也是為了看有什麼展覽或者購票，並沒有仔細瀏覽研究，即便知道有這些功能，平時也不會花時間去觀看，或是走馬觀花的簡單瀏覽。大學生尚且如此，其他學歷和社會階層的人員可想而知。

因此要進一步加強宣傳，使得民眾更加瞭解博物館數字化的豐富功能，以便發揮更大作用。特別是對於青少年學生，鼓勵他們更多的瞭解使用博物館的數字化資源，讓學習參觀博物館在全社會蔚然成風。

（二）講好數字化精美文物背後的歷史故事

對瀏覽過故宮網站的人們的訪談中，我們發現大家認為數字化藏品庫的功能還有不足。它雖然可以高清晰展示了大量文物的細節全貌，但文物背後的歷史故事、創作背景、原有承擔的歷史功能都沒有詳盡的介紹，人們對於這些文物的印象更多就是一些美麗圖案的堆砌或者古代能工巧匠精湛技藝的展示。包括故宮推出的“每日故宮”手機應用，每日更新的文物照片只有圖片，沒有詳細介紹，也不能下載使用。這對於人們參觀數字化博物館時，是沒有知識體系和概念框架的構建的，要講好中國故事，就須將精美文物背後的歷史故事娓娓道來。

（三）製作精良的短視頻介紹

在短視頻、碎片化閱讀風靡的時代，人們喜歡用視頻的方式學習互動。雖然北京故宮有自己的官方抖音、微信短視頻賬號，但是點擊量、轉載量、點贊人數、閱讀量都十分低迷，相比於那些自媒體博主頻繁發布的一些難以經得起學術考究的講解視頻充斥在微信、

抖音等平臺，其轉載量和閱讀量動輒十萬以上，與故宮的賬號形成了鮮明的對比。這中間的原因，一方面北京故宮的短視頻製作水平有待提高，另一方面還應注重市場化需求導向，用通俗易懂，觀眾喜歡的方式製作，避免曲高和寡，出現高處不勝寒的現象。

（四）整合分散的數字技術應用

故宮在向用戶提供多元化服務場景的同時，面臨著數字資源分散、功能割裂、不易查找的問題，建議通過分析故宮博物院的媒介技術應用，基於一站式數字服務設計提出提升博物館數字資源利用率的方案，從而加強數字服務與觀眾之間的連接與循環，鞏固博物館公共服務職能（康曉路 2021）。比如故宮推出的 6 個不同主題的 APP 應用，分別是十二美人圖、紫禁城祥瑞、皇帝的一天、韓熙載夜宴圖、每日故宮、清朝皇帝服飾。這六個應用內容確實非常精美、製作精良，但是對於觀眾和用戶的問題是觀看每一項內容都要單獨下載一個 APP，看完之後可能過兩天由於手機內存不足，又只能無奈的卸除，並沒有形成一個系統的文件夾。

四、博物館數字化之外的政策建議

通過對參觀博物館的民衆的訪談，我們發現，對於大多數民衆而言，網上的數字化展品還是不能代替實地的參觀游覽。即便有人多排隊、天氣不良、環境嘈雜等等的煩惱與不便，參觀者還是更願意近距離現場感受文物實體，這是數字化所無法取代的。

（一）加強博物館之間的交流與合作

澳門香港受歷史和地方所限，文物沒有內地豐富，所以北京故宮長期將各類精品文物在香港、澳門展出，豐富了港澳地區人們的精神世界，方便了港澳同胞對故宮文化、中華文化以及中國歷史的學習，增加了內地和香港、澳門之間的密切聯繫。從狹義的“故宮”到廣義的“故宮”，北京、臺北、香港、澳門四座城市，相互聯繫，相互映襯，相輔相成，相得益彰，構成了一個大型的展示故宮文化的博物館集群，故宮文化在兩岸四地熠熠生輝。

未來港澳臺地區可以與內地進行文物的數字資源共享和數字化資源合作，打通壁壘，摒棄偏見，取長補短，相互學習借鑒成功經驗，共同繼承和發揚故宮寶貴的文化資源。

（二）注重生活場景的還原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讓收藏在博物館裡的文物、陳列在廣闊大地上的遺產、書寫在古籍裡的文字都活起來”。兩岸故宮在推介故宮文化，讓文物更進一步走進大眾生活的過程中，應更加注重文物原有的場景還原和再現。北京故宮博物院曾在單霽翔院長的帶領下，陸續推出了幾個大型的原狀陳列展，如坤寧宮帝后大婚原狀陳列展、壽康宮慶隆尊養原狀陳列展、景山壽皇殿皇家祭祖原狀陳列展等等。區別於將文物單獨割裂的陳放在展櫃中不同，原狀陳列力求恢復歷史原貌，宮殿中的陳設都是嚴格遵循歷史檔案記載去選擇布置，

特別是在北京故宮擁有得天獨厚的優勢，北京故宮除 180 萬件可移動文物之外，還有 16 萬平方米的不可移動古建築文物。原狀陳列能夠更加直觀清晰的表達每一件文物原有的歷史功能和定位，讓觀眾能夠真切地感受到厚重的歷史文化氛圍，這些精美的文物藏品與歷盡滄桑的古代建築一起構成和諧統一的整體，蘊含著豐富的歷史信息和文化內涵，向世人形象地展示故宮文化。未來，兩岸四地的故宮還可以因地制宜，還原出更多的文物場景、生活場景，舉辦更多的原狀陳列展以滿足人們的參觀需求。

（三）重視影視劇的打造

另一方面，影視劇在傳播故宮文化，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中也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客觀的來講，大多數人們對於歷史的認知基本上是通過觀看影視劇學習，這是一種最簡單高效的學習方式，雖然一些影視劇存在誤導或者有違歷史的情況發生，但其影響力還是很深遠的，特別是一些經典影視劇作品的場景布置是嚴格遵循史料記載，進一步加工創作而成，是在原狀陳列的基礎上加入了人物活動和劇情，是一種更加生動的場景還原和情景再現。比如人們對於故宮博物院特別是清代文物的關注熱度的提升，有一個很重要的影響因素就是電視劇《甄嬛傳》的熱播。2024 年 2 月 28 日國務院台辦舉行例行新聞發布會，國台辦發言人朱鳳蓮表示，《甄嬛傳》開播 12 年來，在兩岸長盛不衰，成為每年春節期間的頂流電視劇，看到島內媒體報道說，看《甄嬛傳》已經成為臺灣民眾新年賀歲節目的新選擇，也看到臺灣網友留言把過年看《甄嬛傳》當作與“老友”重聚。臺灣民眾對影視劇《甄嬛傳》情有獨鍾，對於清代歷史、故宮文化、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熱愛同內地民眾是一樣的。《甄嬛傳》的播出讓國民對特定歷史時期的框架构建和宮廷生活的認知都起到了一個助推作用，在《甄嬛傳》開播後，許多人都能將清代王公大臣、後宮妃嬪的等級制度背的十分熟練，劇中出現的古詩文和經典臺詞也是信手拈來，清代日常生活用具如何使用，民風民俗、規矩禮儀也是了然於胸。看過《甄嬛傳》後，再去故宮裡參觀文物，多出許多親切感的同時，也讓人印象更加深刻。而作為故事的發生地，北京紫禁城裡一處處年深月久的宮門，背後的故事可能比電視劇本身更傳奇，吸引著越來越多的年輕人選擇去故宮工作，投身進文物保護和歷史研究的領域。

（四）大力開發文創產品

推廣文創產品已成為世界各地博物館的發展潮流，北京故宮與臺北故宮近些年均推出了大量精美的文創產品。（李韋 2016）運用 SWOT 分析法，討論了北京故宮博物院與臺北故宮博物院各自文創的優勢、劣勢、機會和威脅。盤華、王興堯也對兩岸故宮文創產品進行了比較研究，上世紀八十年代，臺北故宮率先在中國開啓了博物館文創開發與研究，並在隨後取得了良好效益。進入二十一世紀，北京故宮的文創產業蒸蒸日上，將紫禁城文化帶入了千家萬戶。當然，蓬勃發展的同時也會存在一些問題，北京故宮的文創近些年也存在著質量下滑、同質化嚴重、甚至脫離故宮文化等問題。臺灣《旺報》的一篇評論也稱，臺北故宮曾是文物保護的代表和文創產業的旗幟，但近年來屢屢受到政治議題操縱。在臺

北故宮的線上故宮商店購買須知上提示：“套書、瓷器及高仿品，暫時停止進口大陸。自2018年5月起廈門海關對於進口貨物，實施嚴格審驗，套書、瓷器及書畫類商品，將暫時停止進口大陸，出口時間將視海關作業而定。”（丁宇 2019）談到曾經翡翠玉白菜冰箱貼、仿照唐代後宮女眷“墜馬髻”造型做成的頸枕、毛公鼎領帶夾、小乾隆茶杯等文創產品，都是陸客必買伴手禮。但如今，曾引領風潮的文創商品近年也未見亮點。

文創產品講述著文物背後的故事，同樣也是展示故宮文化的重要載體。文創產品在文化傳承中是一種外在的形式，其核心的內容還是文化本身。面對故宮巨大的文化資源寶庫，如今的文創產品對於故宮文化的開發還只是冰山一角，仍需不斷的深入研究和挖掘。另外文創產品雖然重在創新，但目前一些文創產品的創新已然脫離了原有的文化，甚至創新的不倫不類、毫不相干。所以，原有文化傳統的繼保留和弘揚也至關重要，這樣才能跳脫文創產品同質化的困境。故宮博物院中收藏有大量的清宮舊藏皇家生活器具，大到傢俱陳設，小到鍋碗瓢盆、杯盞筷子、收納食盒等等，這些生活器具如今在我們日常生活中依然在高頻使用，基於這類文物開發出的文創產品其原有形制樣貌、功能定位等可以完全保留，做到較高程度還原復刻即可，只在生產技術和加工材料上進行創新，例如新型復合材料、3D 列印、SOLID EDGE、虛擬仿真等新技術新材料的進一步運用，不僅可以大批量生產加工，而且即便不使用金、銀、玉等名貴奢靡材料，但還原度還非常高，大大降低了生產成本，適合量產推廣。這樣的不脫離於日常生活的文創產品才能更好的走入尋常百姓家，真正讓故宮文化走入千家萬戶，一代又一代的將中華文化傳承下去。

兩岸故宮的文創開發對於各地更好利用博物館資源、活化傳統文化、講好中國故事具有示範作用，共同向世界展示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和中國智慧。同時對於增進兩岸同胞心靈契合，提升兩岸同胞的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都有著很好的情感紐帶之用。

結語

隨著社會發展，博物館逐漸進入大眾的文化生活圈，在文化強國的建設中扮演重要角色。因應信息化的浪潮，博物館加快數字化和館際合作才可以更大程度發揮其研究、收藏、保護、闡釋和展示物質與非物質遺產的職能，更開放、更可及和包容，並為教育、欣賞、深思和知識共享提供多種體驗。

兩岸四地的故宮同宗同源，本就屬於一個“大故宮”範疇，四座故宮，五座博物館各具特色和魅力。進入新時代，兩岸四地的故宮相互之間應加強聯繫，取長補短，優勢互補，共同推動故宮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讓兩岸四地群眾能夠更加全面的瞭解一個完整的紫禁六百年，讓故宮文化、中華文化在中華大地更加熠熠生輝，為發揚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建設文化強國做出貢獻。

參考文獻：

- 1.丁宇（2019）。《“此消彼長”的兩岸故宮》。[J].兩岸關係,2019（03）:60-63.
- 2.馮明珠（2015）。《挑戰與應變：談國立故宮博物院三十年來的變化》。故宮學術季刊 第三十三卷第一期，1-36 頁。
- 3.馮乃恩（2017）。《博物館數字化建設理念與實踐綜述——以數字故宮小區為例》。[J].故宮博物院院刊,2017（01）:108-123+162.DOI:10.16319/j.cnki.0452-7402.2017.01.008.
- 4.國家文物局（2017）。《第一次全國可移動文物普查工作報告》，國家文物局網站，2017（11），[EB/OL]，http://www.ncha.gov.cn/art/2017/4/7/art_1983_139402.html
- 5.國際博物館協會（2022）。《國際博物館協會章程（2022 版）》，國際博物館協會第二十一屆全體大會於 2007 年 8 月 24 日在維也納通過。
<https://icom.museum/en/resources/standards-guidelines/museum-definition/>
- 6.康曉璐（2021）。《數字時代故宮博物院數字服務提升路徑探索》，中圖分類號 G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2096-0360（2021）23-0023-04：
DOI:10.16604/j.cnki.issn2096-0360.2021.23.007
- 7.李韋（2020）。《淺析我國博物館文創發展對策——以北京故宮博物院和臺北故宮博物院為例》。[J].博物院,2020（04）:126-131.
- 8.盤華,王興堯（2022）。《基於北京故宮和臺北故宮探析博物館文創開發》。[J].山東藝術,2022（02）:86-95.
- 9.石秀敏（2022）。《博物館數字影像資源管理的探索與實踐——以故宮博物院為例》[J].中國文物科學研究,2022（01）:44-53.
- 10.蘇怡,張沛沛（2022）。《借助數字科技激活、強化和釋放“博物館的力量”——從故宮博物院與騰訊集團跨界的合作談起》[J].中國博物館,2022（02）:14-18.
- 11.王旭東（2021）。《數字故宮的過去、現在與未來》。[J].科學教育與博物館,2021,7（06）:524-531.DOI:10.16703/j.cnki.31-2111/n.2021.06.0010.
- 12.王裕昌,廖元琨,趙天英（2013）。《美國博物館及其數字化建設的啓示》[J].中國博物館,2013（03）:82-88.
- 13.趙豐（2022）。《絲綢之路數字博物館:開放共享的博物館數字融合》[J].中國博物館,2022（03）:109-115.
- 14.鄭欣渺（2007）。.經典故宮與《故宮經典》. 紫禁城出版社.
- 中共中央（2019）。《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共產黨員網。取自：
<https://www.12371.cn/2020/11/03/ARTI1604398127413120.shtml>
- 15.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2022）。《“十四五”文化發展規劃》，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網站。取自：https://www.gov.cn/zhengce/2022-08/16/content_5705612.htm
- 16.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2021）。《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 2035 年遠景目標綱要》，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網站。取自：
https://www.gov.cn/xinwen/2021-03/13/content_5592681.htm
- 17.祝敬國（2016）。《中國博物館數字化若干概念的思考》。故宮博物院 網頁。取自：
https://www.dpm.org.cn/study_detail/100204

企業綠色行為如何溢出影響員工工作、公共和居家綠色行為？

——基於認知—情感加工系統理論視角

莫紫瑩¹ 馬裕² 劉丁己³

摘要：隨著工業污染和生態破壞等環境問題日趨嚴峻，個人的日常工作、生產和生活中所帶來的環境問題也越來越突出。其中，員工綠色行為是企業可持續發展的關鍵所在，並已成為政界和學術界關注的焦點。通過對 333 份有效員工問卷進行實證分析，本研究探究了企業綠色行為如何溢出影響員工工作、公共和居家綠色行為。研究結果顯示：企業綠色行為會通過員工的認知加工系統（綠色認知）和情感加工系統（和諧式綠色激情）來促使員工工作、公共和居家綠色行為。同時，在低程度的社會規範下，企業綠色行為對綠色認知和和諧式綠色激情的影響越強；反之越弱。本文擴展了企業綠色行為和員工綠色行為的相關研究，為企業綠色發展和管理提供了理論與現實意義。

關鍵詞：企業綠色行為；員工工作綠色行為；員工公共綠色行為；員工居家綠色行為；綠色認知；和諧式綠色激情

一、引言

近年來，全球氣候變暖，霧霾天氣，冰川消融等環境問題使得人類生存與發展面臨嚴峻挑戰，影響著人類存續和世界各國的社會經濟發展方向和模式。各國迫切需要重視環境問題，推動產業綠色轉型和可持續發展。我國作為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在全球綠色治理中的作用不容小覷。中共十八屆五中全會在“十三五”規劃中將“綠色”列入五大理念之一，並表示要通過綠色理念引領可持續發展。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出堅持“人與自然和諧共生”，並進一步強調要實行最嚴格的生態環境保護制度來構建“人人有責、人人盡責、人人享有”治理共同體。

在此形勢與背景下，企業對綠色發展的重視程度日益增加，越來越多的企業開始重視

基金項目：本文為廣州市哲學社科規劃 2023 年度課題（編號：2023GZQN19）階段性成果之一；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 2020 年度項目（編號：20YJC630105）階段性成果之一。

¹ 莫紫瑩，暨南大學國際商學院助理教授、碩士生導師。中山大學工商管理博士後、管理學博士。

² 馬裕，暨南大學國際商學院碩士研究生。

³ 劉丁己，澳門大學工商管理學院教授，博導。澳門大學持續進修中心主任，澳門新視角學會副理事長，澳門特區政府經濟發展委員會委員。

環境問題對其競爭力和可持續發展的影響（Paillé等，2014）。同時，企業作為經濟活動的主要參與者和技術進步的主要推動者，其戰略實施和干預必然會影響“綠色生產”和“綠色生活”（李維安等，2019）。然而，僅僅依靠企業的力量是不夠的，員工作為企業綠色戰略的實施者，其行為將會影響企業綠色戰略的成效。在企業可持續發展戰略中，員工的綠色行為是連接綠色生產和綠色生活的紐帶。這為推動企業可持續發展和綠色轉型起到促進作用（Lülfes & Hahn, 2013）。基於此，本文試圖探討企業綠色行為能否影響員工的綠色行為，其中的影響機制如何？此外，企業的綠色行為如何溢出影響員工工作、公共和居家綠色行為？這對推動企業可持續發展和綠色轉型起到促進作用。

為了系統全面地回答上述問題，本文基於認知—情感加工系統理論視角，通過對 333 份有效員工問卷進行實證分析，考察企業綠色行為對員工綠色行為的影響效應，並從工作、公共以及居家等領域進一步探討。同時，結合了認知加工系統（綠色認知）和情緒加工系統（和諧式綠色激情）兩個視角來剖析二者的關係，並依次介紹了綠色認知和和諧式綠色激情在激發員工綠色行為過程中的重要性。最後，探究社會規範如何調節綠色認知和和諧式綠色激情對員工綠色行為的關係。

二、理論基礎與研究假設

（一）認知—情感加工理論

認知-情感加工理論系統地認為，情景特徵會通過對個體認知和情感反應的激活，進而刺激個體產生相關行為（Mischel & Shoda, 1995）。具體來說，情景特徵對個體行為產生影響的過程中，包含兩種加工系統，分別是認知加工系統和情感加工系統。其中，認知加工系統是一種可控的反應系統，能夠驅動個體對外界信息做出認知加工，表現出理性的行為反應。情感加工系統是一種情感自動反應的系統，當外部特徵刺激到情感時，個體人格會自動開啓情緒反饋機制，從而表現出較為感性的行為（Mischel & Shoda, 1995）。情景特性的產生有外在和內在因素的雙重作用。

依據此理論，本文將探討企業綠色行為誘發員工綠色行為的中介機制。從認知層面來說，認知是個體內在心理活動的產物（葉浩生等，2019）。面對企業順應綠色發展而進行經濟管理等活動時，員工出於對該理念的認可以及外部事件的影響而產生一定認知。綠色認知是指個體對於綠色發展、可持續發展和環境保護等相關概念和理念的認識與理解（葉楠，2019）。從情緒層面來說，員工的行為和組織的環境有著密切的關係，無論是企業的規章制度，還是文化氛圍等，都會對員工的態度產生影響，對員工行為塑造產生重要影響（彭堅等，2019）。也就是說，當員工在企業中實踐了綠色活動時，會潛移默化的影響自身的行為，從而和企業所傳遞的情緒一致。和諧式綠色情緒是員工在參與環保工作中表現

出的積極情緒（Robertson & Barling, 2013）。這種情緒可以促使個體保持高水平的積極心態，並使員工意識到其工作的意義，從而更願意投身於工作中（黃慶等，2020）。鑒於以上分析，本文擬將綠色認知和和諧式綠色激情分別作為企業綠色行為誘發員工綠色行為過程中的認知和情緒單元。

（二）綠色認知的中介作用

企業為實現綠色發展而開展的一系列活動，如設計開發、生產製造等，都易引發員工對綠色環保的認知。其中，企業綠色行為是指企業綜合考量了環境和資源問題，通過利用清潔生產裝備、清潔能源與技術等生產綠色產品的行為（鄒志勇等，2019）。綠色認知是一種企業體驗，通過對現存資源和環境問題的理解，以及在處理問題過程中積累的相關系統知識，然後自覺承擔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的責任（賀愛忠等，2013）。通過企業綠色行為的影響，企業幫助員工意識到綠色行為的重要性以及環保工作開展的必要性（彭堅等，2020）。同時，員工還會認識到綠色行為是被企業鼓勵和期望的行為（Robertson & Barling, 2013）。最終，企業行為會影響到員工的認知公司的行為對雇員的感知有一定的影響。

基於對上述理論和相關文獻的分析，本文認為企業綠色行為對綠色認知有驅動作用。原因如下：第一，企業開展一系列綠色活動使得員工更傾向於關注環境等問題，增強員工對綠色理念和環保行為的認同感，並逐漸將其內化為自身認知（王曉強等，2018）。第二，企業綠色行為會促進員工產生對環境的責任感以及環保工作的參與感（張娜等，2021），從而意識到綠色工作的重要性與意義。第三，企業綠色行為會為員工提供學習綠色理念和環保技能的機會，以幫助他們更好適應綠色工作環境，從而更加積極的投身於企業綠色活動。綜上，企業通過實施綠色實踐，可以促進員工對綠色環保理念的認識和瞭解，進而增強員工的綠色認知。

假設 1：企業綠色行為對綠色認知有正向影響。

綠色行為是指人們有意識地降低其對環境產生地消極影響（Stern, 2000）。學者們將該概念引入到組織情境中，並提出了“員工綠色行為”這一概念。員工綠色行為，它主要是指以工作場所特定表現形式的盡可能降低對環境的消極影響或者增強對環境保護有積極影響的行為（Norton 等，2015；Steg & Vlek, 2009）。此外，目前學界還存在一個與“員工綠色行為”相似的概念，即“員工環保行為”。從本質上來說，員工綠色行為與環保組織公民行為不同，它不僅包含員工在工作場所自願從事的綠色行為，也包含員工共在公共場所以及居家環境中的綠色行為。

員工具備綠色認知可能會促使他們採取積極的綠色行為，例如節約能源、減少廢物、推動可持續發展等。研究表明，具備綠色認知的員工更傾向於在工作中採取環保行為，他們可能會更加關注公司的環保政策和實踐，積極參與到環保倡議中去（趙素芳等，2019）。這種積極的行為不僅可以降低企業的環境影響，還可能提高員工的工作滿意度和認同感。此外，綠色認知還可以促進員工之間的合作和溝通。共同的環保價值觀可以成為團隊凝聚

力的重要來源（趙莉等，2023），促使員工之間更緊密地協作，共同致力於實現公司的環保目標。因此，綠色認知可以在員工工作領域中產生積極的影響，促使員工採取更多的綠色行爲。

綠色認知對員工的公共領域綠色行爲也有著顯著影響。公共領域的綠色行爲指的是員工在工作之外，如家庭、社區或其他公共場所，採取的環保行動。一方面，他們可能在個人生活中採取一系列環保措施，例如減少用水用電、垃圾分類、選擇環保產品等。這種行爲會影響到他們的朋友和社區（王建明和賀愛忠，2011），從而推動更多人加入到環保行動中來。另一方面，具備綠色認知的員工通常更關注環保信息和新聞，他們可能會與他人分享環保知識、經驗和資源，從而擴大環保行動的影響範圍。因此，綠色認知可以在員工公共領域中產生積極的影響，促使員工採取更多的綠色行爲。

員工在家庭生活中所採取的環保行爲不僅影響到自己的生活方式，也對家庭成員和社區產生影響（王建明和賀愛忠，2011），而綠色認知則可以促使員工更傾向於採取這些綠色行爲。第一，具有綠色認知的員工更容易意識到能源的重要性以及節能減排的必要性。他們可能會採取節約用電、減少能源浪費的措施，例如關閉不必要的燈光、購買高效能源設備等，從而降低家庭能源消耗和碳排放。第二，具有綠色認知的員工可能更傾向於購買環保產品和服務，例如選擇有機食品、環保清潔用品、可持續材料的家具等，從而減少對環境的不良影響。第三，綠色認知促使員工更加關注廢棄物的處理和資源循環利用。他們可能會在家庭中實踐垃圾分類，將可回收物品與其他垃圾分開，然後進行回收再利用，以減少對環境的負面影響。因此，綠色認知可以激勵員工在家庭生活中採取更多綠色行爲。

假設 2a: 綠色認知對員工工作領域綠色行爲有正向影響。

假設 2b: 綠色認知對員工公共領域綠色行爲有正向影響。

假設 2c: 綠色認知對員工居家領域綠色行爲有正向影響。

目前研究指出，企業層面因素與個體層面因素對員工綠色行爲的驅動作用並非互相獨立存在。首先，基於個體層面，研究個體因素中的人格等遠端前置因素如何通過個體因素中的動機、情緒、認知等近端前置因素，以驅動員工綠色行爲。Kim 等（2017）指出，員工責任心通過道德反思的中介作用，以促進其綠色行爲的形成。其次，基於情境層面的視角，研究了組織綠色政策、戰略等遠端前置因素如何通過組織支持、組織綠色氛圍等近端前置因素，以驅動員工綠色行爲。Norton 等（2014）指出，企業綠色戰略分別通過組織綠色氛圍和同時綠色氛圍的中介作用，從而影響員工綠色行爲的產生。因此，綠色認知可以在企業綠色行爲與員工工作、公共和居家領域綠色行爲之間起到中介作用。

假設 3: 綠色認知在企業綠色行爲與員工工作/公共/居家領域綠色行爲的關係之間起中介作用。

（三）和諧式綠色激情的中介作用

員工的行爲與企業的環境息息相關，公司的規章制度、企業的文化氣氛等因素都會影

響到員工的工作態度，進而影響到其行爲的形成（彭堅等，2019）。這意味著，如果企業內開展了綠色，那麼其行爲會潛移默化地影響員工的綠色行爲，從而傳遞出與企業價值觀一致的情緒。已有研究更多地關注企業的綠色管理行爲對員工的作用，却忽略了其在具體組織環境中的作用差異，無法揭示同一種企業綠色行爲在處理不同類型個體時所表現出的差異性（Tuan, 2020）。和諧式綠色激情能促使個體在實踐綠色行爲時，幫助個體意識到該綠色行爲的意義和重要性，進而更能投入到該行爲中（Robertson & Barling, 2013; 黃慶等，2020）。

假設 4: 企業綠色行爲對和諧式綠色激情有正向影響。

和諧式綠色激情對員工綠色行爲有著明顯的正向影響。首先，和諧式綠色激情對員工工作領域的綠色行爲有著積極的正向影響。和諧式綠色激情激發了員工對綠色行爲的內在動機和熱情。這種內在的動力會促使員工更積極地參與到公司的綠色中（蔡雙立等，2023）。同時，具有和諧式綠色激情的員工會與公司的綠色理念產生情感聯繫。這種情感聯繫會增強員工對公司環保政策的支持和配合，使他們更積極投入工作（張佳良和劉軍，2016）。其次，和諧式綠色激情對員工公共領域的綠色行爲也有著積極的正向影響。和諧式綠色激情激發了員工的社會責任感和環保意識（黃慶等，2020）。他們可能會更積極地參與到環保活動、志願者工作或者環保組織中，以推動環保議題在社會中的傳播和落實。在公共領域，員工可能會參與到垃圾清理、環保宣傳、綠化活動等社區環保行動中去。最後，和諧式綠色激情對員工居家領域的綠色行爲具有正向影響。和諧式綠色激情強調的是員工對環保事業的內在熱情和動力，而這種內在動力會促使員工在家庭生活中採取更多的環保行動。例如，員工因為內在對環保的熱情和認同，會自覺地在家庭生活中採取環保行爲。他們可能會主動減少能源消耗、垃圾分類、選擇環保產品等，以貢獻自己的一份力量保護環境。

假設 5a: 和諧式綠色激情對員工工作領域綠色行爲有正向影響。

假設 5b: 和諧式綠色激情對員工公共領域綠色行爲有正向影響。

假設 5c: 和諧式綠色激情對員工居家領域綠色行爲有正向影響。

和諧式綠色激情在企業綠色行爲與員工工作、公共、居家領域綠色行爲之間起著重要的中介作用，促進了員工的綠色行爲。具體來說，和諧式綠色激情激發了員工內在的環保動機和熱情（蔡雙立等，2023）。這種內在動機使員工更加自覺地參與到公司的環保行動中，同時也促使他們在工作、公共和居家領域採取更多的環保行爲。其次，員工通過對環保事業的熱情和認同，與公司的環保目標產生情感聯繫。這種情感聯繫可以加強員工對公司環保政策的支持和配合，進而促進他們在工作中積極參與到環保行動中去。最後，公司通過強調和諧式綠色激情，營造了一個共享環保價值觀的文化氛圍（Robertson & Barling, 2013）。這種價值共享將促進員工之間的相互理解和支持，形成一個共同致力於環保事業的團隊。

假設 6: 和諧式綠色激情在企業綠色行爲與員工工作/公共/居家領域綠色行爲的關係之

間起中介作用。

(四) 社會規範的調節作用

社會規範是社會群體中普遍存在的一種規則和標準，它對個體的行為和認知產生著深遠的影響。在綠色領域，社會規範也起著關鍵的作用。社會規範是指來自外界群體的壓力、社會環保風氣和道德規範等。基於認知-情感加工系統理論，社會規範的存在會調節企業綠色行為對於後續行為的反應，從而使得員工的認知和情緒更加強烈。也就是說，當個體感到社會規範的壓力時，會更多地採取行動（Ajzen, 2012）。具體來看，當社會規範程度較高時，企業所做出的一系列綠色經濟活動會受社會規範的影響，使得員工在工作中受到無形的壓力（李大元等，2018），從而降低自身的綠色認知和和諧式綠色激情。當社會規範程度較低時，企業綠色行為會影響到員工的認知和情緒，使得員工意識到綠色的重要性，從而在生產過程中更加注重環保措施的實施（戴萬亮和路文玲，2020）。由此，以提高員工綠色認知和和諧式綠色激情。

假設 7：社會規範調節企業綠色行為與綠色認知之間的關係。具體地，社會規範程度越低，企業綠色行為與綠色認知之間的正向關係越強；反之越弱。

假設 8：社會規範調節企業綠色行為與和諧式綠色激情之間的關係。具體地，社會規範程度越低，企業綠色行為與和諧式綠色激情之間的正向關係越強；反之越弱。

研究模型如圖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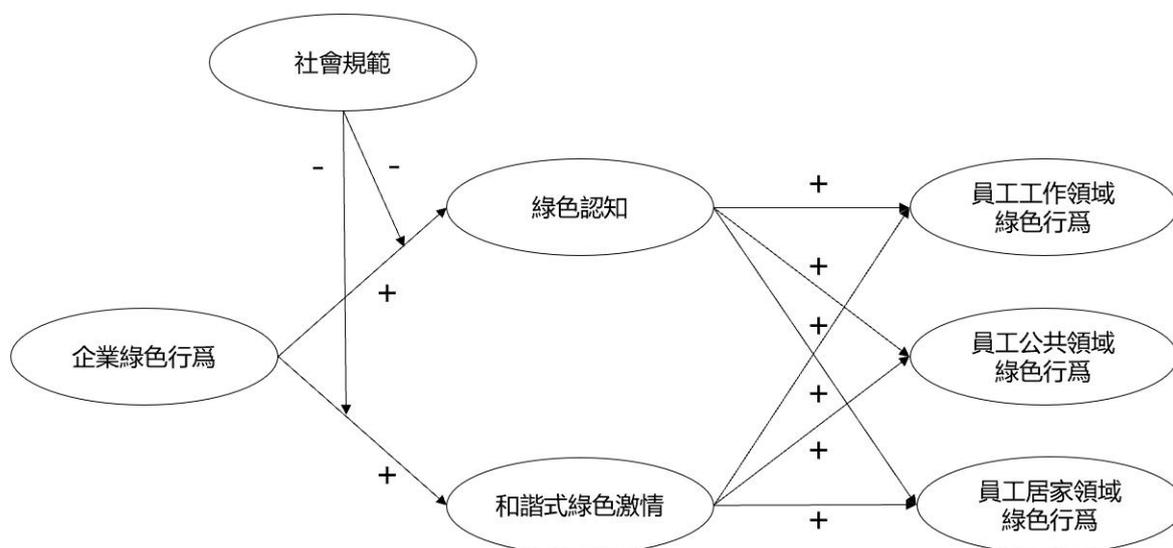


圖 1 研究模型圖

三、研究方法

(一) 研究對象與方法

本研究的調研數據來源於中國內地廣州、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和中國澳門特別行政區。研究項目組向上述城市的多個企業的人事部門說明瞭調查的目的和數據收集的過程，獲得了數據收集的許可，之後研究項目組的成員讓調查對象在對應的企業填寫問卷。為了減少可能的共同方法偏差，實施了多時間點（三次）的跟踪調查問卷。三次調查分別於 2024 年 1 月（第一次調查）、2 月（第二次調查）、3 月（第三次調查）期間進行，每次調查時間間隔至少四周。所有的問卷都是通過二維碼發送，在線填寫完成後再提交。我們在第一次調查中評估了變量（企業綠色行爲、社會規範）和相關人口統計學變量數據，在第二次調查中評估了變量（綠色認知、和諧式綠色激情），在第三次調查中評估了變量（員工工作、公共、居家領域綠色行爲）。第一次調查中，621 名員工交回了調查問卷，這些員工被邀請參加第二次調查。在第二次調查中，有 388 人（回復率 62.5%）交回了問卷。在第三次調查中，336 名員工（回復率 86.6%）交回了問卷。其中 3 個員工的問卷由於缺失部分數據無效。數據經整理後，保留了 333 名員工的有效數據。在最終有效的樣本中，數據中的性別方面，女性占 65.8%；年齡方面，平均年齡為 28.48 歲，標準偏差為 7.34；受教育程度方面，平均受教育年限為 12.62 歲，標準偏差為 2.68；在工作年資方面，平均工齡為 3.59 年，標準偏差為 2.00。

(二) 研究量表

本研究中，各主要變量的測量，均採用國內外學者開發的既有成熟量表。本研究所採用李克特 7 點量表（1 = 非常不同意，7 = 非常同意）。企業綠色行爲：在第一次調查時員工進行評分，使用葉露露（2022）的 12 項量表評估。該量表的 α 值為 0.73。綠色認知：數據來源於參與第二次調查的員工，使用李文杰（2016）的 6 項量表評估。該量表的 α 值為 0.84。和諧式綠色激情：數據來源於參與第二次調查的員工，使用蔡雙立（2023）的 10 項量表評估。該量表的 α 值為 0.88。社會規範：數據來源於參與第一次調查的員工，使用李文杰（2016）的 6 項量表評估。該量表的 α 值為 0.96。員工工作、公共、居家領域綠色行爲：數據來源於參與第三次調查的員工，採用李文杰（2016）的 12 項、14 項、13 項量表評估。 α 值分別為 0.98、0.90、0.82。

四、研究結果

(一) 研究變量描述性統計與相關分析

本研究中，研究變量均值、方差和相關分析的結果見表 1。

表 1 均值、標準偏差以及變量之間的相關性

變量	均值	標準偏差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 年齡	28.48	7.34	1.00										
2 性別	1.66	0.48	-0.29**	1.00									
4 工齡	3.59	2.00	0.00	0.02	-0.02	1.00							
5 企業綠色行爲	5.60	0.58	0.02	-0.06	0.02	-0.10	1.00						
6 綠色認知	5.34	0.63	-0.06	0.10	-0.05	0.08	0.01	1.00					
7 和諧式綠色激情	5.95	0.63	0.03	-0.04	0.09	0.02	0.33**	0.28**	1.00				
8 社會規範	5.26	0.76	0.01	-0.01	0.06	-0.02	0.13*	0.20**	0.54**	1.00			
9 員工工作領域綠色行爲	5.39	1.21	0.09	-0.05	-0.02	0.10	0.19**	0.10	0.40**	0.20**	1.00		
10 員工公共領域綠色行爲	5.33	0.79	-0.05	0.00	0.01	0.03	0.02	0.15**	0.26**	0.09	0.11*	1.00	
11 員工居家領域綠色行爲	5.24	0.64	-0.03	-0.10	-0.06	-0.01	0.14**	0.22**	0.44**	0.27**	0.26**	0.08	1.00

備註：N = 333， * p < .05; ** p < .01

（二）假設和結構關係檢驗

本研究利用 PROCESS 方法的模型 7 來分析框架，並結合 Bootstrap 的 20,000 重復取樣也被用來估計假設的中介關係的置信區間以確定其顯著性。

如表 2 所示，檢驗了假設提出的企業綠色行爲和綠色認知之間的關係。結果表明兩個變量之間存在顯著的正相關（ $\beta = 0.85$, $p < 0.01$ ）；結果支持假設 1。模型檢驗了假設提出的企業綠色行爲和和諧式綠色激情之間的關係。結果表明兩個變量之間存在顯著的正相關（ $\beta = 0.82$, $p < 0.01$ ）；結果支持假設 4。

模型檢驗了假設提出的綠色認知與員工工作、公共、居家領域綠色行爲之間存在正相關。檢驗結果顯示綠色認知與員工工作綠色行爲之間的係數為 $\beta = -0.02$ ($p = 0.81$)；檢驗結果顯示綠色認知與員工公共綠色行爲之間的係數為 $\beta = 0.10$ ($p = 0.16$)；檢驗結果顯示綠色認知與員工居家綠色行爲之間的係數為 $\beta = 0.11$ ($p < 0.05$)，假設 2a、2b 沒有獲得支持，而假設 2c 獲得支持。模型檢驗了假設提出的和諧式綠色激情與員工工作、公共、居家領域綠色行爲之間存在正相關。檢驗結果顯示和諧式綠色激情與員工工作綠色行爲之間的係數為 $\beta = 0.72$ ($p < 0.001$)；檢驗結果顯示和諧式綠色激情與員工公共綠色行爲之間的係數為 $\beta = 0.33$ ($p < 0.001$)；檢驗結果顯示和諧式綠色激情與員工居家綠色行爲之間的係數為 $\beta = 0.42$ ($p < 0.001$)，假設 5a、5b、5c 獲得支持。

假設 3 提出綠色認知在企業綠色行爲和員工工作、公共、居家領域綠色行爲之間存在中介作用。為估計假設 3 中的間接關係，使用參數的 Bootstrap 估計法。根據對 20,000 個重復樣本的分析，得出的結果顯示，綠色認知在企業綠色行爲和員工工作領域綠色行爲之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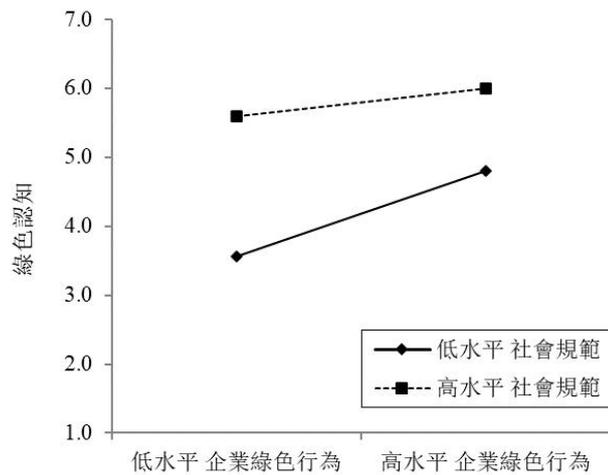
不存在顯著的中介作用 (indirect effect = -0.001, 95% confidence interval (CI) 置信區間 = [-0.02, 0.01], 包括零點)。綠色認知在企業綠色行爲和員工公共領域綠色行爲之間不存在顯著的中介作用 (indirect effect = 0.003, 95% confidence interval (CI) 置信區間 = [-0.01, 0.02], 包括零點)。綠色認知在企業綠色行爲和員工居家領域綠色行爲之間不存在顯著的中介作用 (indirect effect = 0.003, 95% confidence interval (CI) 置信區間 = [-0.01, 0.02], 包括零點)。因此, 假設 3 沒有得到支持。假設 6 提出和諧式綠色激情在企業綠色行爲和員工工作、公共、居家領域綠色行爲之間存在中介作用。爲估計假設 6 中的間接關係, 使用參數的 Bootstrap 估計法。根據對 20,000 個重復樣本的分析, 得出的結果顯示, 和諧式綠色激情在企業綠色行爲和員工工作領域綠色行爲之間存在顯著的中介作用 (indirect effect = 0.26, 95% confidence interval (CI) 置信區間 = [0.16, 0.38], 不包括零點)。和諧式綠色激情在企業綠色行爲和員工公共領域綠色行爲之間存在顯著的中介作用 (indirect effect = 0.12, 95% confidence interval (CI) 置信區間 = [0.06, 0.19], 不包括零點)。和諧式綠色激情在企業綠色行爲和員工居家領域綠色行爲之間存在顯著的中介作用 (indirect effect = 0.15, 95% confidence interval (CI) 置信區間 = [0.10, 0.22], 不包括零點)。因此, 假設 6 得到支持。

假設 7 提出社會規範在企業綠色行爲和綠色認知之間存在調節作用。結果表明存在顯著的負向調節作用 ($\beta = -0.17, p < 0.01$)。根據 Preacher 等 (2006) 提出的簡單斜率檢驗法, 本文分別檢驗在低於和高於均值 1 個標準差的情況下各變量的變化水平, 調節效應如圖 2 (a) 所示。結果表明, 低水平社會規範的回歸直線斜率比高水平社會規範的回歸直線斜率大, 說明社會規範水平較低時, 同等水平的企業綠色行爲對員工綠色認知的正向影響相對較強, 結果支持假設 7。假設 8 提出社會規範在企業綠色行爲和和諧式綠色激情之間存在調節作用。結果表明存在顯著的負向調節作用 ($\beta = -0.11, p < 0.05$), 結果支持假設 8。根據 Preacher 等 (2006) 提出的簡單斜率檢驗法, 本文分別檢驗在低於和高於均值 1 個標準差的情況下各變量的變化水平, 調節效應如圖 2 (b) 所示。結果表明, 低水平社會規範的回歸直線斜率比高水平社會規範的回歸直線斜率大, 說明社會規範水平較低時, 同等水平的企業綠色行爲對員工和諧式綠色激情的正向影響相對較強, 結果同樣支持假設 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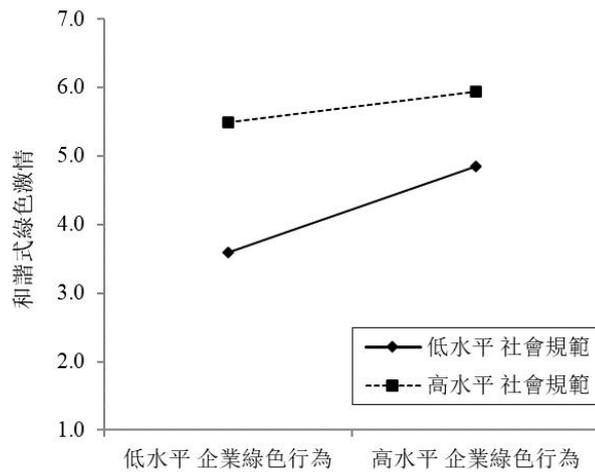
表 2 假設模型結果

	綠色認知		和諧式綠色激情		員工工作領域綠色 行爲		員工公共領域綠 色行爲		員工居家領域綠色 行爲	
	β	SE β	β	SE β	β	SE β	β	SE β	β	SE β
控制效應										
年齡	-0.002	0.005	0.0003	0.004	0.01	0.01	-0.01	0.01	-0.005	0.005
性別	0.14	0.07	-0.01	0.06	-0.04	0.13	-0.03	0.09	-0.15*	0.07
受教育程度	-0.01	0.01	0.01	0.01	-0.03	0.02	0.0003	0.02	-0.02	0.01
工齡	0.03	0.02	0.02	0.01	0.06*	0.03	0.003	0.02	-0.01	0.02
主要效應										
企業綠色行爲	0.85**	0.32	0.82**	0.26	0.15	0.11	-0.09	0.08	-0.002	0.06
綠色認知					-0.02	0.10	0.10	0.07	0.11*	0.05
和諧式綠色激情					0.72***	0.11	0.33***	0.07	0.42***	0.05
交互效應										
社會規範	1.10**	0.35	0.99***	0.28						
企業綠色行爲 x 社會規範	-0.17**	0.06	-0.11*	0.05						
R ²	0.06		0.38		0.18		0.08		0.23	

備註：N = 333, *p < 0.05, **p < 0.01, ***p < 0.001



(a)



(b)

圖 2 社會規範的調節效應圖

五、討論

本文對企業綠色行為的過程機制進行了研究。基於上述研究，發現綠色認知和在企業綠色行為和員工工作領域/公共領域/居家領域綠色行為之間不起中介作用。然而，企業綠色行為和綠色認知存在一定正向影響。和諧式綠色激情在企業綠色行為和員工工作領域/公共領域/居家領域綠色行為之間起中介作用。社會規範在企業綠色行為和綠色認知以及和諧式綠色激情之間起調節作用。具體地，社會規範程度越低，企業綠色行為與綠色認知/和諧式綠色激情之間的正向關係越強；反之越弱。

(一) 理論意義

以往對員工綠色行為的研究大多集中於員工層面（彭堅等，2020；Kim 等，2017；Norton 等，2015），而未將企業-員工相結合，並探討二者之間的機制。本研究結合複雜的社會心理學模型，它涉及企業綠色行為、員工工作領域/公共領域/居家領域的綠色行為以及個人的綠色認知和和諧式綠色激情等多個方面。從企業視角出發，探究企業的綠色行為對員工所起的重要作用。

從“企業與個體”視角來探討員工綠色行為的多層次近端驅動機制，進一步探討企業層面因素與員工個體特質跨層次交互，通過多重機制的員工心理歷程以驅動員工綠色行為。具體而言，本文首先基於認知-情緒加工系統理論（Mischel & Shoda, 1995），提出綠色認知（認知評估）、和諧式綠色激情（情緒反應）兩個中介機制在一個模型中的互動關係，

並最終驅動員工綠色行爲。再次，本文提出不同強度的社會規範會對企業綠色行爲與其認知情緒的影響關係產生不同的跨層次調節作用（跨層次被調節的中介效應），即協同作用或替代作用。

（二）實踐意義

對於企業而言，將有助於完善企業的綠色戰略，更好的進行綠色員工管理，更主動積極的參與中國綠色治理。企業可以根據具有不同個體特質的員工，採取差異化的綠色管理策略，以達到最佳的綠色管理績效；對於員工個體而言，個體是社會公眾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中國綠色治理的廣泛參與者（李維安等，2019），本文將有助於清晰員工個體是如何在不同領域產生綠色行爲。特別是，本文還強調了在什麼條件下會加強認知與情緒，本文將有助於公眾自身更明白工作場所實施綠色行爲意味著什麼，人們可以實工作場所綠色行爲來滿足什麼心理，將有助於滿足社會公眾對美好生活的追求，間接增進人民福祉，促進人的全面發展。

參考文獻：

- 1.蔡雙立, Muhammad Farhan Mughal & 馬洪梅. (2023). 綠色服務型領導與員工自願綠色行爲的關係研究——基於認知機制與情感邊界. 管理學刊 (06), 81-97.
- 2.戴萬亮, & 路文玲. (2020). 環保輿論壓力對製造企業綠色創新能力的影響——領導環保意識與組織綠色學習的鏈式中介效應. 科技進步與對策, 37 (9), 131-137.
- 3.賀愛忠, 杜靜, & 陳美麗. (2013). 零售企業綠色認知和綠色情感對綠色行爲的影響機理. 中國軟科學, (4), 117-127.
- 4.黃慶, 黃霞林, & 蔣春燕. (2020). 員工謙遜對基層創新的影響——基於社會交換視角的研究. 科學學與科學技術管理, 41 (10), 138.
- 5.李大元, 宋杰, 陳麗, & 張璐. (2018). 輿論壓力能促進企業綠色創新嗎?. 研究與發展管理, 30 (6), 23-33.
- 6.李維安, 張耀偉, 鄭敏娜, 李曉琳, 崔光耀, & 李惠. (2019). 中國上市公司綠色治理及其評價研究. 管理世界, 35 (5), 126-133.
- 7.彭堅, 趙李晶, 徐淵, & 侯楠. (2019). 綠色變革型領導的影響效果及其理論解釋機制. 心理科學, (4), 928.
- 8.彭堅, 尹奎, 侯楠, 鄒艷春, & 聶琦. (2020). 如何激發員工綠色行爲? 綠色變革型領導與綠色人力資源管理實踐的作用. 心理學報, 52 (9), 1105.
- 9.王建明, & 賀愛忠. (2011). 消費者低碳消費行爲的心理歸因和政策干預路徑: 一個基於扎根理論的探索性研究. 南開管理評論, 14 (4), 80-89.
- 10.王曉強, 陳毅文, & 陳婕. (2018). 自主環境保護意識研究——以企業組織支持因素的實際感受對親環境行爲影響為例. 科學與社會, 8 (4), 57-71.
- 11.葉浩生, 曾紅, & 楊文登. (2019). 生成認知: 理論基礎與實踐走向. 心理學報, 51 (11), 1270.
- 12.葉楠. (2019). 綠色認知與綠色情感對綠色消費行爲的影響機理研究. 南京工業大學學

報: 社會科學版, 18 (4), 61-74.

- 13.張佳良, & 劉軍. (2016). 環保組織公民行爲研究述評與展望. *外國經濟與管理*, 38(10), 35-48.
- 14.張娜, 張劍, & 田慧榮. (2021). 企業社會責任特徵對員工綠色行爲的影響: 基於道德決策的機制模型. *中國人力資源開發*, 38 (3), 33-47.
- 15.趙莉, 許爽, 劉平青, 崔遵康, & 楊芳. (2023). 職場精神力如何影響知識型員工合作行爲——基於戰略共識和目標互依性的視角. *科技進步與對策*, 40 (22), 152-160.
- 16.趙素芳, 王才, & 周文斌. (2019). 綠色人力資源管理實踐感知, 資質過高感與員工綠色行爲. *科技進步與對策*, 36 (16), 133-139.
- 17.鄒志勇, 辛沛祝, 晁玉方, & 朱曉紅. (2019). 高管綠色認知, 企業綠色行爲對企業綠色績效的影響研究——基於山東輕工業企業數據的實證分析. *華東經濟管理*, 33 (12), 35-41.
- 18.Ajzen, I. (2012). Martin Fishbein's legacy: The reasoned action APPROach.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640 (1), 11-27.
- 19.Kim, A., Kim, Y., Han, K., Jackson, S. E., & Ployhart, R. E. (2017). Multilevel influences on voluntary workplace green behavior: Individual differences, leader behavior, and coworker advocacy. *Journal of management*, 43 (5), 1335-1358.
- 20.Lülfes, R., & Hahn, R. (2013). Corporate greening beyond formal programs, initiatives, and systems: A conceptual model for voluntary pro - environmental behavior of employees. *European Management Review*, 10 (2), 83-98.
- 21.Mischel, W., & Shoda, Y. (1995). A cognitive-affective system theory of personality: reconceptualizing situations, dispositions, dynamics, and invariance in personality structure. *Psychological review*, 102 (2), 246.
- 22.Norton, T. A., Parker, S. L., Zacher, H., & Ashkanasy, N. M. (2015). Employee green behavior: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multilevel review, and future research agenda. *Organization & Environment*, 28 (1), 103-125.
- 23.Paillé, P., Chen, Y., Boiral, O., & Jin, J. (2014). The impact of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on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An employee-level study.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121, 451-466.
- 24.Preacher, K. J., Curran, P. J., & Bauer, D. J. (2006). Computational tools for probing interactions in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multilevel modeling, and latent curve analysis. *Journal of educational and behavioral statistics*, 31 (4), 437-448.
- 25.Robertson, J. L., & Barling, J. (2013). Greening organizations through leaders' influence on employees' pro - environmental behaviors. *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34 (2), 176-194.
- 26.Steg, L., & Vlek, C. (2009). Encouraging pro-environmental behaviour: An integrative review and research agenda.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29 (3), 309-317.
- 27.Stern, P. C. (2000). New environmental theories: toward a coherent theory of environmentally significant behavior.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56 (3), 407-424.
- 28.Tuan, L. T. (2020). Environmentally-specific servant leadership and green creativity among tourism employees: Dual mediation paths. *Journal of Sustainable Tourism*, 28 (1), 86-109.

房地產企業績效風險的影響因素研究

——基於我國上市房地產企業資料的實證研究

周團¹ 李新²

摘要：近年來，隨著恒大等房地產公司的暴雷事件出現，房地產行業風險徹底爆發，人們更加關注到影響房地產企業績效風險的成因。文章以 2010 年—2020 年 211 家房地產上市企業的有效面板數據為基礎進行實證研究，分析了影響房地產企業績效風險的因素，並結合結論提出風險應對措施的建議，為房地產企業績效風險控制提供參考，推動房地產行業的健康發展。

關鍵詞：房地產、企業績效、風險、影響因素

一、引言

隨著房地產行業的不斷發展，對其行業風險的研究能使得房地產企業如何預防及處理其所出現的風險。如果不及時發現並妥善處理企業風險，將對企業造成嚴重危害，影響難以消除，將中斷企業運營，削弱盈利能力，使後續融資困難。進而出現最壞的結果便是企業破產。本文能有效識別企業風險，瞭解其成因，關注風險的危害，準確判斷企業風險，進而有效控制風險，從而使得企業管理更為高效，能使企業在市場競爭中充分利用其所有資源。因此，良好的企業風險分析與控制對於企業保持競爭優勢、在市場上立於不敗之地具有無可比擬的重要性。

二、文獻研究綜述

國外學者對收益率和企業風險的關係開展的研究較早，近年來仍然展開了大量研究。Fitzpatrick（1932），在研究19家企業的資料之後，將這19家公司分為兩組：正常運營、危機控制。研究兩組結果發現，對如何區分企業起決定性作用的指標是：產權的比率、淨資產的收益率。經過多次研究和實地驗證，Jan & Sue（2005）在研究了多家企業的財務指標

¹ 周團，澳門科技大學商學院工商管理博士研究生。

² 李新，澳門科技大學商學院副教授，澳門青年研究協會理事。

資料後，將現金流量/總負債作為核心指標。他的觀點是：研究和計算公司狀況，同時進行風險分析最核心的問題是負債率。站在企業業績的角度對企業風險進行衡量的常用指標一般是收益的波動率，Boubakri, Cosset, & Saffar (2013) 等學者認為資產報酬率的波動會是企業的影響因素；其二是企業股票回報率的波動率 (Bargeron, Lehn, & Zutter, 2010)；其三是關於公司盈餘最大值與最小值的差額 (Boubakri et al., 2013)；

我國第一個用效益評價方法計算企業效益的學者是張彥 (2004)。他使用的方式是：首先建立一個可以衡量企業價值的類別來對比企業利益的價值如何。之後分為兩種情況，一是企業的價值在設定的範圍內，這意味著企業發展穩定、效益良好；二是企業的價值超出設定範圍，這意味著公司效率較低、正在改革或陷入危機。梁惠蘭 (2006) 認為，識別風險的必備工作是分析風險的資料，然後再是根據企業財務等資訊對風險進行衡量，同時通過管理，對風險進行控制，從而降低企業陷入風險的情況發生。邢莉 (2010) 提出分析房地產行業及企業的風險成因並將其歸納為內部、政治、市場及自然四類因素，但同時她認為房地產企業的風險包括投資風險、融資風險和資本回報風險。李憲 (2014) 認為，房地產的風險分析應該從融資風險、投資風險等方面對老年人進行分析。黃豔蓓 (2019) 研究分析了許多企業的風險，並將房地產行業的財務風險類型劃分為：1.籌資風險；2.投資風險；3.營運風險；4.償還風險。

本文通過對學者們研究方法的借鑒，及對房地產行業和房地產企業風險管理機制的實證分析研究，從房地產行業的風險度量和控制機制、房地產企業績效風險管理和控制機制兩個方面來考察現今市場在實際發展的房地產企業內的風險管理和控制中是否發揮了作用，為優化房地產行業企業集團的風險分析與控制提供參考。

三、研究變量選取和假設分析

(一) 變量選取

結合了前人學者相關文獻中提及的各種觀點，進而梳理並歸納了對房地產企業績效風險的影響因素，來作為研究變量。以房地產企業淨利潤作為反映房地產行業風險影響因素的指標，從庫存周轉率、海外營業收入占比、資產負債率、總市值、營運資金和流動資產六個方面考察了房地產企業績效風險的影響因素。具體如下：

表 1-1 變量說明表

變量類型	變量名稱	代碼
被解釋變量	淨利潤	NP
解釋變量	庫存周轉率	ITR
	海外營業收入占比	OI
	資產負債率	TDR
	總市值	GMV
	流動資產	L.A.
	營運資金	WC

(二) 研究假設分析

根據相關文獻對企業風險管理因素的各项觀點，本文選取了涉及房地產企業的風險管理的相關文獻為研究基礎，建立實證模型，從而探討房地產行業風險的影響因素，提出以下六個研究假設。

1、庫存周轉率與淨利潤正相關。

隨著庫存周轉率提高，總資產報酬率則相應有增加，這是馮傑（2016）的觀點。當在一定時期內銷售額相同的情況下，對應的銷售產品成本則處於相同情況下，庫存周轉率提高，可得年度平均庫存就越小，則用於生產成品的資金隨之越少，那相應毛利率則會越高，隨之淨利潤也隨之越多。

2、海外營業收入占比與淨利潤負相關

認為海外業務收入與淨利潤有非常顯著的關係，是亢瑾（2018）的觀點。同時由於國內房地產市場相對飽和，那房企則考慮借鑒國內房產開發經驗拓展到海外開發，但海外開發受限於海外國內的政局及政策，還有當地的人文環境、建材開發人工材料機械的價格影響，往往項目開發易夭折，如 2016 年碧桂園擬對馬來西亞的豪宅項目—森林城市投資 2500 億人民幣，但 2018 年馬來西亞政府對外宣佈禁止碧桂園在“城市森林”項目向除馬來西亞本地居住的外國人銷售，而且馬來西亞政府不會因為森林城市的居住權而向外國人發放簽證，現項目早已暫停，投入費用已經無法收回，這完全影響到碧桂園整體淨利潤收益。

3、資產負債率和淨利潤負相關

不同行業不同細分領域資產負債率和淨利潤的關係也不同，是闕夢婷（2021）的觀點。

資產負債率是說明公司舉債來經營的程度，這是評價公司負債的較為核心的指標。而近 10 年來，房地產行業的利潤率經過國家政策調控趨於較為穩定，而資產負債率提高則勢必會使得要償還債務多，隨之淨利潤會減少，所以資產負債率和淨利潤呈負相關關係。

4、總市值與淨利潤正相關

王陽（2017）在對上市公司的市值研究過程發現市值管理對企業的淨利潤有顯著的影響。假設未來預期的市場規模變小，相應行業發生非正向變化，這些都是市值無法增長的主要原因。而特別是股價，它是由市場和公司業績來共同決定的。這其中，短期股價會受投資行為影響，而公司業績則決定長期股價。而在公司業績保持穩定情況下，市值和淨利潤呈正相關關係。

5、營運資金和淨利潤正相關

劉曉虎（2018）的觀點是在農業板塊的上市公司方面，其公司的績效（淨資產收益率）受營運資金的管理影響。營運資金對於企業實現目標利潤的影響程度較為關鍵，同時它在企業採購業務等經營管理活動的影響也很大。通俗來說，如果企業有較好的淨收益，這就需要需要企業的經營活動能創造獲利能力，而這類經營活動則需要營運資金來支援，反之如經營活動都難以開展，何來獲利一說。當然企業有了淨利潤，自然也是需要分配給營運活動的資金。由此營運資金和淨利潤成正相關。因為要保證企業的高效運轉，那麼做好營運資金的有效管理是尤為重要。

6、流動資產和淨利潤正相關

其中，陳致成（2021）在對房地產行業研究中，發現流動資產是房地產行業中非常重要的一個指標。流動資產有①貨幣資金、②應收票據、③應收賬款、④存貨、⑤短期投資等。它是企業中流動性最快、支付能力最強的資產。貨幣資金是即期現金，應收賬款是隨時收回的現金，存貨是隨著銷售的實現而變現的現金。這些資產的數量直接影響企業支付現金的能力。如果比率顯著，則表明企業當前的資產結構相對合理，有足夠的可變現資產作為擔保。相反，它表明企業的大部分流動資產是待處置資產、待攤銷費用和相對固定或費用化的帳面資產。這些資產是企業需要消化的費用，不能用於償還債務，但會消耗和侵蝕企業利潤，所以流動資產和淨利潤正相關。

（三）模型構建

本文是對房地產行業風險的影響因素的研究，採用回歸分析法對房地產企業的淨利潤和各個財務指標之間的關係進行研究，看各變量間是否存在線性關係。

$$NP = \beta_0 + \beta_1 ITR + \beta_2 OI + \beta_3 TDR + \beta_4 GMV + \beta_5 L.A. + \beta_6 WC + \sigma$$

本文通過 Stata 軟體進行回歸分析，可得各項回歸係數，後續再結合該係數估計的顯著性來說明回歸效果，從而來分析實證的結果。

四、實證分析

(一) 描述性統計和相關性分析

1、描述性分析

本文運用 Stata 軟體來對 2010-2020 年 211 家房地產上市企業樣本各項變量進行了描述性分析，結果如表 5-1 所示。

表 4-1 描述性分析結果

Variable	Obs	Mean	Std. Dev.	Min	Max
庫存貨周轉率	864	17.40049	121.5562	0	2067.66
海外營業 收入占比	864	0.0113999	0.0703683	0	1.265853
資產負債率	864	0.5680032	0.195106	0.0159356	1.289619
總市值	864	8.85E+09	1.07E+10	3.16E+08	9.28E+10
流動資產	864	2.40E+10	5.22E+10	8515294	4.41E+11
營運資金	864	7.76E+09	1.61E+10	-1.59E+10	1.56E+11
淨利潤	864	5.62E+08	1.66E+09	-9.65E+09	1.65E+10

通過表 4-1 描述性分析結果可知，在 211 家房地產上市企業 132 月的資料中，共 864 個觀測樣本，庫存貨周轉率的均值為 17.4%，海外營業收入占比的均值為 1.14%，資產負債率的均值為 56.8%，總市值的均值為 88.5 億，流動資產的均值為 240 億，營運資金的均值為 77.6 億，淨利潤的均值為 5.62 億。

2、相關性分析

對變量間進行相關性檢驗是線性回歸分析的前置步驟。相關係數值，當值大於零時，則說明變量間呈正向關係，反之則為負向關係，同時當它的絕對值小於一時，則說明變量間存在一定的線性相關關係，其它情況則說明完全線性關係。因此，在建立房地產企業風險與房地產各風險因數相關性的實證模型之前，需要獲得各變量之間的相關係數。給出如下結果：

表 4-2 各變量相關分析

	ITR	OI	TDR	GMV	L.A.	WC	NP
ITR	1.0000						
OI	-0.0183	1.0000					
TDR	-0.0322	0.0003	1.0000				
GMV	-0.0252	-0.0253	0.2902	1.0000			
L.A.	-0.0470	-0.0436	0.4142	0.7718	1.0000		
WC	-0.0579	-0.0370	0.3725	0.7061	0.8998	1.0000	
NP	-0.0331	-0.0849	0.2766	0.7401	0.8	0.6954	1.0000

根據表所示的分析結果：與研究假設一致。指標與房地產企業淨利潤正相關分別為資產負債率、總市值、營運資金、流動負債。相關係數由小到大的排位元順序是資產負債率、營運資金、總市值、流動資產。指標與房地產企業淨利潤負相關分別有庫存周轉率、海外營業收入占比。

(二) Hausman 檢驗

由於本文樣本資料為面板資料，且根據 Hausman 結果（如下表）顯示卡方統計量為 145.58，相應的伴隨概率為 0.0000，所以為追求模型的穩健性，本研究採用固定效應模型。

表 4-3 Hausman 固定效應檢驗結果

	(b)	(B)	(b-B)
	RE1	FE1	Difference
ITR	79425.04	177188.9	-97763.89
OI	-1.20E+09	-1.22E+09	1.57E+07
TDR	-4.05E+08	-4.00E+08	-4300149
GMV	0.0415868	0.0216213	0.0199656
L.A.	0.021825	0.0136938	0.0081312
WC	-0.0090167	0.0207137	-0.0297304
_cons	-9211945	1.19E+08	-1.28E+08
chi2 (4) =145.58			
Prob>chi2 = 0.0000			

(三) 線性回歸

通過對相關文獻的研究和比較，線性回歸模型最常用的經驗方法是多元線性回歸，該

模型主要用於論證多個引數對唯一因變量的解釋。

由於房地產企業的淨利潤是房地產企業最重要的參數標準，以淨利潤為被解釋變量，庫存周轉率、海外營業收入占比、資產負債率、總市值、營運資金和流動資產的六個指標為解釋變量。針對房地產行業風險影響因素的多元線性回歸方程（公式 4.1），其具體結果如下：

表 4-4 影響因素的線性回歸

NP	T	P> t
ITR	0.64	0.523
OI	-2.62	0.009
TDR	-1.63	0.104
GMV	3.81	0.000
L.A.	7.05	0.000
WC	3.49	0.001
R-squared=0.6523		

上表顯示了以房地產淨利潤為因變量的多元線性回歸模型。回歸結果顯示擬合效果很好，其中 R 方接近 0.7。

從多元線性回歸模型引數對因變量的回歸分析結果中可以看出海外營業收入占比和營運資金在 5% 的水準上顯著，總市值和流動資產在 1% 的水準上顯著。可以看出影響房地產銷售價格的影響因素從大到小依次為流動資產、總市值、營運資金、海外營業收入占比。

（四）共線性問題

對變量間進行相關性檢驗是線性回歸分析的前置步驟。因此，有必要在回歸建模之前檢驗共線性問題是否存在。常用的測試方法包括計算相關係數法（因為相關係數是線性相關的度量）和方差擴展因數法（VIF 大於 10，表明解釋變量之間存在顯著的共線性）。

根據下表得知，該模型無共線性問題。

表 4-5 變量的共線性

Variable	VIF	1/VIF
L.A.	6.80	0.147165
WC	5.27	0.189811
GMV	2.49	0.402344
TDR	1.21	0.825761
ITR	1.00	0.995582
OI	1.00	0.997061
Mean VIF	2.96	

(五) 回歸結果分析

根據前文得出海外營業收入占比、總市值、流動資產、營運資金四個變量為顯著。因此得出以下分析，海外業務的開發風險居高，收益較差，因此對淨利潤成反向相關；淨利潤增加導致企業未分配利潤增加，也就是所有者權益增加，導致總資產增加，負債不變的情況下由於淨利潤增加最終使得負債率下降；該行業企業規模越大，消費者信任度越高，可以獲取的資源越多，營運資金對於企業實現目標利潤的影響程度較為關鍵，同時它在企業採購業務等經營管理活動的影響也處於重要地位，因為要保證企業的高效運轉，那麼做好營運資金的有效管理是尤為重要。企業總資產中當流動資產占的比重較大時，說明企業資金周率越高、具有越強的變現能力。

表 4-6 變量影響

被解釋變量	解釋變量	影響方向	是否顯著
NP	ITR	+	否
	OI	-	是
	TDR	-	否
	GMV	+	是
	L.A.	+	是
	WC	+	是

五、結論與建議

基於以上對房地產企業績效風險的理論和實證分析，提出以下建議：

（一）宏觀建議

1、拓展融資管道，進行多元化融資

拓寬融資管道，採取多種融資策略，有利於削弱實際房地產企業對金融機構貸款的依賴性，並能在一定程度上正確降低實際房地產企業的經營機會和資金壓力。目前房地產市場上所採用的融資方式大多為自籌資金、銀行貸款、債券融資、庫存融資等，這些融資方式各有特點。自籌資金的好處是，它受外部環境的影響要小得多，但同時又與實際房地產企業的運營聯繫在一起，銀行貸款的融資風險小，但抵押期不長，債券融資由於我國債券市場規模較小，其在實際房地產企業融資中所占份額特別不大，存貨融資的優勢是融資量大，但門檻高。所以單一的融資方式已不利於房地產企業的可持續發展。因此，在新形勢下，房地產企業要想提高自身的競爭力和改善能力，就必須拓寬融資管道，提升多元化融資水準。例如，通過與上下游企業的合作改善，包括分配合作和公平分配，可以實現共存共贏。

2、強化內部管理

在現階段經濟環境下，我國房地產市場的競爭非常激烈。在新的形勢下，實際的房地產企業開始加強內部管理，這不僅可以幫助自己融資以獲取更多的營運資金，正確地操作營運資金，而且還有利於企業的日常運營。此外，房地產企業通過加強內部管理，這可以提高競爭力以應對外部環境的不穩定性。同時也可以學習標杆企業的管理知識，研究先進的經營管理模式，找到切合到公司實際的最優經營模式。此外，房地產企業要接受社會各方面對其的監管，從中多總結多改進，樹立自身的品牌和社會口碑。

3、建立健全融資預算管理體系

得當的財務管理一直來在企業運行中體現著舉足輕重的作用。所以，要想提高解決房地產企業融資問題的能力，化解其在經營活動中遇到的融資困難，那麼房地產企業應該實施融資成本區間管理制度。在融資財務管理的體系上，房地產企業需做好對融資成本區間管理的正確把握。其次，在實施融資成本區間管理時，要保持和企業的戰略高度一致，適時調整，這樣更能體現企業的生命力。最後，實施的融資成本區間管理要適時更新，要結合到市場的變化和企業內部環境的變化進行修改。只有把該管理貫穿於公司的經營活動當中，保持著先行切實的發展節奏，才能進行良好的融資。

（二）微觀建議

1、建立項目投資決策機制

要全面掌握擬投項目的實際情況，在決策階段要提高風險控制的敏感度，強化工作效率，推行實用性強的的方案。在項目開發的各階段，針對各種切實可行的方案，並對其進

行全過程分析評價，為項目決策提供科學可靠的依據。要全面梳理項目情況和深入研究各階段的重難點，研究過程應從淺入深、從粗到細，逐步達到滿足決策要求。供項目決策的研究而可結合實際情況進行分析，以下列出較為共性的幾點：

1) 立項成否研究。與國家、地方的經濟發展和區域發展規劃及城鄉規劃等相應規劃的符合性，符合到產業政策的要求，同時與公司發展相匹配性及後續運營條件成熟度。

2) 輸出成果的市場研究。重點關注項目開發產品是否符合市場需求及建設規模是否符合需求量大小。

3) 對比並選擇創新先進、切實可行、性價比高的項目建設方案。

4) 對項目開發運營所需資金進行估算，要重點考慮其生存能力。

5) 多維度分析。結合社會、經濟、資源、環境影響及安全衛生等各方面進行分析，還有與所處環境是否和諧。

6) 風險防範。根據項目情況及周邊環境預估項目存在的風險，做好防範和降低風險的預案。

7) 對上面所提及的內容進行評估，得出其能否符合到各項建設達成的目標，提出分析結果。

8) 就上述內容中如有開發或運營的問題，提出應對方案的解決建議。

2、加強融資管理能力，並進一步規範。

要點細則如下：

1) 房地產企業應根據公司的全年銷售計畫和全年預算來確定擬籌資的方案，該方案要明確擬用於投資項目的情況、規模和資金結構等內容，同時要做好針對籌資所引發的潛在風險的全面評估。

2) 針對籌資方案，公司已嚴格按照制度進行論證，涉及較大融資方案可聘請有相關資質的諮詢機構進行調差研究，形成報告供公司決策，從而全面評估所涉及風險。同時企業對該籌資方案嚴格進行報批。

3) 根據已批准的籌資方案，公司需嚴格按照公司制度及法律法規來辦理籌資手續。公司可參照常規公司的籌資舉措，如銀行借款、發行債券、發行股票等，這各種籌資舉措也都會有針對性的風險預防。同時房地產公司融資更為靈活多樣，如參建方墊資，以獲取項目的參建機會而使得工程款延緩支付，再如參建方以工程款換取開發項目的住宅商業等，畢竟住宅和商業也是市場流通比較好的，這種方式無形就等於開發商借用參建方的資金來實施項目。當然以上各種籌資方案在實施過程中，得預防相應的潛在風險。

4) 針對籌資的使用，一定要做到專款專用，嚴謹擅自調整其用途，該項要經公司嚴格審批。同時要加強籌資所帶來的還本付息的管理，合理分配資金使用，避免不足或閒置。

3、加強應收款管理及催收

公司應重視應收款的管理，財務部作為核對和協助部門，要把所涉及的業務往來賬都

下發到負責應收款的相關子公司或分公司、部門及其負責人。每月都要向營銷負責人、工程負責人、物業負責人等發放應收賬款月報。房地產行業業務覆蓋面廣，除常規的住宅、寫字樓及商戶等出售外，還涉及租賃業務、代建業務及金融等，如在房地產行業內有種普遍現象，往往在項目完工後待售期間，房地產將住宅、寫字樓及商戶優先售給參建單位，一方面通過抵扣工程款來緩解了房地產公司的資金壓力，一方面也滿足參建單位元的購房需要。所以房地產公司的應收款範圍也很大，所有應收款均按賬齡進行登記，財務部負責每月彙報公司高層，且同時下發應收款的月報（包含上月應收款情況及本月應收款計畫等）。

公司各應收款的責任公司、責任部門及負責人應即時和客戶保持溝通，並進一步明確應收款的回款時間，同時公司財務部也及時和客戶公司財務階段性發送和回收往來賬款確認單，並由此督促客戶和公司的應收款責任人跟進。借鑒很多公司績效考核的經驗，可把應收款的處理作為業務部門或相關責任人的考核指標，並將該考核與個人薪酬掛鉤，以此來激勵責任人。

應收賬款出現逾期、毀約等問題時，應讓房地產公司法務部門介入，有必要的話可提起訴訟或報警，具體如客戶欺詐等問題的出現。

4、加強項目全過程管理

因房地產佔用資金量大且週期長的特點，所以項目全過程管理則尤為重要，可以這樣說，項目管理的好壞決定項目成敗。全過程圍繞估概預結的成本主線路，按照品質原則、成本原則、進度原則三原則，展開了競拍土地、立項報建、組織招標、工程實施、竣工驗收、備案取證等一系列活動，競拍土地和立項報建就不多說，多數結合土地所在地區的政策方針來辦理，而招標、工程實施則為項目管理的重點，招標可有多種形式，現今房地產行業較為常見有三大類：①總承包及管理。該類發承包模式在政府項目很常見，其特點有利於所開發項目的成本控制，往往在投標階段以費率或總價包乾形式對項目造價進行明確，同時也有利於項目組織管理、工程品質控制及縮短建設工期。②平行承包模式。該類發承包模式在民營開發項目較多，這也是由民營開發商有限的資金量和追求深度利潤來決定的，平行分包最大的特點是開發商的管理力度更強，會擇優選取承包單位，同時通過各專業分包的選擇在很大程度上對項目成本就進行深度挖掘，但這種管理對開發商的管理要求很高，組織和協調工作量巨大。③代建制。目前珠海橫琴大多項目均由大橫琴股份有限公司代建，這種情況也發生在政府項目或境外公司投資項目居多，出資方只需要把目標明確和資金落實到位，由代建公司全程負責。項目實施管理既要把控好工地現場的各項品質問題，還要即時監督其進度情況，這其中如把項目各專業及工序實施得當，可避免較多變更簽證及工期的耽誤，但相對前兩種方式會有代建費用。後續的驗收辦證按照項目所在地的規章辦理即可，所以項目管理的側重點在於招標和項目實施，從而控制好開發項目的各項目標。

參考文獻：

- 1.王陽（2017）。上市公司市值管理研究——以樂視網為例。河南大學碩士論文，18-19。
- 2.亢瑾（2018）。華為公司外匯風險管理案例分析。河北經貿大學碩士論文，III。
- 3.李憲（2014）。如何運用財務指標分析發現企業可能潛在的財務風險。現代商業，（35），239-340。
- 4.邢莉（2010）。淺析房地產企業財務風險及其防範機制。財經界（學術版），（05）。
- 5.馮傑（2016）。上市公司盈利能力分析——以萬科集團為例。山西農經，（08），87-89。
- 6.陳致成（2021）。房地產企業營運資金管理優化研究——以A房地產公司為例。產業經濟，（18），136-138。
- 7.黃豔蓓（2019）。房地產行業財務風險的防範策略分析。財務學習，20-21。
- 8.梁惠蘭（2006）。企業財務風險識別與防範。北方經濟，（6），52-53。
- 9.張彥（2004）。微觀經濟杠杆合理值域的確定及其實證分析。華南理工大學報，（4），39-42。
- 10.劉曉虎（2018）。新疆農業上市公司營運資金管理對企業財務績效影響研究，新疆農業大學碩士論文，29-47。
- 11.闕夢婷（2021）。中國上市公司資本結構與企業績效關係研究。吉林大學碩士論文，26-57。
12. Barger, L.L., Lehn, K .M, & Zutter, C. J. （2010）. Sarbanes-Oxley and Corporate Risk-Taking.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49（1-2）, 34-52.
13. Boubakri, N., Cosset, J., & Saffar, W., （2013）. The Role of State and Foreign Owners in Corporate Risk-Taking: Evidence from Privatization. *Journal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108（3）, 641-658.
14. Fitzpatrick, P, J. （1932）. A Comparison of Ratios of Successful Industrial Enterprises with Those of Failed Firms. *Certified Public Accountant*, 598-605.
15. Jan Williams & Sue Haka. *Financial and Managerial Accounting*（13th Edition）. Beijing: Mechanical industry press,2005, 123-129

澳門婚育政策探討

余惠鶯¹ 黃翠萍² 張雲³

摘要：當今不少發達國家和地區受人口老年化和少子化問題困擾，經濟社會發展競爭力和活力持續下降。比較過去五年，澳門出生率和結婚率都呈現出持續下降的趨勢，初婚年齡中位數則呈現出持續上升的趨勢，儘管離婚率有下降的趨勢，但仍然每年高達逾千宗個案登記。不難預見，澳門未來人口會持續減少和進一步老化，將影響澳門經濟發展並將削減整體競爭力，而婚姻問題所引致的連帶社會問題亦會逐步湧現，為此，建議當局和社會多管齊下：（1）與時俱進，持續優化生育政策；（2）借鑒經驗，推動生育鼓勵措施；（3）未雨綢繆，積極應對離婚衍生的社會問題，從而破解困局。

關鍵詞：澳門；婚育；問題；政策

一個國家或地區的人口發展水平直接影響到經濟社會發展的水平 and 活力，當今不少發達國家和地區受人口老年化和少子化問題困擾，經濟社會發展競爭力和活力持續下降。目前澳門同樣面臨有關問題而且呈現出日漸嚴峻的趨勢，亟待澳門特區政府和社會各界繼續加強重視，採取更有力的措施加以應對和改善。

一、澳門的婚育情況

根據早前澳門統計局公佈的 2022 年人口數據顯示，本澳出生率僅為千分之六點四，初生嬰兒數量按年減少 682 名，創近 40 年的歷史新低；截至 2022 年底，全年有 2,727 宗結婚登記，按年減少 550 宗；男女性的初婚年齡中位數持續上升，分別增加 0.5 歲及 0.6 歲至男性 30.9 歲、女性 29.2 歲。而離婚登記方面，共有 1,106 宗，按年減少 209 宗。比較過去五年的情況，出生率和結婚率都呈現出持續下降的趨勢，初婚年齡中位數則呈現出持續上升的趨勢，儘管離婚率有下降的趨勢，但仍然每年高達逾千宗個案登記，有關情況值得特區政府和社會關注和探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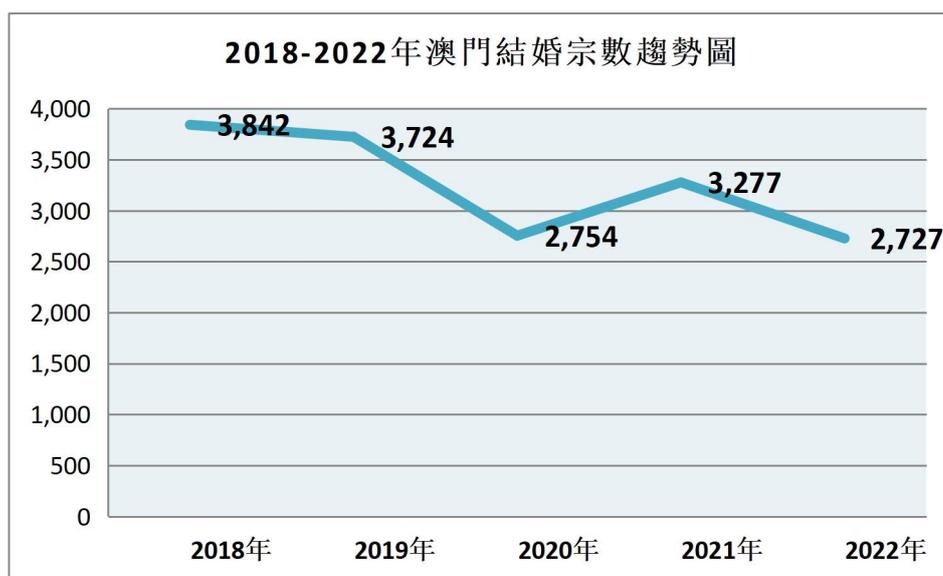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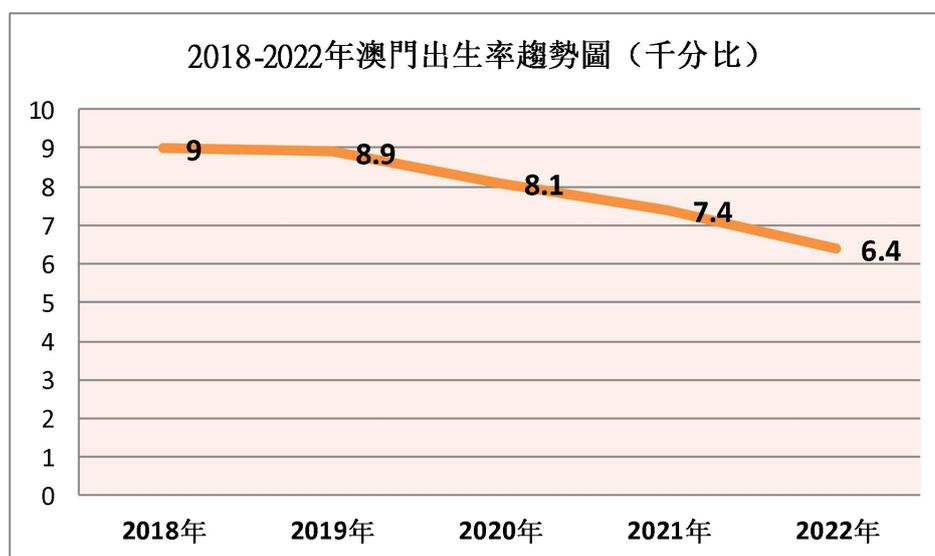
¹ 余惠鶯，澳門鏡湖護理學院助理教授，澳門青年研究協會會員大會副主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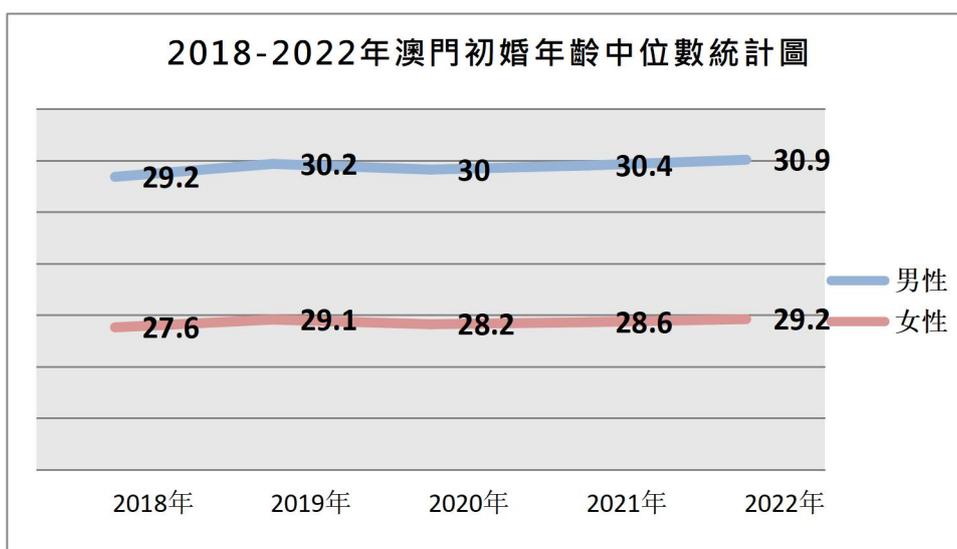
² 黃翠萍，澳門鏡湖護理學院助理教授。

³ 張雲，澳門鏡湖護理學院講師。

年份	出生率 (千分比)	結婚宗數	結婚比率 (千分比)	初婚年齡中位數		離婚宗數	離婚比率 (千分比)
				女	男		
2018	9	3,842	5.8	27.6	29.2	1,544	2.3
2019	8.9	3,724	5.5	29.1	30.2	1,435	2.1
2020	8.1	2,754	4.0	28.2	30	1,319	1.9
2021	7.4	3,277	4.8	28.6	30.4	1,315	1.9
2022	6.4	2,727	4.0	29.2	30.9	1,106	1.6

(澳門婚育情況整理表)





二、存在的主要問題

出生率的大幅變化對個人、家庭、社會經濟、環境、文化與政治生活都帶來各種影響。出生人口下降，影響到勞動力要素的供給，在一定條件下，勞動力短缺將制約經濟的潛在產出水平。還會影響居民的消費水平與消費結構，老齡化可能制約總需求的擴張，從而使經濟面臨總需求不足的長期制約。年輕勞動力是社會創新的主體，也是產業升級的關鍵要素，這類勞動力的短缺會令到社會整體創新能力有所下降。而且低生育率會帶來高齡化問題，引致財政問題。退休人員之所以有退休金領，或者有人照顧，都是因為勞動年齡人口

在提供產出——無論是政府向他們徵稅來支付退休金、或者年輕人實際付出勞力照顧長者。因此，低生育率會導致更高的稅收、更晚的退休年齡、更低的存款利率回報，以及可能的政府預算危機。

有不少經濟學家指出，勞動人口減少，將壓低實際利率，因為投資機會將減少。生育率減少還會造成一個更大的經濟損失，就是社會的創新不足，導致生產力停滯不前。有心理學家指出，年輕人擁有“流動智慧”，也就是解決新問題和接受新想法的能力；而年長的人更偏向“結晶智慧”，也就是隨著時間累積關於事物如何運作的既有知識。研究顯示，流動智慧往往在成年初期達到高峰，並在 30 多歲時開始下降。企業、產業和經濟體需要流動智慧，也需要結晶智慧，但在創新方面，流動智慧又顯得更加重要。

低生育率和老齡化對企業家精神的抑制是毀滅性的。從日本的教訓來看：（1）大部分企業裡，中老年人的比重都在不斷提升，年輕人很難有出頭的機會。尤其在適合創業的 30 歲年齡段，很難在重要的崗位得到歷練。（2）人口下降，國內市場萎縮，導致初創企業普遍缺乏投資和擴張的願望，不願做大。（3）老齡化導致整個社會心態消極，對新生事物，新興產業缺乏興趣。

據統計局《澳門人口預測二〇一六 / 二〇三六》中預計，澳門撫養比率將隨人口老化持續上升，當中老年人口撫養比率甚至急速上升，由 2016 年的 12.7 名升至 2036 年的 30 名。加上社會快速發展，生活成本日益提高，養兒育女的成本不斷增加，不少家庭考慮到，沒有一個良好的經濟基礎，無法為子女提供優質的成長環境，將會進一步減低家庭生育的意願。可以預見：澳門未來人口會持續減少和進一步老化，將影響澳門經濟發展並將削減整體競爭力，造成澳門出生人口下降的成因複雜多樣，亟待破解。

生育率不斷下降，對本地社會結構和經濟發展帶來的影響深遠。主要原因總括而言，大致包括青年人婚姻觀弱化，遲婚、獨身比例增、離婚率急升；工作繁重致時間及精力不足；收入不穩和減少；育兒經濟負擔重；對提供良好的教育缺乏信心；房屋問題及居住環境不理想，且住房開支負擔沉重。也有擔心生活質素下降或喪失自由、擔心管教或兩性關係，甚至有育兒婦女受職場歧視，因而對他們生兒育女的意願造成一定影響。實際上，生育主要取決於個人取向，但是外部的社會環境營造的氛圍也會構成一定影響。例如，在現實生活中，很多家庭都會憂慮生育及養育子女的負擔，一旦有關情況加重，會對有意願生育的群體無形中構成心理阻礙。因此在這方面，除了家庭本身需要透過努力工作賺取收入來養育子女之外，政府和社會各界在也需要承擔一定的責任，因為一旦社會沒有適量穩定的人口規模，其他各方面的發展都很難推進。特區政府應從有關方面加強工作，破解生育率持續下降的難題。

而據澳門婦女數據資料庫顯示，2013-2022 年間，平均每年逾 1300 宗離婚個案，這個數字還不包括未正式註冊或夫婦長期分居的隱性數字。可以預見：（1）連帶社會問題湧現，最明顯是單親家庭增多，對下一代的成長造成缺陷；（2）引發大量青少年問題；（3）對

下一代婚姻觀的影響等。因此，社會除了必須加強婚姻家庭教育，推動更多夫妻認清婚姻中雙方的問題，協助他們坦誠溝通外，若夫妻關係確實無法挽回，更重要的是協助離婚的夫妻繼續履行父母職責，減低對孩子的傷害和影響。

三、優化婚育政策建議

（一）與時俱進，持續優化生育政策。

生育是一個關係家庭和社會發展的大問題，世界不少面對低生育率問題的國家和地區，對有關問題基本都是高度重視，並積極採取措施去應對。而綜觀世界不少訂定鼓勵生育政策的地方，試圖減緩生育率下跌趨勢的措施一般包括提供良好免費的產檢醫療服務，給予財政支持、稅務優惠、足夠的育兒假期，實施彈性工作制度，以及資助托兒服務等。除此之外，不少地方亦投入大量資金在父母現金津貼、在婦女生產前後及不同育兒階段發放現金津貼。還有一些特別的措施包括新加坡所設由父母及政府共同供款的儲蓄基金，以及獲編配資助房屋的優先權；匈牙利為合資格嬰兒父母提供貸款；以色列為夫婦或單身女性提供全面輔助生育科技支援。當中，新加坡的生育政策被譽為亞洲最積極全面，除了上述的供款及配屋優先權，還有嬰兒花紅現金獎勵；女性有薪產假達 16 周，男性有 2 周侍產假，明年起增至 4 周。此外又訂立“有薪育兒假”，增加親子時間；同時資助企業提供靈活工作安排。

從早前澳門統計局公佈的 2022 年人口數據可看出，澳門少子化問題日益嚴峻，提升生育率的工作亟待加強。為了推動本澳的生育率，特區政府近年作出了一些努力，包括關注鼓勵生育和推動家庭友善的政策措施，各政府部門配合落實“澳門婦女發展目標”，關注家庭友善政策，推動男女共同承擔家庭責任，以及優化公共服務，有關工作值得肯定。但面對出生率創下有記錄以來的新低，仍需進一步思考如何進加大完善生育政策。

受三年疫情影響，出生率下降有所難免。然而，值得關注的是，參考經濟合作組織資料，家庭或兒童津貼的公共開支投入，與總和生育率呈正相關；本澳曾有團體在疫情期間開展研究，指出經濟狀況是影響生育意願的最主要因素之一。加上本澳最近一份的人口政策諮詢及研究報告距今已十年及八年之久，當時未有新冠疫情的影響，難以回應當今社會的發展和現狀，因此，建議：（1）特區政府必須在現有措施的基礎上，儘快制訂更全面和系統的生育政策和目標，以便對不同時期的生育率及公共開支投入等作出相關對策及工作時間表；（2）加強對居民在生育及養育成本上支援的涵蓋面及力度，並透過頂層的政策設計和規劃，制定完整的生育政策、目標、指標及工作時間表，確保本澳各項鼓勵生育措施是從上以下，由面到點地作出配合；（3）以構建一個立體的、全方位的、積極的生育政策及規劃，更好地鼓勵及提升市民的生育意願，應對少子化問題。

（二）借鑒經驗，推動生育鼓勵措施。

短期來看，不少國家和地區通常透過經濟政策鼓勵生育，有關措施是能夠立竿見影的方法。例如，在歐洲，大部分家庭及兒童津貼開支相對較多的國家，總和生育率往往更高。但各地政府仍需因應不同社會文化背景及制度環境，來因地制宜制定鼓勵生育政策。就澳門而言，經濟鼓勵政策能發揮一些作用，解決一些問題，但實際效果顯示，並非單一的經濟鼓勵政策能夠很好解決問題，需要綜合考慮其他政策制度的作出配合，有針對性的解決好社會群體尤其青年群體面對的一些其他困難和障礙，政府應考慮透過不同政策作出支援，實施更多惠及生育的措施，盡力減少生育的阻礙。誠然，在應對有關問題上，政府責無旁貸，但家庭、企業、社會服務機構、學校、社區服務中心等也扮演重要角色，因此需要各方面戮力合作，共同推動生育政策不斷優化和有效落實，營造出全社會共同關心生育的氛圍。如針對婦女需兼顧工作與照顧家庭，企業能夠努力實施家庭友善政策，協助雙職家庭平衡工作與育兒需要。又如可以加強女性的職業保護，對孕期、哺乳期女性給予補貼，對女性再就業或家庭主婦給予幫助和關懷。此外，根據一些地區的經驗來看，房價居高不下，是降低家庭的生育意願的重要原因，對此，增加適合的房屋供應，降低家庭購房的實際支出，以此降低生兒育女的成本，提高生育意願。

鼓勵生育，直接經濟援助是十分重要的措施之一。以新加坡為例，該地政府自 2001 年推出“嬰兒花紅現金獎勵計劃”，首二名出生子女可分期獲發 8,000 新加坡元（約 4,8500 澳門元）的一次性現金獎勵，三名或以上的派發金額更會增至 10,000 新加坡元，並設有“在職母親稅務扣減”、家長稅務回扣，以及持續到幼童 6 歲的育兒補貼等；相比之下，本澳現有生育津貼的確起到了一定程度的經濟援助，有關津貼自實施後亦大幅調升至目前的 5,418 澳門元，但相較照顧初生嬰兒及其後產生的支出而言，援助力度的確有所不足。有需要評估現時有關津貼的成效後，以更積極進取及主動的取態，調升有關津貼。同時，可以參考國際經驗，以直接經濟援助的方式推出如育兒補貼等更積極的措施，進一步減輕生育家庭的經濟壓力。不敢生、生得少的問題在西方和中國內地其實也都存在，儘管這或許是一個固化的趨勢，但各地仍然不斷加碼鼓勵生育政策，以期延緩少子化的問題。早前，國家衛健委等十七部門發佈《關於進一步完善和落實積極生育支持措施的指導意見》，指導意見從提高優生優育服務水平、發展普惠托育服務體系、住房保障等七方面提出 20 項具體措施。澳門也應該學習國家經驗，下決心強化鼓勵生育政策。

（三）未雨綢繆，積極應對離婚衍生的社會問題。

在澳門去年的離婚個案中，離婚率最高的婚齡族群在五至九年的婚齡間；婚齡在二十年以上離婚的夫婦也不少，位列第三。某程度上反映了有問題的婚姻不會隨時間而好轉，必須雙方持續溝通和努力改善，否則隔膜可能會越積越大。離婚除了傷害雙方外，夫婦間的爭執與指責，以至離異都對孩子的心理造成深遠創傷。隨著離婚率上升，單親家庭增多，不少父母從事輪更工作，深夜不歸，家中小孩缺乏照顧和教養。第一道教育防線受到衝擊，

子女日常行為舉止缺乏引導，將誘發青少年的行為偏差，為教師、學校和社會帶來新一輪挑戰。

建議特區政府：（1）一方面持續加強推廣家庭生活教育。據悉，為預防家庭問題，更有系統地規劃家庭教育方案，社工局去年聯同多個社會服務團體成立了“家庭生活教育探索小組”，以家庭理論為基礎，綜合分析實務經驗及數據後，制訂了“家庭生活教育五年工作計劃”。開展面向不同年齡層所需的教育活動及服務，除支援家長親職教育外，還包括婚姻關係、家庭性教育、家庭資源管理等重要家庭議題。同時，社工局亦協調社會服務機構，與教育局和學校加強協作，聯合向家長推廣家庭教育，藉此透過不同網絡平臺、形式及管道，開展家庭生活教育工作。教育局則持續以多元化方式開展親職教育，包括本年內為家長設立一站式資訊網，讓家長能掌握各類家庭教育資訊。為擴大親職教育網絡，並加強與多間大型企業合作，鼓勵企業將親職教育課程加入 6 員工培訓項目，讓更多雙職及輪班工作的家長或準家長員工參與。有關工作值得肯定，但有關成效還需在實踐不斷檢視和完善，亦希望能夠透過更多元管道，包括應用好電視、電台和社交網絡等多元媒體平臺，做好宣傳包裝，加強推廣的實效。

（2）另一方面，持續優化經濟發展結構。澳門離婚率趨升是全球化的一個社會現象，原因眾多。一般認為與過去十年澳門賭權開放，民生急速變化，就業及經濟結構改變，婚姻觀念及思潮變更、社交網絡擴闊等不無關係。近年雙職家庭增多，女性參與工作的比率提高，獨立意識不斷增強，經濟地位提升，打破傳統男女互動的模式，亦成為高離婚率的另一影響因素。再者，博彩業蓬勃、娛樂場所增加，輪班制工作影響了夫妻的相處，溝通的時間減少，容易產生誤會和磨擦。倘未能及時解決，便會釀成冷戰或爭執不斷，更可能出現家暴等問題，為離婚埋下伏線。因此，優化經濟發展結構，發展多元文化產業，創造更多適合親職家庭的就業空間和市場，相信有助改善婚姻問題。

佛港澳跨境數據規則銜接的現實困境與法治進路

鍾浩忠¹ 馮澤華²

摘要：數字時代下，數據跨境流動已成為粵港澳大灣區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抓手。現時廣州、深圳、珠海等地已與香港、澳門建立深度數據跨境合作關係，佛山作為粵港澳大灣區宜居宜遊宜業城市，是港澳長者北上養老、青年休閒旅遊和企業投資建廠的重要匯聚地，對“銀發經濟”高質量發展和建設“健康灣區”極具重要戰略價值，因此實現三地跨境數據規則銜接迫在眉睫。然而當下佛港澳面臨著數據跨境流通法律供給不足、共享動力匱乏、發展方向差異等銜接梗阻，亟待從立法協同、行政協調、社會組織推動三大向度構築佛港澳跨境數據規則銜接的法治進路，為港澳加速融入粵港澳大灣區提供佛山特色經驗。

關鍵詞：粵港澳大灣區；數據跨境流動；規則銜接；銀發經濟

2023年6月，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與香港特區政府創新科技及工業局簽署《關於促進粵港澳大灣區數據跨境流動的合作備忘錄》，數據跨境流動成為“數字灣區”建設的“重頭戲”。佛山是港澳居民跨境就醫、康養服務及旅遊休閒的重要流向地，對推動三地數據跨境流動的現實需求尤為迫切。然而，推動佛港澳數據跨境流動面臨法律、觀念和技術三方面的現實痛點。基於此，有必要厘清當前佛港澳數據跨境流動的現實困境，多維度構築佛港澳跨境數據規則銜接的法治進路，進而將佛山市打造成為“健康灣區”建設的高質量示範區。

一、佛港澳跨境數據規則銜接的發生語境

（一）法律語境：“差序格局”式法治環境

佛山實行具有濃厚大陸法色彩的社會主義法系，香港為普通法系，澳門為大陸法系。佛山與澳門在法律體系上相似，屬於成文法系，訴訟以法官為中心，主要強調成文法的作用，香港則沿用英國的普通法系，以適用判例法為主、制定法為輔，訴訟以當事人為中心，側重判例在司法中的作用。首先，立法主體間的平等。盡管佛山作為設區的市，其地方立

¹ 鍾浩忠，廣東工業大學法學院碩士研究生。

² 馮澤華，廣東工業大學粵港澳大灣區協同治理與法治保障研究中心副主任，廣州數據法治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廣東工業大學數字經濟與數據治理重點實驗室分室“數據法治與大數據治理實驗室”執行主任，通訊作者。

法權受廣東省人大常委會的監督，但立法主體間在跨境對外這一層面而言是平等的，即佛港澳三地均有權獨立參與法治協同建設。其次，不存在共同的最高司法機關或者仲裁機構負責行政協調。與美國、澳大利亞等國家區際行政法治協調具有司法機關或者仲裁機構負責協調不同，佛山市的各級司法機關與港澳的各級司法機關互不隸屬，相互間不能幹預司法審判。最後，港澳作為特別行政區，擁有獨立的司法權與終審權。依據港澳基本法規定，香港與澳門特區法院享有獨立審判權及一系列伴生權力（法官司法豁免權、法官終身制和法官薪金制等）、有限的法律解釋權¹以及終審權。在此種語境下，佛港澳數據跨境流動存在訴訟管轄權、法律查明適用、裁決認可執行及民刑行政三大訴訟銜接等問題，衍生出構建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的法治命題。

（二）經濟語境：養老服務產業協同

作為中國曆史文化名城，佛山市素有“禪城”之美稱又浸潤著嶺南文化，是粵港澳大灣區內適宜養老和生活的城市。中國宜居委發布的《2020 中國宜居宜業城市榜》顯示，佛山市在全國 293 個普通地級市中脫穎而出、成功上榜，排名前列。²同時，佛山也是當前港澳長者北上養老的重要集散地，是港澳以“跨境養老”緩解養老服務結構性失衡的節點依托。香港和澳門均是世界“長壽城市”，長者數量增加和長者壽命延長等因素對港澳養老服務工作構成較大挑戰。在這種情境下，近些年來港澳特區政府通過大力推動大灣區跨境養老，以舒緩本地長壽社會的巨大養老壓力，³例如香港特區政府就曾先後推出“福建計劃”“廣東計劃”“長者醫療券”等。⁴在“跨境養老”成為大灣區融合一大趨勢的語境下，本身具備較好養老產業基底的佛山，成為港澳長者北上定居養老的重要落腳點，亦迎來了養老服務產業高質量發展的新契機，可進一步激活“銀發經濟”。⁵申言之，實現佛山與港澳的養老服務對接與協同發展，是優化大灣區養老服務結構性失衡的可行之策，而推動數據跨境流動則有助於免除港澳長者來內地定居的後顧之憂，拉動跨境養老產業的進一步完善，既為解決港澳地區老齡化對養老服務提出的挑戰，又為佛山市依托良好的產業基地謀求新的經濟增長點，還可探索破解大灣區社會福利不可攜帶之困境，多維度深層次地推動粵港澳三地融合發展。

（三）社會語境：優質生活圈建設

後疫情時代，維護健康與鞏固安全是粵港澳謀求一體化深度協同發展的前提條件，更是大灣區建設宜居宜業宜遊優質生活圈的題中之義，而推動數據跨境流動則被證實是確保

¹ 從法理上看，無論在法律解釋權力來源，還是權力界限，抑或是權力效力方面，香港特區法院享有的法律解釋權均低於全國人大常委會所享有的法律解釋權。

² 《佛山入選 2020 中國宜居宜業城市》，<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84779876994420219&wfr=spider&for=pc>，最後訪問時間：2023 年 12 月 21 日。

³ 蘇焯傑：《粵港澳大灣區養老服務業協同發展研究》，《港澳研究》2021 年第 1 期。

⁴ 張彩霞，慶豔華：《發展粵港澳大灣區跨區域養老服務的思考》，《衛生軟科學》2020 年第 7 期。

⁵ 孫綺曼，林曦，趙燕華等：《約四百名港澳老年人在大灣區內地城市養老》，《羊城晚報》2020 年 12 月 16 日，第 A10 版，

大灣區公共衛生安全的基石。當下大灣區已然恢復自由流動的本來面貌，然而邁向由現代性建構的“風險社會”¹，無法準確預測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影響極易超越單一行政區劃的邊界，形成跨區域公共衛生危機，此次新冠疫情即為例證。同時，數字時代下“科技抗疫”被置之於更加重要的位置，通過大數據、雲計算等現代信息技術可極大提升疫情防控工作精準化水平。²疫情期間健康碼互認以支持粵港澳跨境流通議題的熱度持續高企，印證數據共享對大灣區公共衛生行動決策的支撐效用。³綜觀之，走出疫情陰霾的大灣區應當從實踐中汲取經驗、吸取教訓，盡快探索推動數據跨境流動，從而避免“封關抗疫”這一不利局面在未來再次上演。而在健康碼“下線”缺乏數據共享直接動力的情境下，宜借助“跨境養老”這一難得契機，推動實現以港澳長者為依托的數據跨境順暢流動。長遠地看，在長者健康數據跨境流動運作成熟並取得可行經驗時，更大範圍的大灣區數據對接自然實現。據此，可以港澳長者跨境養老的重要落腳點——佛山為重要試點城市，探索如何以佛港澳跨境數據良好銜接推動數據跨境流動，打通港澳長者北上佛山養老的“最後一公里”，以點帶面推動粵港澳大灣區數據跨境流動，推動大灣區建設宜居宜遊宜業的優質生活圈。

二、佛港澳跨境數據規則銜接的實踐分析

（一）規範維度：佛港澳數據跨境流通的法律供給不足

1、三地跨境數據保護規則迥異

大灣區數據跨境流動規則差異大，三地彼此之間尚未銜接，既有灣區建設規劃尚未涉獵此重要環節。具言之，《網絡安全法》、《數據安全法》與《個人信息保護法》劍指數據使用亂象，是內地數據保護的“三駕馬車”，並形塑了數據保護與安全利用的全國性法治體系框架。而伴隨全國統一立法逐漸完善，廣東省及珠三角九市正補齊著數據保護的“地方維度”，《廣東省數字經濟促進條例》、《廣東省數據流通交易管理辦法（試行）》系列文件、《佛山市推動數字經濟發展實施方案》、《佛山市公共數據管理辦法（草案送審稿）》等法規即為例證。以此為前提，內地數據法治形成了“國家-省-市”三級梯度的綜合立法模式。然而，以上法律的條文均過於抽象，尚未明確數據的具體範圍和保護措施，實踐中歸口管理部門不一且專門機構缺位。香港的數據法律保護體系，以《個人資料（私隱）條例》、《電子健康記錄互通系統條例》為法治基底，以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印發的實務手冊和指引資料為輔助，在原有的體系上“打上補丁”，有個人資料（私隱）專員、電子健康記錄專員負責數據保護工作。澳門以適用廣泛的《個人資料保護法》為核心，與《澳

¹ [德]烏爾裏希·貝克：《風險社會：邁向一種新的現代性》，何博聞譯，譯林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5 頁。

² 劉向東，馮澤華：《全國統一大市場下內地與香港防疫政策銜接之路》，《中國評論》2022 年第 8 期。

³ 馮澤華，劉向東：《粵港澳大灣區重大疫情的應急法治協同建設》，《中國評論》2022 年第 3 期。

門民法典》一同確立“個人資料權”，不具備強制力的指導性規範補全法律架構，個人資料保護辦公室則負責監察、協調法律的遵守和執行。

2、三地數據出境規則各異

在“三駕馬車”形塑的基本框架下，內地出臺《健康醫療數據安全指南》、《數據出境安全評估辦法》、《個人信息出境標準合同辦法》等配套文件，進一步完善跨境數據制度體系。從整體趨勢而言，內地數據跨境流動呈現出“雙軌並行”的規則框架：一方面，以分領域、多形式和相銜接的原則補齊數據出境規範；另一方面，強調數據本地化處理，嚴格規管數據跨境的立法取態明確。香港《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第33條規定，個人資料原則上不能被傳輸至香港以外的國家或地區，但同時規定了六種例外情形。¹然而，這一條款事實上遲遲未生效實施，香港場域內的數據跨境流動較為順利。不僅如此，香港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先後發布《保障個人資料：跨境資料轉移指引》、《跨境資料轉移指引：建議合約條文範本》等指引文件，為企業和個人提供數據出境合規指引，希冀以“合規-問責-道德監督”明確數據的管治義務和責任。²澳門《個人資料保護法》第7條將健康相關的個人資料定義為敏感資料，另行規定了更為嚴格的處理要求，原則上不允許數據出境。但同時，該法有規定可以出境的例外情況並施加嚴格的限制條件：在遵循非歧視原則，並符合法律或規章規定，或基於重大公益並經當局允許，或當事人明確許可，方可進行數據的跨境流動。

（二）主觀維度：港澳欠缺跨境數據共享動力

1、港澳對內地個人信息保護制度缺乏信任

相較港澳，內地的個人信息保護專門立法進程較晚。期間，內地關於個人信息保護的相關法律規範散見於《憲法》、《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侵權責任法》、《合同法》、《網絡安全法》等法律法規當中，一般從人格尊嚴、人格權、隱私權、債權等角度切入並提供法律保護。³然而，這種零散化、非體系且保護範圍狹窄的法律規範狀態，無法規制個人信息收集、使用過程中面臨的泄露、濫用風險，內地大規模個人信息泄露、隱私侵犯乃至非法買賣個人信息等負面事件因此頻見報端，刺痛社會公眾個人信息保護的神經。儘管近些年來內地個人信息保護的立法動作頻頻，有望扭轉以往企業和民眾忽視個人信息保護的頹勢，肆意泄露個人信息的行為亦將難再有生長的土壤。然而，法律制度外溢效應傳導需要時間，尤其是在內地與港澳存在物理海關牆、電子防火牆的情境下，港澳民眾在一定程度上難以接觸到內地法治的最新動態，因而形成的刻板印象難以在短期內得到改變，加之

¹ 《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第33條列明的六種除外情形，包括：接收地為白名單司法管轄區域；接受地有實質近似或相同目的的生效法律；書面同意轉移；條例豁免；使用者已採取所有合理預防措施和履行所有謹慎注意義務保障資料不違背條例。

² 馮澤華，劉向東：《以法治護航粵港澳大灣區數據跨境流動》，《南方日報》2023年8月28日，第A05版。

³ 呂炳斌：《個人信息保護“入典”：體系功能及其與專門立法的關係》，《社會科學輯刊》2022年第1期。

現階段港澳社會生態依然複雜多元，不少別有用心人士為實現政治目的極力汙蔑內地法制水平，更加深著港澳民眾對內地的不信任感。例如在中央支援香港實施全民核酸檢測計劃中，不少港人擔心帶有基因的檢測樣本會被泄露，以至於最終完成份數不到總人口的 1/3。港澳居民或將對內地隱私保護工作失去信心而阻礙大灣區數據跨境流通。¹

2、後“修例風波”時代港人對北上定居持觀望態度

近年來，香港亂港勢力與本土分離勢力活動頻頻，各種激進破壞活動嚴重危害了國家主權、領土完整和人民身心健康。雖然中央權力合法進場、香港管治革新與社會秩序重構等措施及時平息消極事態，但不可否認地對香港繁榮穩定及參與國家重大戰略能力造成了嚴重對沖與消解。²加之“修例風波”社會後遺症碰上了新冠疫情這一“黑天鵝”事件對港澳造成的全方位沖擊，更使得港澳未來社會發展的“下半場”方向變得更為撲朔迷離。³由香港廣東青年總會發起的香港青年大灣區發展調查顯示，90%受訪港青曾聽聞“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但對於認同且願意北上發展的人數卻不到一半，在價值認同方面仍具備較大提升空間。⁴概言之，一系列社會動蕩與安全危機在香港人民心中仍留有餘波與陣痛，更使得港澳融入國家大局的“下半場”方向撲朔迷離。⁵基於此，港人對粵港澳大灣區數據共享，乃至前往內地定居生活均持觀望態度，客觀上延緩著數據跨境流動進程。

（三）客觀維度：佛港澳存在發展方向差距招致銜接困難

1、佛港澳三地的數字經濟發展速度不一

宏觀來看，內地數字經濟發展有目共睹，體量已穩居全球前二且極具提升潛力。微觀來看，佛山工業總產值超過兩萬億元，在大力推動本地區以製造業為核心的工業數字化轉型過程，開拓了發展數字經濟的廣闊空間。《2020 數字政府發展指數報告》顯示，除副省級、省會城市外，佛山在其他普通城市賽道中排名第 2，在數字經濟發展中具備顯著優勢。⁶香港數字經濟起步較早，但實際運作並不如想象中那樣領先。《全球數據中心市場》研究數據顯示，香港在亞太地區排名位列第 20，而同為國際數據樞紐中心的新加坡卻已躋身前 10，並且在數據可及性、安全等級及市場前景上遙遙領先前者。當前新加坡擁有 23 個已投產的海底光纜系統，成為具有高帶寬能力的連接最多的國家之一。而反觀香港，土地短缺問題正成為香港數據中心發展的最大困擾，短時間內難以追趕或超越新加坡。⁷以上事例，

¹ 龔學鳴：《亂港分子造謠抹黑抗疫工作 香港法律界：唯恐天下不亂》，《大公報》2022 年 3 月 2 日，第 A4 版。

² 田飛龍：《抗命歧途：香港修例與兩制激變》，香港新民主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4 頁。

³ 劉向東，餘梓健：《大灣區背景下港澳加速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制度理路》，《順德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23 年第 3 期。

⁴ 《調查：港青願往大灣區各市發展》，<http://www.takungpao.com/news/232109/2022/0831/759342.html>，最後訪問時間：2023 年 8 月 22 日。

⁵ 劉向東，姚琳：《香港青年參與大灣區建設：制度理性與現實進路》，《紫荊論壇》2023 年第 1 期。

⁶ 清華大學數據治理研究中心：《2020 數字政府發展指數報告》，https://www.dps.tsinghua.edu.cn/_local/1/6D/AC/34CFA8E7F589B12DD81FE77ACB9_968502EA_66D561.pdf，最後訪問時間：2023 年 8 月 22 日。

⁷ 《香港對數據中心需求同比增長 15%》，《香港文匯報》2020 年 10 月 21 日，第 B01 版。

無不側面印證數字經濟起步較早的香港未能長期保持領先態勢，需要加快腳步跟上時代發展步伐。澳門將發展數字經濟作為經濟適度多元的重要方向，但尚處起步發展期，體量較小，整體上並未形成規模效應，仍需加快趕超粵港兩地腳步。

2、佛港澳數據傳輸標準不一致

在數字技術迭代更新大爆炸的時代背景下，香港與澳門作為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先行者，在這一輪互聯網技術上迭代更新晚於內地，更晚於廣東省與佛山市，因而造成佛港澳三地在數據跨境流動中存在明顯的技術標準沖突。從實踐邏輯來看，數字科技水平與數字經濟發達程度總體呈現正相關，擁有良好工業基底的佛山市在數字經濟中勇當排頭兵，在吸引投資資金的能力上相較港澳更強。據此，佛港澳三地存面臨底層算法代碼差異、API 數據接口區別、數據完整標準不一等技術困局。以金融業 API 接口為例，內地調用 API 時通常採用 HTTPS 方式，是誕生於 Web3.0 時代的一種新型的數據接口類型，香港近些年在銀行、金融業力推 Open API，以 JSON 格式為主；¹澳門則沿用早些年推行電子政務時布局的 XML 格式，是一種數據傳輸速率較慢的接口格式。此外，受中國國家防火長城封鎖 IP 的技術影響，內地無形的網絡牆和外部信息安全問題、技術壟斷，引致現階段佛山在數據管理和數據交換的技術標準上與國際標準存在一定差距。²而港澳作為國際自由港和對外窗口，其數據治理和流動標準緊跟國際趨勢，基本沿用全球通行的數據交換標準體系。

三、佛港澳跨境數據規則銜接的法治進路

（一）立法協同

“一國兩制”基本原則下，佛港澳自行開展的法治合作不可避免地涉及中央事權，適宜由中央統籌協調、發揮作用，可通過授權、指引、規劃乃至主導的方式“出場”。因此，廣東省和佛山市宜積極爭取中央授權先行先試，以分散式立法模式與港澳協同推動跨境數據規則銜接。

1、爭取中央授權依法制定地方性法規

內地《個人信息保護法》將數據界定為個人敏感信息，需要遵循更加嚴格的管理規定。而在“數據關乎國家主權與安全”的語境下，數據跨境流動蘊含數據安全和數據主權因素，或將涉及中央事權。基於此，廣東省宜積極爭取中央授權推動法治資源的縱向供給，進而為下轄作為設區的市的佛山推動與港澳的跨境數據規則銜接提供依據。申言之，佛港澳在數據跨境流動上的諸多差異，依賴中央的行政命令或宏觀規劃或可解決數據跨境共享的技

¹ 香港金融管理局：《銀行業開放應用程式介面（開放 API）》，https://www.hkma.gov.hk/gb_chi/key-functions/international-financial-centre/fintech/open-APPLICATION-programming-interface-api-for-the-banking-sector/，最後訪問日期：2023 年 12 月 20 日。

² 陳曉鋒：《數據跨境流動 促進互聯互通》，《香港文匯報》2023 年 7 月 12 日，第 A10 版。

術問題，但難以有效提升奉行法治價值觀的港澳社會對此治理模式的認同感，宜通過法治方式推動這一工作開展。具言之，2023年新修正的《立法法》賦予“區域協同立法”的法律地位和效力，但該法並未列於基本法附件三中，區域協同立法條款僅適用於內地區域。基於大灣區協同立法的必要性，從《立法法》汲取立法資源難以避免。因而有必要從廣義角度理解“區域”，將其擴大理解為跨境區域，明確內地的行政單位享有與港澳進行跨境區域的立法權。¹可由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授權廣東省制定有關數據跨境流動的地方性法規，廣東省在一定期限內實施該暫時性的地方性法規，作為大灣區數據跨境流動的階段性立法試驗區，通過法規實踐中積累的正面及負面經驗，為將來大灣區建立數據規則銜接制度的立法規範提供實踐依據。²

2. 以區域示範法豐富數據跨境流動規範

區域示範法作為一種新型立法模式，由學者、專家或由其組成的團體草擬的，用以推薦給各國或者各法域在立法時予以借鑒或採納的不具拘束力的法律文本。³佛港澳跨境數據規則銜接適用示範法進路，有助於促進三個不同法域的數據法律協同發展，充分彰顯區域政府間進行立法協調的自主性。從可行性來看，粵港澳大灣區內已經有《粵港澳大灣區調解示範法》、《粵港澳大灣區仲裁示範法》、《粵港澳大灣區跨境爭議調解示範規則》等示範法制定實踐，⁴同時，港澳特區內還有其以獨立名義加入並採用的《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國際商事仲裁示範法》等。這些區域示範法實踐，為出臺以數據跨境流動為主題的示範法文本提供了寶貴經驗。佛港澳三地政府部門可在中央的指導下，依托三地高校成立的地方立法研究評估與諮詢服務基地，組織三地法律專家與實務人士成立起草課題組，經過充分的研討論證，按照先急後緩、先易後難的方式制定數據跨境流動示範法，為三個城市乃至其他大灣區城市立法機關提供範本。

（二）行政協調

伴隨港澳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進程不斷加快，“9+2”城市之間事實上形成了緊密的國際協作態勢，為佛港澳跨境數據規則銜接奠定了良好的協同基礎。宜以“一國兩制”下的行政管轄權讓渡為理論基礎，實現權力與組織資源的橫向融貫，凝聚三地數據治理共識以實現緊密的動態聯動。

1、設立粵港澳大灣區數據治理委員會

佛港澳跨境數據規則銜接，是互不隸屬的“非對稱”府際格局下的跨境區際合作。港澳作為特別行政區，屬於省級建制且享有高度自治權；佛山作為廣東省內的設區的市，享

¹ 馮澤華：《粵港澳大灣區公共衛生區際法律沖突的調適邏輯》，《港澳研究》2023年第1期。

² 餘宗良，張璐：《我國數據跨境流動規則探析——基於粵港澳大灣區先行先試》，《開放導報》2023年第2期。

³ 馮澤華：《推動粵港澳三地積極適用區域示範法》，《中國社會科學報》2021年10月27日，第Z02版。

⁴ 《合作區與香港在商事調解領域開啟深度合作——促進大灣區跨境爭議調解示範規則廣泛適用》，《珠海特區報》2023年5月31日，第6版。

有一般的市級行政管理權限。佛山市並非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核心城市，且地理位置尚不毗鄰港澳兩地，在合作契合度上相較於廣州、深圳和珠海三個大灣區內地城市較弱，事實上不是港澳在內地或大灣區謀求城市合作的首選對象。¹據此，佛山市更應以“跨境養老”為切入點，積極主動尋求與港澳謀求數據跨境流動合作，進而促進三地其他領域的廣泛交流和互利共贏。據此，建議可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領導小組的協調下，在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下設粵港澳大灣區數據治理委員會，該委員會可定位為議事協調機構。佛港澳三地可在粵港澳大灣區數據治理委員會的運作框架下先行先試一些涉及跨境養老、醫療等領域的數據流動事宜。同時，宜引入行政激勵機制，通過設置合理的獎懲手段調動委員會積極工作，為推進佛港澳跨境數據規則銜接制定時間表，並以警示提醒、誠勉督導、責令糾錯等方式壓實責任。

2、完善佛港澳數據合作機制

促進大灣區“雙向融入”語境下，應當變“單向式開放”為“互通式開放”，調動港澳作為特別行政區和大灣區核心城市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積極性與主動性。為此，一方面，可借鑒港珠澳大橋管理局和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共建管理委員會和執行委員會經驗，在條件成熟時，可在粵港澳大灣區數據治理委員會框架下，探索由佛港澳三地共同設立以數據跨境流動為主題的工作組，以跨區域管轄組織化為行政管轄權讓渡提供抓手並提升行政協調效能。²具言之，該工作組由佛山、香港與澳門的數據主管行政部門負責人組成，專職統籌三地跨境數據規則銜接和數據跨境流動執法工作，並協調數據跨境流動中糾紛解決。另一方面，聯席會議是當前大灣區行政協調最重要的平臺，如粵港合作聯席會議、粵澳合作聯席會議。可借鑒大灣區過往合作中常見的合作聯席會議機制，圍繞數據跨境流動這一專門議題，探索建立佛山、香港、澳門三方的數據合作聯席會議制度，並借鑒《泛珠三角區域合作行政首長聯席會議議事規則》，共同制定專門的議事規則確保這一組織發揮數據協調的行政效能。

（三）社會組織推動

佛港澳跨境數據規則銜接不僅事關三地行政部門等主體，同時也需要依托醫療機構、行業協會、社會組織等多元主體參與，以平等地位參與信息共享並相互監督，進而形塑多元共治的治理結構，尤其是之於以跨境養老為載體推動數據跨境流動的佛山而言則更是如此。³

1、將行業經驗與標準上升為數據流動規範

港澳特區市場化程度高、社會力量發育較為成熟，通過發揮二者的獨特作用以探索大灣區數據跨境流動的方案，是一種更加具備理性的法治進路。具以觀之，第一步，佛港澳

¹ 陳朋親：《粵港澳大灣區規則相互銜接的制度複雜性與行為策略》，《學術論壇》2023年第3期。

² 朱最新，劉雲甫：《法治視角下區域府際合作治理跨區域管轄組織化問題研究》，《廣東社會科學》2019年第5期。

³ 朱最新：《粵港澳大灣區規則銜接的現狀、困境與路徑完善》，《法治論壇》2021年第3期。

三地政府積極引導，發揮三地醫療健康及數據行業協會及社會組織作用，總結歸納當前數據流動中行之有效的實踐經驗和通行標準。第二步，佛港澳三地政府依據現階段數據跨境流動現狀，本著平等、良好協商的態度，對數據規則清單予以認可並逐步細化，再以區際行政協議、區域示範法等法治方式，推動在三個城市中立法施行、落地生效，進而推動建立趨同化數據規範。其中，佛山市推動立法轉化時還應尤其注意“上位法優於下位法”原則，不應與廣東省立法存在沖突或抵觸情形。第三步，在條件成熟或取得突破性進展時，佛山市政府在總結相關經驗後可報請廣東省政府，由後者會同港澳特區政府，共同提請中央制定數據跨境流通的法律規範。

2、共建佛港澳跨境數據流動聯盟

在治理情境愈發複雜的現代社會，多元主體協同共治已成為實現公共治理現代化的必要方面，推動佛港澳數據跨境流動更是如此。概言之，冀推動佛山與港澳之間的公共事務協同，就必須尊重港澳的治理方式與傳統，在數據跨境流動過程中探索建立多元共治的社會治理模式。¹具體而言，考量到數據跨境流動強烈的行業性、組織性與科技性特征，三地宜探索以行業、產業聯盟的方式集中整合三地社會組織權益與訴求，促進規則銜接的多元利益表達。首先，可吸納跨境的非營利醫療衛生社會組織、私營機構等社會組織為聯盟成員，增強集體利益表達力量。最後，可由三地數據法律界、律師界和科技界人士擔任重要職務，佛港澳三地政府派代表擔任成員，通過定期舉辦交流、研討會等各種形式形塑數據流動共識，並鼓勵探索數據流動標準、數據知識產權、數據糾紛解決等方面的民間協同機制。

¹ 黎沛文：《香港“多元共治”社會治理模式對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啟示》，《港澳研究》2019年第2期，第44-51頁。

結構重塑：粵港澳大灣區公共衛生应急管理協同理念的調適理路

劉向東¹

摘要：在人員、要素高度集聚的粵港澳大灣區內，跨區域重大疫情成為其建設高質量發展示範地的最大不確定因素。港澳回歸以來，粵港澳三地在攜手應對 SARS、流感等跨境疫情過程中，建立了以區際行政協議為核心的跨域應急協作機制和平臺。然而，這種效力缺乏有效保障的松散型合作模式，事實上難以推動大灣區公共衛生跨域應急深度協作。聚焦協同理念維度可以發現，當前“安全灣區”協同建設理念模糊，表現為“行政區行政”色彩明顯、“單向式開放”長期存在。據此，宜以協同治理理論為指引調適三地的公共衛生應急協同理念，實現從“行政區行政”到“灣區行政”“單向式開放”到“互通式開放”的理念轉型，並依托具有約束力的治理手段促進資源高效流動。

關鍵詞：粵港澳大灣區；公共衛生；區域協同防疫；灣區行政；雙向融入

一、問題的提出

為抗擊新冠疫情，內地、香港、澳門紛紛實行嚴格的入境管制措施。“封關”在一定程度上阻斷新冠病毒的跨境傳播，但對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帶來的“後遺症”也尤為顯著。這主要表現為阻礙粵港澳三地生產要素跨境流動，沖擊灣區經濟，影響灣區一體化建設，這也折射出粵港澳公共衛生應急協同建設的現實緊迫性。“封關抗疫”作為一種防控跨區域重大疫情的表象，背後反映的是粵港澳公共衛生應急協同理念存在較大差異，資源配置缺乏約束力，大灣區整體協同防疫工作較為松散，難以因應“健康灣區”“安全灣區”的制度訴求，亟待實現體系化轉型。立足抽象的理念維度，“一國兩制”基本原則下，大灣區協同防疫框架存在協同理念失衡與錯配，難以為形成契合粵港澳緊密區際協作的聯防聯控機制創設頂層式的邏輯前提。申言之，伴隨“健康灣區”“安全灣區”建設目標愈發清晰，粵港澳三地政府攜手共進的方向更加明確，但固守本地區利益最大化的“行政區行政”理念和內地向港澳“單向式開放”的難題，成為影響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粵港澳深度協同的關鍵因素，也制約著公共衛生應急治理合力效能的充分釋放。為此，本文立足大灣區協

基金項目：司法部法治建設與法學理論研究部級科研項目“粵港澳大灣區數據跨境流動的法治評估體系研究”（課題編號：22SFB5009）。

¹ 劉向東，澳門理工大學人文及社會科學學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灣區治理、公共政策。

同共治的維度，在維護中央對港澳的全面管治權和尊重港澳的高度自治權的前提下，認為應當積極推動“行政區行政”向“灣區行政”轉變，實現“單向式開放”向“互通式開放”過渡，聚焦大灣區整體利益最大化促進公共衛生應急資源的跨境最優配置，為構建公共衛生跨境應急聯體創設邏輯前提。質言之，“灣區行政”和“互通式開放”並非公共衛生應急協同領域的“專屬理念”，更應成為大灣區深度融合建設應當秉持的基本理念，在承認與尊重粵港澳三地存在較大發展差異的基礎上，通過互信、互惠、互利凝聚共識、匯聚力量，共同塑造“健康灣區”。

二、大灣區公共衛生應急管理協同理念的現實審視

（一）“行政區行政”色彩明顯

分區治理是古今中外國家治理的重要方式。從人類政治運作實踐來看，在面對龐大的治理情境時，國家治理者不約而同地選擇了分區治理的方式，並從中組織起國家結構形式。¹在“分區而治”的行政體制下，行政區劃邊界成為地方政府被中央授予的行政管理權行使的地域邊界，一旦超出即失去效力與合法性。這一治理模式本是治理者面對複雜國家治理的破局之策，然而如此劃分之下，作為公權力的行政權力受到行政區劃的剛性約束，在現代社會複雜的公共事務治理情境下，出現“行政區行政”“行政區經濟”等相互割據的負面狀態。即基於單元行政區界線的剛性約束，在對公共事務治理過程中形成的一種切割、閉合以及有界的政府管理形態。²“行政區行政”具有條塊分割、封閉管轄、權力壟斷的表征，呈現出行政行為的內向性、排斥性和分割性。“行政區行政”理念導向下，行政主體的關注焦點是行政區劃內部公共事務，希冀達成本地區經濟社會發展最優目標，“分工不合作”和地方本位主義成為其行為導向。³然而，這一模式下的行政主體過於注重本行政區的利益維護與內部管理，忽略了對外與其他行政區交流協作，在行為自利性與地域限制性的疊加作用下，逐漸累積排斥異地要素的流入，使得本行政區喪失進一步開拓發展新局的可能。

在“行政區行政”觀念導向下，粵港澳三地雖通過區際行政協議、區域規劃、聯合執法力求促成公共衛生應急管理的高效聯動，然而，這些法律規範、政策與合作協議整體上呈現零散化態勢，並不能形成銜接、協調的跨域應急協作框架。從合作內容來看，審視以往粵港澳府際合作事項不難發現，當前三地合作大多涉及經濟發展領域，而較少涵攝公

¹ 吳金群，巢飛：《行政區劃治理何以可能——治理嵌入行政區劃調整的意涵、條件及其限度》，《治理研究》2021年第5期，第41-50頁。

² 陳瑞蓮：《論區域公共管理的制度創新》，《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5年第5期，第61-67+126頁。

³ 曾鵬：《論從行政區行政到區域合作行政及其法治保障》，《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5期，第16-23+161-162頁。

共衛生、應急管理及相關的公共事務，是一種“經濟導向”的府際合作狀態。一個典型的例子是，粵港澳三地的環境協同治理境況長期不佳，行政執法模式差異引發的執法沖突未能得到有效緩解。¹一般而言，公權力主導之下的府際合作首先考慮的是本行政區經濟發展問題，而對於不能為轄區產生明顯經濟效益但對公共安全、社會環境等關涉重大的相關事項，則呈現出較為被動，甚至消極的態度。當然，伴隨新時代總體國家安全觀進一步確立，公共衛生安全作為關涉發展全局的核心事項，將在地方治理者、決策者的注意力分配中將占據更大比重。²換言之，未來粵港澳三地或將更加注重在公共衛生應急協同上的跨域合作，為高質量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創設良好的外部環境。從合作動力來看，在“區域行政”“灣區行政”導向尚未樹立並鞏固的情境下，粵港澳大灣區公共衛生管理協同建設盡管面臨實體、程序上的諸多制度壁壘，三地治理者卻缺乏推動變革與銜接的動力，不能將灣區利益最大化作為出發點與落腳點。同時，府際主體更在跨域應急協作成本與收益的博弈與考量中，呈現外部合作消極態度，寧願固守本行政區公共治理的“一畝三分地”也不願冒險開展公共衛生應急管理合作。例如香港第五波疫情期間，在香港本土疫情外溢至深圳、珠海等地市時，後者不約而同地陸續發布關於反走私、反偷渡的舉報獎勵政策，並進一步收緊通關政策，³其出發點雖是防控跨區域疫情，但這一舉動本質是缺乏溝通、“以鄰為壑”的做法。

（二）“單向式開放”長期存在

所謂“單向式開放”，是指一方主體單方、自主地通過調整本地區的開放程序與適用規則以適應其他地區的治理實際，並且不需要對方作出相應承諾或予以行動，本質是認可對方的法律規制或制度標準，減少行政區劃之間因制度差異所造成的融合成本。“單向式開放”雖然展現了本地區的開放包容心態，有利於吸收外來的優質資源，但由於整個資源流向是單行的，因此這一模式發展到後期，將大概率出現社會資源分配不公平現象，無法實現區域均衡發展。基於協作抗疫、聯合治理公共衛生事件的重要性，粵港澳三地間針對疫情聯防聯控的府際合作越來越頻繁。然而，在促進港澳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語境之下，中央事實上鼓勵大灣區內地城市向香港、澳門進行“單向式開放”，且並不要求港澳向內地城市對應開放。⁴

這一理念體現在粵港澳大灣區公共衛生應急管理協同領域，可從醫護執業人員資格互認上窺見。為便利港澳醫師申請內地執醫資格，內地專門出臺了《香港和澳門特別行政區醫師獲得內地醫師資格認定管理辦法》，其中對於港澳醫護人員的專業資格認准非常寬松，

¹ 謝偉：《粵港澳大灣區環境行政執法協調研究》，《廣東社會科學》2018年第3期，第246-253頁。

² 陳那波，張程：《“領導重視什麼及為何？”：省級黨政決策的注意力分配研究——基於2010—2017年省委機關報的省級領導批示》，《公共管理與政策評論》2022年第4期，第85-102頁。

³ 《香港疫情加重 珠三角多地發布舉報走私偷渡獎勵通告》，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25003005858000297&wfr=spider&for=pc>，最後訪問時間：2024年1月13日。

⁴ 馮澤華：《粵港澳大灣區公共衛生立法協調研究》，《紫荊論壇》2021年第6期，第55-62頁。

僅在執業時間、類別、機構以及備案手續上有所限制。¹部分地區針對港澳醫生“北上”執業給予了更大的政策利好，例如2022年7月表決通過的《深圳經濟特區醫療條例（修訂稿）》，以立法形式明確，允許港澳醫療專業技術人員經備案後在深圳“多點執業”，有利於港澳醫生拓寬執業範圍以獲得更大發展空間。²然而，香港特區法律明確規定，非香港本地醫學院畢業醫學生必須先行參加LMCHK香港醫生考試，通過香港醫務委員會執業醫生資格考試才能獲得註冊執業資格。澳門特區亦明確，只有持有澳門居民身份證及具有全日制臨床醫學學位者，才可登記註冊成為醫生；如無本地居民身份證，則必須透過技術專才政策向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申請留澳就業，並且必須通過本地組織的醫師專業資格考試。類似的“單向式開放”情形，也出現在動物檢驗檢疫機制、法律執業資格認定等方面，制度壁壘林立阻礙著廣東省內的公共衛生應急資源向港澳特區流動。

顯然，僅依靠一方的“單向式開放”難以有效配置區域間的公共衛生應急資源，無法有限消解諸多制度壁壘。一個典型的例子是，香港第五波疫情期間，中央積極援助香港，但香港特區政府食物及衛生局與民主派議員認為，中資病毒檢測承辦商不合衛生署標準，醫護人員缺乏行醫資質，極有可能引致醫療事故。³香港本地社會此番質疑聲音的出現，本質原因是香港並未面向內地開放醫護執業准入資格，阻礙公共衛生應急資源的便捷流動。從內在邏輯而言，“單向式開放”意味著粵港澳三地的權利義務資源供給與配置的不對等，長此以往不僅無助於形成府際利益協調機制，更極大限制人才、醫療服務、藥品器械等資源要素流通，無助於三地攜手應對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進而實現聯合抗疫的理想圖景。質言之，在粵港澳大深度融合發展情境下，港澳與內地的“雙向開放”難題將得到更多關注，不能僅僅是內地城市對港澳單向開放和提供便利，也需要港澳對內地合理開放，這種“雙向開放”固然由於體量差異而不可能對等，但也需要逐步放寬及可比較。⁴

三、大灣區公共衛生應急管理協同理念的優化進路

（一）從“行政區行政”到“灣區行政”

1、完善以大灣區建設整體為導向的激勵機制

自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正式提出以來，中央先後印發《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

¹ 《衛生部、國家中醫藥管理局關於印發〈香港和澳門特別行政區醫師獲得內地醫師資格認定管理辦法〉的通知》，《中華人民共和國衛生部公報》2009年第8期，第6-12頁。

² 《重大利好！港澳醫師可在深“多點執業”》，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wMTgwMzk1Ng==&mid=2247680053&idx=1&sn=c5c1f9df4e580ec0409948ff6a2deba7&chksm=96e411eea19398f8bd3a2cbe0002c196f025172b74c68463b89e626cd45ecd9fe7aa61b9b298&scene=27，最後訪問時間：2024年1月13日。

³ 藍松山：《醫護界促停抹黑內地援港醫護》，《香港文匯報》2022年3月17日，第A02版。

⁴ 《田飛龍析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戰略》，<https://ishare.ifeng.com/c/s/7ogMpu3P2FC>，最後訪問時間：2024年1月13日。

以及橫琴、前海、南沙“三大方案”，為全面建成國際一流灣區和世界級城市群指明了方向、構建了重大平臺。換言之，中央規劃視角中的粵港澳大灣區是作為一個整體而存在與發展的跨境區域，本質上是以中央為主導將多個地區和城市構建成一個新的行政區域，調整或重新建構新的公共治理規則體系，進而形成“新的地理空間”的公共治理模式，¹即本身就帶有鮮明的“灣區行政”色彩，而粵港澳三地應從大灣區建設全局和整體利益的角度尋求深度融入以推動大灣區高質量發展。然而，現實卻並非如此。據此，宜從中央對粵港澳大灣區的規劃起點出發，形塑以大灣區建設整體為導向的評價機制，運用自上而下的行政激勵，推動“灣區行政”理念深入人心。

歷史和現實都表明，政績考核是激勵幹部擔當作為、促進事業發展的重要抓手，深刻影響和塑造著他們的政績觀、發展觀。²基於政績考核的政治性、個體性和比較性特點，³只有在自上而下、你上我下的政治錦標賽“把激勵搞對”⁴，才能使粵港澳三地政府進一步以灣區整體利益為導向，重視粵港澳大灣區全局建設，進而形塑“灣區行政”理念。據此，中央可在多元指標的考核體系中增加並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作為重要的工作指標，並尋求激勵機制的法治化、規範化，以此不斷激發各級“權力持有人”發揮主觀能動力，主動尋求粵港澳深度融合的多維進路。同時，還可以參照全國文明城市、國家衛生城市評比的運作經驗，加大對地方政府及其部門官員在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表彰力度，作為幹部晉升的重要參考。⁵從實踐例證來看，在中央多次強調大灣區建設重要性的語境下，廣東省政府已然將高質量建設粵港澳大灣區作為重要議題，通過成立以省委書記、省長為統率的廣東省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領導小組，“舉全省之力辦好這件大事”。⁶概言之，在以政績為核心的激勵機制自上而下的動態傳導中，廣東省及珠三角九市治理者在運用公權力履行職能時，已大體上將“灣區行政”理念融貫其中。據此，未來應當重點關注的是，如何在“一國兩制”的複雜情境中，進一步調動港澳特區政府融入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積極性，並通過制度、組織、權力資源形塑治理者以灣區整體利益作為出發點的治理理念。

2、構建以灣區行政為語境的法治理論體系

作為一種契合粵港澳深度融合發展的協同理念，“灣區行政”脫胎於“區域行政”這一新型區域管治模式，強調區域內各行政主體之間相互協調、尋求合作以實現公共事務的

¹ 陳劍：《基於國家主導的粵港澳大灣區公共治理融合：條件保障、現實困境與路徑探析》，《廣西社會科學》2021年第1期，第18-24頁。

² 馬亮：《政績考核該怎麼“考”》，《中國青年報》2020年11月11日，第2版。

³ 陳家喜，汪永成：《政績驅動：地方政府創新的動力分析》，《政治學研究》，2013年第4期，第50-56頁。

⁴ 李永剛，管玥：《地方官員競爭的政治錦標賽模型及其優化》，《江蘇行政學院學報》2011年第2期，第73-78頁。

⁵ 劉向東，馮澤華：《大灣區嶺南文化協同傳承的激勵邏輯及其制度進路》，《紫荊論壇》2022年第6期，第70-77頁。

⁶ 徐林，駱驍驊，李鳳祥等：《省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領導小組第九次全體會議召開》，《深圳特區報》2023年5月9日，第A01版。

良性治理，是未來粵港澳大灣區實現跨區域協同治理的重要手段。從源流來看，“區域行政”是伴隨區域協調發展戰略深入實施而建構的區域法治理論體系的分支之一，¹是地方治理者主動尋求跨域緊密協作的理論產物。應當看到，中央授權是一種稀缺法治資源，實質是中央賦予地方改革、創設和突破現有體制機制的權力，往往牽動全局、協調難度特別大，啟動起來絕非易事。當前，中央先後推動京津冀協同發展、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長三角區域一體化發展等重大國家戰略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在地方法治水平受到國家法治水平整體制約的情境下，任何國家戰略均需國家授權方可獲得改革創新的權限和動力，各地爭相提請中央授權在客觀上造成“僧多粥少”的法治局面。²可以說，囿於時下中國國家治理實踐現實，地方政府過分依賴中央授權以推動區域經濟發展和制度建設缺乏理性，更應“自尋出路”，積極利用各種有利政策因素尋求區域協同建設的突破。³

“一國兩制三法域”粵港澳三地尚未成熟定型，各地施政的“最大公約數”模糊不清，僅僅依靠頂層宏觀設計和中央必要時協調，無法取得大灣區實質性融合效果。粵港澳三地治理者意欲尋求構建緊密的跨域協同機制，但卻受到形式規範上的區域劃分和實體規則上的制度差異限制。⁴然而，任何形式與實體上的差異都只是技術性問題，絕非價值理念融合的壁壘，粵港澳三地宜確立大灣區的整體價值理念，依托“區域行政”理論構建以“灣區行政”為語境的灣區法治理論體系。背後的價值理性在於，通過灣區法治理論體系的建構與完善，為粵港澳三地治理者掃清跨境融合發展的理念障礙，進而引領粵港澳三地“灣區行政”實踐向前推進並不斷取得突破。而在區域法治理論研究起步較晚的情境下，“灣區行政”的學理性發展傾向並不明顯，許多學者雖以粵港澳大灣區為研究場域或主題開展論斷，但卻不能自覺承擔形塑灣區法治理論體系的重任。未來，應通過各種激勵手段鼓勵粵港澳三地學者積極投身於灣區法治研究當中，不斷夯實大灣區的基礎理論基石，為公共衛生應急協同建設提供堅實的學理支撐。

3、率先推動大灣區建成全國統一大市場

灣區一詞自誕生之初，就帶有明顯的經濟效應色彩。從比較視野來看，國際三大灣區均依托世界級港口、背靠廣闊腹地，具有高度開放的經濟結構、高效的資源配置網絡和強大的集聚外溢功能，所形成的“灣區經濟”效應疊加釋放並在全球經濟發展中扮演著重要角色，無不是“開放、創新、宜居、國際化”的代名詞，⁵粵港澳大灣區亦不例外。從大灣區有關的規劃文本來看，與經濟發展相關的內容不僅占據主要篇幅，還大多作為重點發展

¹ 公丕祥：《法治中國進程中的區域法治發展》，《法學》2015年第1期，第3-11頁。

² 鄒平學，馮澤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深圳法治建設的內在邏輯及立法進路》，《深圳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20年第4期，第34-45頁。

³ 石佑啟，陳可翔：《粵港澳大灣區治理創新的法治進路》，《中國社會科學》2019年第11期，第64-85+205-206頁。

⁴ 馮澤華：《粵港澳大灣區體育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法治協同保護》，《體育學刊》2022年第2期，第32-38頁。

⁵ 張昱，陳俊坤：《粵港澳大灣區經濟開放度研究——基於四大灣區比較分析》，《城市觀察》2017年第6期，第7-13+24頁。

目標而獨立闡釋明，體現出中央與地方對大灣區的定位首先是“經濟灣區”。“灣區行政”作為一個晚近形成的概念，其出現與發展首先植根於粵港澳三地以經濟合作為內容的跨境深度協作，是“灣區經濟”之下的產物。從改革開放之初由地方市場力量推動形成了港澳地區與珠三角“前店後廠”的地域分工與經貿合作，到港澳回歸後形成了基於CEPA框架的緊密地區經貿合作與泛珠三角社會融合，再到粵港澳大灣區正式提出後人員、資源與信息流跨境高效配置下，躍升為我國經濟活力最強的區域，“灣區經濟”始終是粵港澳三地合作的關鍵詞。可以說，粵港澳大灣區雖然承載了政治、人文、社會等多領域任務，但這些無不立基於大灣區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之上，即粵港澳三地只有攜手建好“經濟灣區”，才能為共建“健康灣區”“安全灣區”“人文灣區”提供頂層式的邏輯前提。

類似地，在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的語境下，只有暢通粵港澳三地跨境生產要素流動的制度壁壘和物理障礙，依托各種有利因素助力粵港澳大灣區經濟實現又一輪騰飛，才能為“灣區行政”這一形而上的概念夯實物質基礎。不難看出，“灣區經濟”與“灣區行政”形成了明顯的互動關係，前者的進一步發展是後者得以生成和確立的前提，而率先建成全國統一大市場或將成為關鍵的破局點。事實上，在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的《關於加快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的意見》中就明確提出，鼓勵粵港澳大灣區等區域在維護全國統一大市場前提下，優先開展區域市場一體化建設工作。¹從定位上看，粵港澳大灣區具備獨特的地域優勢和優越的開放環境，是國內循環與國際循環的結合與對接區，可利用先行先試優勢率先探索推動“統一大市場”的有益經驗，助力加快形成新發展格局。²而在推動大灣區統一大市場建設過程中，為充分發揮市場對資源配置的決定性作用，粵港澳三地政府必須以打造一流營商環境為抓手，加快破除妨礙生產要素市場化配置和商品服務流通的體制機制障礙，增強大灣區整體集聚和配置各類資源要素能力。³而這正是“灣區行政”在經濟領域的應有之義，從整體上形成了二者雙融雙促的良性循環。

（二）從“單向式開放”到“互通式開放”

1、規則互認

粵港澳大灣區雖以“新的地理空間”的身份作出全盤謀劃，然而細究之下可以發現其內部“9+2”城市之間其實存在很大的發展差異，是粵港澳三地實現“互通式開放”面臨的首要障礙。以法治發展水平為例，法治是香港的核心價值，澳門同樣尊重法治精神，而廣東正在深入推進“法治廣東”建設，持續打造全國法治環境最好的地區之一，⁴珠三角九市的法治指數因而日益提升。概言之，依法治理是粵港澳三地政府均亟須秉持的行政原則，

¹ 《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加快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的意見》，《人民日報》2022年4月11日，第1版。

² 鄒新月，矯萍：《率先探索統一大市場 推動粵港澳大灣區形成新發展格局》，《深圳特區報》2022年4月19日，第B01版。

³ 陳林，張璽文：《建設統一大市場：粵港澳大灣區市場一體化的演化歷程、經濟規律與可借鑒經驗》，《國際經貿探索》2023年第5期，第4-15頁。

⁴ 李希：《忠誠擁護“兩個確立” 堅決做到“兩個維護” 奮力在全面建設 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中走在全國前列創造新的輝煌》，《南方日報》2022年5月31日，第A02版。

是大灣區公共衛生法治協同建設的最大公約數。但立足比較視角，港澳特區的法治水平事實上遠高於珠三角九市，同時珠三角九市間的法治狀況也存在較大差異。其中，經濟發達的廣州、深圳，其法治程度走在廣東省前列，而其他大灣區內地城市均面臨一定的發展障礙。在差異化與個性化並存的情境下，大灣區可採取規則互認的方式推動“互通式開放”。具言之，可充分發揮每座城市的優勢彰顯自身發展特色，依托本地區優勢資源建構起立法水平高、普適性強的規則體系，並力求獲得其他地區的認可，進而在實現要素跨境流通的同時為其他地區補齊制度短板。例如，知識產權的地域性使得其效力僅在該國家或地區內具有約束力，加之粵港澳三法域的差異性更加深了知識產權流通的鴻溝。¹具言之，香港特區的知識產權保護水平全球領先，規則體系對標國際標準較為完善。據此，粵港澳三地共同採取認可或部分認可香港知識產權規則體系的方式，或將是消除粵港澳三地知識產權制度沖突的最優解。

2、規則互融

融，意指融合、消融。規則互融，指的是粵港澳三地通過各種方式實現規則體系之間的有機融合，削弱因制度壁壘造成生產要素流動的高額成本，進而實現“互通式開放”。規則互融的關鍵路徑在於趨同，即將粵港澳三地差異性較小的規則通過趨同方式實現對接，例如為“互通式開放”創設良好的開放環境。目前而言，實現趨同的方式大體分為以下三種：1.內地的規則向港澳靠攏；2.港澳的規則向內地靠攏；3.內地和港澳都改造各自的規則向第三方規則靠攏。²至於選擇何種趨同模式，取決於需被趨同的規則如何更能平衡粵港澳三方利益、更有利於推動港澳融入粵港澳大灣區建設與國家發展大局。單從技術維度來看，規則趨同的標準應“就高不就低”，各方均朝著國際水平更高的規則體系邁進，為構建國際一流灣區奠定基礎。例如，針對內地與港澳稅收制度的差異導致稅制不協調不公平的問題，可基於我國減稅降負、營造良好營商環境的大背景下充分借鑒港澳簡單高效的稅收制度，主要針對所得財產進行征稅，以稅制趨同促進大灣區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³從適用範圍來看，不同於規則互認，規則互融的適用主要存在於那些由於三地管理方式與管治傳統不同，但不存在根本性矛盾，進而可借助充分協商達成共識的領域，例如社會保障規則、職（執）業資格認證、教育等。換言之，粵港澳三地在這些領域均致力於實現更高水平，因此存在協商對話的空間並借此消除制度壁壘。

3、規則互聯

聯，意指聯通，連接。規則互聯，指的是粵港澳通過法定方式達成合作共識，實現各方規則在緊密區際協作的實踐中、互動中調適張力進而實現聯結。互聯是區域共識和區域

¹ 梅傲：《粵港澳大灣區知識產權法律沖突及解決路徑探析》，《中國流通經濟》2020年第1期，第122-128頁。

² 鄒平學：《粵港澳大灣區法治合作和規則銜接的路徑探討》，《青年探索》2022年第4期，第5-14頁。

³ 陳雙專，溫彩霞：《粵港澳大灣區人才流動的稅收瓶頸與稅收協調》，《稅務研究》2019年第11期，第66-70頁。

融合的重要載體。即使地區之間是雙向開放的，但形式上如果沒有接納開放行為需以規則對接的行動範式，各地區的規則依然是開放壁壘。規則互聯有利於增進府際合作的互信，行政行為進一步開放、透明，有利於活躍要素流動激發優勢資源協同性能，協同關係進一步密切相連。規則互聯的常見形式就是大灣區大量簽訂的區際行政協議，通過達成雙邊或多邊的合作共識並以文本的形式固定下來，為當前和未來一個時期的各方就某一事項開展協調、溝通提供方案。然而，如前所述，大灣區簽訂的區際行政協議面臨制定依據不明、主體權限不清、地方利益導向明顯、糾紛解決機制缺位等弊端，其本身的合憲性也存疑，實際上無法滿足粵港澳深度融合的規則銜接需要，引致大灣區遲遲未能實現“互通式開放”。具言之，粵港澳三地政府在簽訂區際行政協議後，因缺乏有效的監督保障機制，各方基於“理性經濟人”的理念邏輯容易忽略其中關於開放本地區的條款內容以維護本地區利益最大化，引致“互通式開放”往往僅停留在本文層面而欠缺具體落實。¹基於這樣的理論前置，規則互聯應當尋求其他方式以實現規則互聯，其關鍵路徑在於創新，即在粵港澳各自規則的基礎上再造可適用於大灣區的創新性規則。

¹ 江國華，謝海生：《粵港澳大灣區法治深度協同的構想與進路》，《地方立法研究》2022年第4期，第77-87頁。

區域合作與澳門高等職業教育發展路徑

高勝文¹

摘要：澳門開埠已 400 多年，以師徒制教學形式為主的職業教育源遠流長，有着悠久的歷史。但由於長期經濟比較落後以及澳葡政府對教育的不重視，致使澳門的教育事業在幾個世紀以來發展非常緩慢，職業教育發展亦然。對此，本文通過回顧澳門高等職業教育的歷史與現況，分析澳門高等職業教育發展障礙，並結合實際情況，在區域合作模式下，提出澳門高等職業教育發展路徑，以進一步推動澳門高等職業教育的發展。

關鍵詞：區域合作；職業教育；高等教育；經濟轉型；澳門

一、前言

職業教育是國民教育體系和人力資源開發的重要組成部分。發展職業教育，已經成為世界各國應對經濟、社會、人口、環境、就業等方面挑戰，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戰略選擇。²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職業教育法》（下文簡稱《職業教育法》）的定義，“職業教育（vocational education），是指為了培養高素質技術技能人才，使受教育者具備從事某種職業或者實現職業發展所需要的職業道德、科學文化與專業知識、技術技能等職業綜合素質和行動能力而實施的教育，包括職業學校教育和職業培訓。”³《職業教育法》第三條指出，“職業教育是與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教育類型，是國民教育體系和人力資源開發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培養多樣化人才、傳承技術技能、促進就業創業的重要途徑。”⁴這明確了職業教育是一種教育類型，而不是教育層次，對於擺正職業教育的地位，發揮職業教育服務社會和個體發展的能力，以及推進職業教育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具有重要的發展戰略意義，極大地豐富了職業教育理論；另一方面，具有重要的政策指導和實踐意義，明晰了職業教育和普通教育的聯繫與區別，指明了職業教育的發展方向，有利於職業教育系統更明晰自己的功能和作用，進一步探索和完善職業教育獨特的辦學模式和人

基金項目：本文為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澳門基金會 2024 年學術項目資助計劃《“一帶一路”倡議及粵港澳大灣區背景下 澳門高等教育發展研究》（項目申請編號：G01540-2309-148）的階段性成果。

¹ 高勝文，行政學博士，高勝·文化基金會創辦人，國際（澳門）學術研究院院長。

² 引自《中國職業教育發展報告（2012—2022 年）》序言。

³ 引自《中華人民共和國職業教育法》第二條。

⁴ 引自《中華人民共和國職業教育法》第三條。

才培養模式，更好地服務、支撐國家現代化建設。¹

2019年1月，國務院印發《國家職業教育改革實施方案》（下文簡稱《職改方案》），《職改方案》指出，推進高等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是完善國家職業教育制度體系的重要一環，並從完善國家職業教育制度體系、構建職業教育國家標準、促進產教融合校企“雙元”育人、建設多元辦學格局、完善技術技能人才保障政策、加強職業教育辦學品質督導評價、做好改革組織實施工作等方面，促進高等職業教育的發展，為促進經濟社會發展和提高國家競爭力提供優質人才資源支撐。

澳門開埠已400多年，以師徒制教學形式²為主的職業教育源遠流長，有着悠久的歷史。但由於長期經濟比較落後以及澳葡政府對教育的不重視，致使澳門的教育事業在幾個世紀以來發展非常緩慢，³職業教育發展亦然。現時澳門職業教育的本質仍為中學教育，沒有類似內地大專等院校的升學機制，導致職業教育階梯斷層，從事相關職業人數低；⁴加上由於澳門經歷的前三次經濟轉型⁵，使產業從多元趨向單一，為經濟發展埋下危機隱患，尤其博彩業一業獨大，排擠了其他產業發展，也對澳門職業教育發展造成不利影響。

近年，澳門特區政府正積極配合中央政策，逐步落實“一中心、一平台、一基地”的功能定位、融入及共建粵港澳大灣區、參與國家“一帶一路”倡議建設。現時，特區政府正採取“1+4”適度多元發展策略，大力發展綜合旅遊休閒業、大健康、現代金融、高新技術、會展商貿和文化體育等四大重點產業發展。由此，帶動澳門進入第四次經濟轉型，有望能優化產業結構，進一步推動經濟適度多元發展。⁶

未來，如何完善澳門高等職業教育發展，為重點產業培養所需人才，是決定經濟復甦速度的關鍵因素。對此，本文通過回顧澳門高等職業教育的歷史與現況，分析澳門高等職業教育發展障礙，並結合實際情況，在區域合作模式下，提出澳門高等職業教育發展路徑，以進一步推動澳門高等職業教育的發展。

¹ 教育部職業教育與成人教育司.從“層次”到“類型”職業教育進入高質量發展新階段——“十三五”期間職業教育發展有關情況介紹，引自

http://www.moe.gov.cn/fbh/live/2020/52735/sfcl/202012/t20201208_503998.html

² 師徒制教學形式主要有父業子承、合同式學徒制、行業學徒制等形式。

³ 高勝文.澳門非高等持續教育：歷史脈絡與現實意義[J].行政 第129期.澳門：行政公職局，2020：P4.

⁴ 宋碧琪促完善職業教育向上流動機制，引自

<https://www.tdm.com.mo/zh-hant/news-detail/663085?isvideo=false&lang=zh-hant&category=all>

⁵ 根據澳門跨領域學者高勝文撰寫的《“一帶一路”倡議及粵港澳大灣區背景下 澳門的發展範式與推進路徑》一書，高勝文把澳門晚清至回歸二十年的近代經濟史劃分為四個時期。

晚清時期逐漸發展起來的原料加工業和專營制度產業，促成澳門首次經濟轉型；此後，七、八十年代紡織製造業的興起及內地的改革開放政策，開拓及發展了銀行、保險、房地產等高附加值服務業，這可視為澳門的第二次經濟轉型；20世紀末，澳門回歸後賭權開放，帶動澳門進入第三次經濟轉型；隨着2003年《內地與港澳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EPA）的簽署實施、2013年“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及2019年《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的正式發佈，澳門特區政府正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配合中央政策，逐步落實“一中心、一平台、一基地”的功能定位、共建粵港澳大灣區、參與國家“一帶一路”倡議建設。由此，帶動澳門進入第四次經濟轉型。

⁶ 高勝文：《“一帶一路”倡議十周年 倡議促全球發展中國成為世界榜樣》，《星報》2023年11月3日。

二、澳門高等職業教育的歷史與現況

1981年3月28日東亞大學（今澳門大學）的誕生，可視為澳門現代高等教育的發軔。因此，本文以1981年東亞大學的建立為歷史時間界點，闡述澳門高等職業教育的歷史與現況。

（一）澳門高等職業教育的歷史

澳門高等職業教育起源於非高等職業培訓及非高等職業教育。

在非高等職業培訓方面，由於20世紀70年代澳門經濟的發展和騰飛，使得澳葡政府深深感到培養具有一定專業技能的人才的緊迫和重要，職業教育開始受到重視。有鑒於此，澳葡政府頒佈了第44/82/M號法令《訂定技術職業訓練基礎》，為開展職業培訓活動奠定基礎，1985年2月成立了第一所職業培訓中心，1989年望廈職業培訓中心亦相繼成立，兩中心均由當時負責教育範疇的澳門教育暨青年司管理。面對社會勞動力結構的改變與勞動力市場的不斷發展，澳門政府認為將職業培訓中心撥歸當時的勞工暨就業司（現為勞工事務局）管理將較為理想。因此，1992年勞工暨就業司就正式接管了職業培訓中心，1997年，勞工暨就業司先後再增設了兩所職業培訓中心。這使澳門的職業培訓無論在課程的種類、形式及制度上都有快速的發展。¹

回歸後，特區政府因應有關的發展和轉變，不斷透過調整各項職業培訓政策及投入大量資源，促進勞動力向上流動。2006年經濟財政司司長透過第60/2006號批示訂定《職業培訓專款規章》，資助培訓實體為就業市場而舉辦之職業培訓課程之發放制度，藉此鼓勵各機構積極向澳門市民開辦高質素的課程提升市民的專業技能。澳門回歸以來，職業培訓取得一定的成績，包括推動持續進修，使收生逐年增加、以獨特學習環境，培養學員工作能力、以及學員參與國際競賽，均取得豐碩成果等。目前，各類職業培訓課程將繼續不斷優化，從而達到提升居民的就業競爭力、為市場提高人才素質的施政目標。²

澳門非高等職業教育發展歷史較短，最早可追溯至1878年，由“振興學會”興辦的商業學校，即是目前的澳門土生教育協進會創辦的葡文學校。翻查1920年的《政府公報》，商業學校開設初級及高級商業科目，包括商科、會計、打字、速記等實用商業課程，畢業生通常受聘到港澳大小洋行工作。再翻閱1893年7月27日政府公佈，當時統領澳門市政教育文化康樂等工作的市政廳，在以葡人或土生葡人子弟就讀的利宵中學創辦商業課程，為期三年，課程包括有簿記、讀本及中葡翻譯、商業信札等，應該說是澳葡政府開辦的公立職業技術中學課程。³天主教會對職技教育亦是不遺餘力，1906年的天主教慈幼會雷鳴道

¹ 高勝文：《澳門職業培訓的挑戰、機遇與發展策略》，《澳門非高等持續教育論集》。澳門：科教文出版社，2023：P125-126。

² 高勝文：《澳門職業培訓的挑戰、機遇與發展策略》，《澳門非高等持續教育論集》。澳門：科教文出版社，2023：P126-129。

³ 吳又可：《非高等教育職技教育的過去、現在與將來（一）》，引自 <http://www.sonpou.net/0411/Han.htm>

神父在澳門創辦“聖母無原罪工藝學校”（以下簡稱“工藝學校”）。工藝學校主要是對其收容的貧困孤兒進行職業技術教育，以期授其一技之長。工藝學校最初開設的專業有縫紉、木工、革履、印刷、裝訂等，使學生掌握“工業之技能”是該校重要的辦學宗旨。1937年日本發動侵華戰爭，致使大批難民由內地遷往澳門，入學人數隨之增加。1939年，工藝學校增設初中部，校名為“私立鮑斯高初級中學”。1943年，學校易名為“鮑斯高職業學校”（今慈幼中學）。¹至20世紀70年代，國際貿易中澳門獲得西方國家提供的優惠政策，促使澳門吸引到外資投資建廠。加之內地的對外開放政策，澳門作為對外開放的關口率先獲益，經濟獲得迅猛發展。因應經濟發展的需求，澳門許多普通中學在高中課程中開設商業課程，也有一些專門的職業學校開設商業課程，普通教育出現職業化的趨勢。²一直以來，宗教社團及華人社團是澳門民間辦學的主要力量，形成至今澳門非高等職業教育主要由慈幼中學、三育中學、雷鳴道主教紀念學校、中葡職業技術學校、澳門工聯職業技術中學、創新中學、新華夜中學、澳門演藝學院等提供，開設行政、商業、旅遊、電腦、服裝、電子、武術、工業維修、機電工程、社會服務、會計、翻譯、製冷及藝術等課程。

在非高等職業教育政策方面，受限於一九九六年公佈的九月十六日第54/96/M號法令所制定的“關於技術及職業教育之指導性制度”規範，為完善非高等教育職業技術教育制度，特區政府制定第22/2021號行政法規《非高等教育職業技術教育制度》，並於2022年9月1日起生效。法規主要為促進職業技術教育的持續發展，建立與高等教育的銜接機制，深化學校、企業、相關行業的專業團體及人士的合作，提升職業技術教育的專業性和認受性，訂定職業技術教育的課程框架，以及提高職業實習的成效等方面作出規範及優化。³

在高等職業教育方面，1981年東亞大學（今澳門大學）誕生前，澳門因應社會、經濟、產業等，曾開設航海、護理、師範等領域的高等職業教育，這可視為澳門高等職業教育的肇始。澳門，作為古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起點和發祥地，以及受造船業與葡萄牙航海技術的影響，使航海技術教育成為澳門最早的高等職業教育。早在1594年創辦的聖保祿學院已開設與航海關係密切的天文學。從16世紀末到19世紀末，澳門的航海技術教育三度開設、三度停辦。1790年，當時市政廳獲委托負責考核在職領航員的資格和能力，澳門開始了有組織的海事教學活動。初時，為這些考核而設的教學是私立形式。直到1814年開設了“澳門市皇家領航員學校”，並於1815年開辦了第一個課程。隨後於1862、1906年開設過同類的學校，最後於1980年設立了現今的航海學校。一方面，航海技術教育側面反映了澳門海事活動的興衰，另一方面，也是澳門航運史及開埠建港史的縮影；⁴澳門的醫學教育和護理教育歷史久遠，早於1594年創辦的聖保祿學院就開設有醫學課程，澳門歷史上有三所護

¹ 馮增俊，黎義明：《澳教育概論》，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1999：P260。

² 馮增俊，黎義明：《澳教育概論》，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1999：P265。

³ 《非高等教育職業技術教育制度》，引自

<https://portal.dsedj.gov.mo/webdsejspace/site/policy/201806/index.jsp>

⁴ 澳門海事教育歷史，引自 https://www.marine.gov.mo/subpage.aspx?a_id=1432283537

士學校，包括 1923 年成立的“鏡湖高級護士學校（今鏡湖護理學院）”、1939 年設立的“聖辣菲護士學校”、1964 年成立的官立護士學校，三所護士學校學制¹雖然不同，但同樣對澳門醫療事業作出了一定的貢獻；²澳門師範教育起步較晚，據相關文獻資料顯示，20 世紀 30—80 年代前澳門不存在正規的教育學院，由於戰亂、師資缺乏、人口增長等因素的推動下，當時澳門的師範教育多是由內地南遷來澳的院校所開設的，或於部分中學相繼開設（見表 1）。隨着 1985 年華南師範大學教育專業澳門地區校外課程及 1987 年東亞大學在職教育文憑課程的開設，澳門師範教育才日漸正規專業化。

表 1 20 世紀 30—80 年代前澳門開設師範教育學校概況

序號	年份	開設師範教育學校
1	1938	協和女子中學三年制幼稚師範班
2	1938	執信女子中學附設師範班
3	1949	華南大學社會教育系課程
4	1949	越海文商學院教育系
5	1950	中山教育學院特別師範夜班
6	1950	華僑大學高等師範科
7	1951	聖若瑟師範課程
8	1952	濠江中學簡易師範班
9	1953	德明中學幼稚園師範科
10	1965	官立葡文小學師範學校
11	1966	聖約翰書院中文部特別幼師科
12	1967	蔡高中學一年制幼稚園師範班

資料來源：根據劉羨冰：《澳門教育史》，澳門：澳門出版協會，2007：P219-220 資料整理而成。

可見，當時澳門的高等職業教育雖然出現較早，但澳門回歸前，由於澳葡當局對葡萄牙人以外的居民教育的漠視，20 世紀 80 年代以前澳門的教育體制並不健全，缺乏從初等教育到高等教育的層級結構。私立學校由於辦學主體多元，學制不一，師資不足等原因，學校的品質參差不齊。整個基礎教育的發展水準並不能滿足澳門經濟社會的發展需求。³可以

¹ 鏡湖高級護士學校採用美制、聖辣菲護士學校採用法制、官立護士學校採用葡制。

² 劉羨冰：《澳門教育史》，澳門：澳門出版協會，2007：P203-218。

³ 李向玉，謝安邦主編：《澳門現代高等教育的發軔——東亞大學的創立和發展》，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P18-19。

說，在現代高等教育體系形成前，高等職業教育更難以發展。

（二）澳門高等職業教育的現況

回顧澳門教育史，澳門高等教育具有悠久的淵源，但現代高等教育發展只有約 40 餘年歷史。早期高等院校較少，提供的課程及學術範疇亦較為單一，隨着院校逐漸增加，以及社會對不同專業知識的需求，課程類別已日趨多元化，¹並逐漸出現多個具職業導向的課程。

自 1981 年東亞大學（今澳門大學）誕生後，澳門現代高等教育的歷史分為三個階段，即東亞大學的建立（1981—1988 年）、東亞大學的轉制（1988—1991 年）及澳門高等教育體系的形成（1991 至今）。高等院校數量從回歸前的 7 所增加到 2001 年的 10 所，其中，4 所為公立院校，6 所為私立院校。當中包括有綜合性教學和研究雙結合的大學，以應用教學為主的多專業理工大學，主力培養旅遊會展人才、博彩業專才、專業護理人員及高級管理人才的專科學院，以及為培養澳門保安中高層管理人員的專門學校，各所院校均有其不同的發展定位和培育人才的目標。同時，還有聯合國大學國際軟體技術研究所及澳門歐洲研究學會兩間研究機構，這格局至今沒有改變。²

20 世紀 90 年代，為配合社會及大學自身發展的需要，澳門大學的兩個中心—預科中心及持續進修中心進行了一系列調整，分別旨在完善中學畢業生入讀大學的途徑及為社會各界人士提供更多持續進修的機會，其中，持續進修中心成立初期，因應社會需要，主要開設語言、管理、會計、電腦、秘書等範疇的短期培訓課程。1995 年第 32/95/M 號法令《訂定在回歸教育以及延續及社會教育方面成人教育之組織及發展之總框架》頒佈，校外課程中心隨即加大力度推廣延續教育，與其他機構合辦一系列更具針對性的課程，或者根據有些企業的要求設計課程，滿足學員進修的需求。1998-1999 年，為配合澳門即將回歸的社會發展趨勢，校外課程中心着重為市民提供技術職業培訓課程，新增多項實用而優質的全科系列證書課程，為本地人才的成長提供更多的持續進修機會（見表 2）。另外，大學為保安高校提供課程支持，在過渡期協助培養了一批優秀的本地警官及消防官，為澳門回歸祖國和平穩過渡做出貢獻。³

¹ 高勝文：《澳門現代高等教育的回顧與展望（1981-2021）》，《行政》第 136 期，澳門：行政公職局，2022：P79。

² 高勝文：《澳門現代高等教育的回顧與展望（1981-2021）》，《行政》第 136 期，澳門：行政公職局，2022：P81-83。

³ 李向玉，謝安邦主編：《澳門現代高等教育的轉制變革——過渡期澳門高校的發展（1987—1999）》，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2020：P65-68。

表 2 1997—2000 年持續進修中心課程參加人次數

单科课程	参加人次數		
	1997—1998 年	1998—1999 年	1999—2000 年
计算机及信息系统管理课程	60	257	1 666
行政、组织管理课程	114	976	1 540
工商管理、会计、金融及财务课程	152	196	1 551
法律课程	25	15	130
成人与延续教育培训、环保、社工及护理课程	—	187	554
图书管理、文物修护及其他课程	—	56	783
语言课程	163	461	395
中国语言及文化课程	—	111	69
总人次數	514	2 259	6 688

資料來源：李向玉，謝安邦主編：《澳門現代高等教育的轉制變革——過渡期澳門高校的發展（1987—1999）》，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2020：P67。

可以說，上述澳門大學於回歸前開設的這些課程，開創了現代澳門高等職業教育的先河，標誌著現代澳門高等職業教育的肇始。

表 3 2022/2023 學年院校開辦學位課程

學位課程	公立高等院校	私立高等院校	合計
有開辦學士學位課程	4	6	10
有開辦碩士學位課程	3	4	7
有開辦博士學位課程	3	3	6

資料來源：澳門《教育統計數據概覽 2023——第五章 高等院校基本資料》

雖然，澳門缺乏一所綜合型的高等職業院校，但特區政府一直支持和鼓勵高等院校配合澳門經濟發展及人才培養需要，開辦更多不同類型的職業導向型課程，培養不同領域的應用型人才。據 2022/2023 學年院校開辦學位課程資料顯示，有 10 所高等院校開辦博士學位課程，7 所高等院校開辦碩士學位課程，6 所高等院校開辦學士學位課程（見表 3）。此外，在 2022/2023 學年，各高等院校有 347 個高等教育課程在運作，當中包括博士學位、碩士學位、學士學位、學位後文憑、高等教育文憑及副學士文憑課程（見表 4），這對高等職業教育的發展起到了一定的促進作用。

表 4 2022/2023 學年課程數目（高等院校列表）

高等院校	學士	碩士	博士	其他				合計	
				文憑	專科	學士補充	學位後		
公立	澳門大學	35	47	24	1	-	-	3	110
	理工大學	21	6	3	-	-	-	-	30
	旅遊學院	9	6	1	1	-	-	2	19
	保安高校	2	-	-	-	-	-	-	2
私立	科技大學	21	38	38	-	-	-	-	97
	城市大學	10	17	14	-	-	-	-	41
	聖若瑟大學	11	14	9	1	-	-	1	36
	鏡湖學院	1	1	-	-	-	-	1	3
	管理學院	1	-	-	6	-	-	-	7
中西學院	1	-	-	1	-	-	-	2	
合計	112	129	89	10	-	-	7	347	

資料來源：澳門《教育統計數據概覽 2023——第五章 高等院校基本資料》

以 2020/2021 學年運作的 115 個學士學位課程為例，超過七成（共 76 個）具職業導向性質，涉及範疇包括言語語言治療、護理、翻譯、建築、設計、廚藝、會計、酒店管理、社工及教師等。除本地課程外，亦有外地高等院校在澳門開辦以在職人士為主要招收對象的非全日制高教課程，2019 年共有 27 個非本地高教課程在澳門運作，當中學士學位課程共有 6 個，大部分屬職業導向型課程。此外，根據《高等教育制度》法律及相關配套法規，院校可按規定將專業經驗及職業培訓等轉換或認可為學分，上限為課程總學分的百分之二十，為在職或已接受相關培訓的人士繼續升讀高等教育課程提供更有利的條件。院校亦可透過學分制開辦多元化的課程，例如澳門管理學院和聖若瑟大學已開辦副學士文憑課程，為在職人士提供學習不同專業知識技能及持續進修的機會，完成有關課程的人士，可申請入讀與該文憑所對應的同一知識範疇的學士學位課程第三年級，該制度可讓居民更有彈性地選擇修讀高等教育課程，配合社會發展需要培育應用型人才。¹

綜上所述，澳門高等職業教育相對於澳門非高等職業教育來說，呈現起步較晚但發展迅速的態勢。可以說，自現代高等教育體系形成後，澳門高等職業教育已成為澳門高等教育的發展重點方之一。

三、澳門高等職業教育發展障礙

現時，澳門只有具職業導向性質之高等教育課程，仍缺乏一所綜合型的高等職業院校。為促進高等職業教育的發展，曾有學者倡辦灣區聯合大學²及提出建立職業技術大學³的建

¹ 關於立法會麥瑞權議員書面質詢的答覆，引自

<https://www.al.gov.mo/uploads/attachment/2021-02/36053601a6c007dc69.pdf>

² 高勝文：《倡辦灣區聯合大學》，《澳門日報》2019 年 2 月 17 日。

³ 梁根潤：《建立澳門大灣區職業技術大學的建議——助力澳門產業多元發展》，《澳門經濟》第五十

議，並認為在澳門建立一所綜合型高等職業院校的問題上，出現了理論上需要、各界關注，但客觀上、政策上缺乏條件的困境。¹但社會文化司司長歐陽瑜在辯論 2023 年度社會文化範疇施政方針時指出，澳門沒有條件建大學城。²可以預見，未來澳門高等職業教育發展除受土地資源限制外，仍存在以下發展障礙。

首先，澳門高等職業教育缺乏發展規劃。長期以來，由於教育主體缺乏規劃意識，引致高等職業教育發展存在隨意性，未能對本地產業結構調整起到支持作用，而相關之教育諮詢、評估、撥款等也缺乏嚴謹、具有國際標準的條例進行規範，導致澳門高等職業教育水準不高，現代化水準低下。³

其次，澳門高等職業教育法制建設落後。現時，高等職業教育發展缺乏強有力的法律支持與保障。如第 10/2017 號法律《高等教育制度》並沒有關於職業教育的具體的內容；而 2020 年 12 月發佈的《澳門高等教育中長期發展綱要（2021-2030）》（下文簡稱《綱要（2021-2030）》），是對澳門高等教育未來十年發展的目標與對策的一份框架性、綱領性的文件，主要內容包括願景與總體目標，以及訂立完善機制建設、適度擴大學生規模，優化生源和課程結構、促進院校發展和資源共享、保障高教素質持續提升、培養學生全面發展、強化院校人員專業水平、推動科研創新及產學研發展、把握區域合作機會開拓發展空間等八大發展方向；同時，也設定中期檢討機制，跟進和評估《綱要（2021-2030）》的實施情況並作出相應的調整及優化。但條文未見對高等職業教育發展作詳細訂定。

第三，生源數量與各種投入資源不足。無庸置疑，職業教育是澳門特區教育事業的重要一環，關係澳門應用技術人才的培養，但受傳統觀念、職業教育規劃不足及其他相關因素影響，多年來澳門職業教育學生人數較低。統計數據顯示，2022/2023 學年澳門職業教育學生共 816 人，僅佔澳門中學生總人數不足 1%。⁴同時，2018 年內地高校保送生考試新增了五所職業技術學院，合共提供百個名額，專業涵蓋經濟管理、藝術設計、機電機械、化工食品檢驗等領域，為澳門選擇職業教育的學生不能對口升學的問題提供了解決方案。然而，最終只有一名學生報讀“視覺傳播設計與製作”專業。⁵

事實上，除了生源總體數量維持較低比例外，現時澳門的職業教育亦缺乏企業的積極參與，澳門本地企業以中小企為主體，由於企業管理體制、對校企合作的認識不足，加之有關政策缺乏鼓勵條件以及部分職業教育專業設置與市場需求脫節等不利因素，多數企業與學校的合作缺乏動力，仍停留在表面的淺層次結合上，制約了職業技術教育的發展。⁶因

期，澳門：澳門經濟學會，2021：P127-139。

¹ 梁根潤：《橫琴與“澳門大灣區職業技術大學”——論兩者互為對方帶來的機遇》，《澳門經濟》第五十一期，澳門：澳門經濟學會，2021：P110。

² 《社會文化範疇施政方針辯論答問撮要》，《市民日報》2023 年 11 月 28 日。

³ 鄒一戈：《回歸十年澳門高等職業教育發展特點及策略走向》，《職業技術教育》第一期，吉林：吉林工程技術師範學院，2012：P87。

⁴ 根據澳門教育及青年發展局《教育統計數據概覽 2023》第二章非高等教育數字相關內容整理所得。

⁵ 《職技院校僅一人考咗料》，《人民日報海外版》2018 年 1 月 22 日。

⁶ 何潤生就職業教育提書面質詢，引自 https://www.cyberctm.com/zh_TW/news/detail/2164652

此，亦難以形成具“澳門特色”的高等職業教育。

四、澳門高等職業教育發展路徑

回歸以來，澳門特區政府一直致力推動各級教育發展，包括職業教育。但近年澳門的社會經濟等方面已發生巨變，各方面的快速發展對職業教育提出了許多新的要求，以致澳門高等職業教育仍存在缺乏發展規劃、法制建設落後、生源數量與各種投入資源不足等發展障礙。下文，將結合實際情況，在區域合作模式下，提出澳門高等職業教育發展路徑，以進一步推動澳門高等職業教育的發展。

（一）完善澳門高等職業教育發展規劃

綜觀世界工業發展史，職業教育特別是高等職業教育水準的高低，決定着一個國家或地區工業化水準的高低，一般而言，高等職業教育發達的國家或地區，如德國、新西蘭、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新加坡等都具有完善的高等職業教育發展規劃。因此，澳門特區政府必須完善高等職業教育發展規劃，才能大力發展“1+4”適度多元發展策略中的綜合旅遊休閒業、大健康、現代金融、高新技術、會展商貿和文化體育等重點產業。

我們應完善各級職業教育，包括非高等職業教育與高等職業教育。一方面，當局可透過資源投放及政策引導，在非高等教育領域推動學校開辦促進學生多元發展的課程和活動，鼓勵學校開辦與職業教育相關的課程，向學生提供多元和適性的教育選擇和機會；另一方面，當局也應完善現代職業教育體系，使之涵蓋專科、學士、碩士、博士等不同層次。此外，可加強區域合作，通過粵港澳三地合作，探索高等職業教育辦學新模式，推動粵港澳大灣區高等職業教育的發展。並在適當時機，在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籌建綜合型的高等職業大學，以突破土地資源限制，形成規模效應，使高等職業教育可持續發展。

（二）制訂澳門高等職業教育法律法規

毫無疑問，法律法規是高等職業教育發展必不可少的條件與重要保障。首先，建議當局可參照第 22/2021 號行政法規《非高等教育職業技術教育制度》制訂高等職業教育之專門法律法規，對高等職業教育的定義、行政當局的職責、課程開發準則、課程設置、職業實踐與實習、學生評核等方面作詳細訂定；其次，結合《綱要（2021-2030）》，制訂《澳門高等職業教育發展規劃》，對澳門高等職業教育的機制建設、招生規模、課程結構、促進院校發展和資源共享、提升與保障高等職業教育、強化院校人員專業水平、推動科研創新及產學研發展、把握區域合作機會開拓發展空間等方面作明確規範及指引；最後，也應逐步出台相關之《高等職業教育基金》、《高等職業教育素質評鑑制度》、《高等職業教育規章》、《高等職業教育學分制度》等法律法規，以及訂定在特殊教育範疇內開展具職業導向課程的專有法規，全方位為澳門高等職業教育發展保駕護航。

（三）增加投入資源吸納生源

誠言，部分人對職業教育的刻板印象、標籤效應仍存在、扭轉部分人們對職業技術教育的觀感是不能忽視的。建議當局可通過線上線下舉辦各種相關活動，使人們對職業教育的觀感得以提升，如透過講座、輔導、工作坊、考察參觀、職前體驗實踐、社團與企業及媒體宣傳等，助力居民了解職業教育的內涵，輔助學生做好生涯規劃，分析各行業的人才需求現況、就業前景，以增加高等職業教育的生源數量。

未來，除了加大力度繼續做好上述工作和計劃外，也應聯動社會資源，加強政府、企業、行業及學校等方面的溝通和合作，建立密切的互動機制，進一步促進產、學、研緊密的結合，為促進校企合作創造更多有利條件。此外，也應增加投入資源，完善高等職業教育撥款制度，為高等職業教育提供資助，以支持課程開辦、設備更新、學生考取專業證照、提供實習津貼、參與職業技能相關比賽、獎學金制度、學生升學和持續推動教學人員專業發展等，以及鼓勵社會力量捐贈、興辦職業教育，拓寬辦學籌融資渠道，以此推動澳門高等職業教育邁向更多元化發展。

（四）打造具“澳門特色”的高等職業教育

從目前的情況分析，澳門的綜合旅遊在全球處於領先位置，相關的旅遊教育水平也足以在行業內領先。當中，澳門旅遊學院的“粵港澳大灣區旅遊教育培訓基地”，在旅遊教育範疇具備領先內地城市的優勢；其創設的澳門職業技能認可基準（Macao Occupational Skills Recognition System, MORS）更是澳門獨有品牌。¹同時，澳門城市大學率先開展課程國際權威認證，旅遊業管理專業的博士、碩士、學士學位課程為均獲聯合國世界旅遊組織（UNWTO）TedQual 優質教育素質認證的特色課程，旅遊休閒管理學科位居軟科“2023 世界一流學科排名”入庫排名高校全球前 20%，位列排名 51-75。²因此，本文建議澳門可以利用旅遊教育優勢，向其他國家地區輸出旅遊教育服務，制訂相關之“職業技能標準”，以及配合銳意發展的新興產業開設相關高等職業教育課程，以打造具“澳門特色”的高等職業教育。

五、總結

教育奠基未來，技術變革生活。在推動人類社會發展中，職業教育前途廣闊、大有可為。³近年，澳門特區政府為促進經濟復甦、提振整體經濟，正採取“1+4”適度多元發展策略。有學者認為，完善澳門高等職業教育發展，為重點產業培養所需人才，是決定經濟

¹ 劉本立，柳智毅：《澳門高等教育市場化策略研究》，澳門：澳門經濟學會，2021：P101。

² 澳門城市大學簡介，引自 <https://cityu.edu.mo/zh/%e5%a4%a7%e5%ad%b8%e7%b0%a1%e4%bb%8b/>

³ 引自《中國職業教育發展報告（2012—2022 年）》結束語

復甦速度的關鍵因素。¹對此，我們應分析澳門高等職業教育發展障礙，並結合實際情況，在區域合作模式下，通過完善澳門高等職業教育發展規劃、制訂澳門高等職業教育法律法規、增加投入資源吸納生源等發展路徑，以進一步推動澳門高等職業教育的發展。並早日實現《澳門高等教育中長期發展綱要（2021-2030）》中訂定的“配合本澳發展定位與產業適度多元，樹立更多高教特色品牌學科，打造中葡雙語人才培訓基地及粵港澳大灣區旅遊教育培訓基地，形成更具區域競爭力的高等教育體系，為社會不斷進步提供有力的支撐。”的願景。

¹ 《高勝文提三建議促高等職業教育發展》，《現代澳門日報》2024年3月11日。

澳門普通學校教師特教教學調整之質性分析： 基於特教專業知能與學校行政支持的影響

董志文¹

摘要：本研究為質性研究，目的是瞭解澳門普通學校教師的特教教學調整與其特教專業知能、學校行政支持的關係。研究以 10 位澳門普通學校教師、2 位融合教育支援專家為研究對象，通過半結構式訪談得出以下結果：1) 學校行政支持、教師的特教專業知能及教師的特教教學調整等三者之間具有互為的關係；2) 特教專業知能、學校行政支持是影響教師的特教教學調整之重要因素。最後依據研究結果提供建議，以作為教師、學校領導層及政府的參考。

關鍵詞：普通學校教師；融合教育；特教專業知能；學校行政支持；特教教學調整

一、問題的提出

(一) 研究背景與動機

近年，澳門融合教育持續發展，有特殊教育需要的融合生也持續增加。根據教青局資料顯示，近五個學年融合生從 1480 人上升至 2381 人，² 數值持續增加中。面對這些孩子的特殊教育需要，政府於 2020 年頒佈《第 29/2020 號行政法規-特殊教育制度》，強調按學生的特殊教育需要，依個別化教育計劃訂定學習目標，為孩子提供教學、課程、評核等特教教學調整。³ 在學術層面上有文獻顯示，融合教育要有效實施特教教學調整，關鍵在於教師是否具有足夠的特教專業知能（即特殊教育的專業知識與技能），以及在教育過程中是否得到足夠學校領導層所提供的學校行政支持。⁴ 然而，影響澳門普通學校教師的特教教學調整是否也與這兩個因素有關？澳門普通學校教師在教導融合生過程中，其特教教學調整、特教專業知能及感受的學校行政支持等三者之間是否存在一定關係？目前仍有待我

¹ 董志文，教育學博士，聖若瑟大學教育學院訪問學者，澳門城市大學教育學院兼任學術人員，國際（澳門）學術研究院教育發展研究所研究員，澳門特殊教育研究學會研究員。

² 澳門教育及青年發展局：《教育統計數據概覽 2023-非高等教育數字》，2023 年 11 月 24 日，參見：https://mirror1.dsedj.gov.mo/dsedj/stati/2022/c/edu_num22_part2.pdf。

³ 澳門印務局：《第 29/2020 號行政法規-特殊教育制度》，2020 年 7 月 27 日，參見：https://bo.io.gov.mo/bo/i/2020/30/regadm29_cn.asp。

⁴ 鄧猛：《全納教育的基本要素與分析框架的探索》，載《教育研究與實驗》，2007 年第 2 期，第 43-47 頁。

們深入探討。因此開展有關研究，具有重要的實務意義。

（二）研究目的

根據研究動機，本研究之研究目的有以下五個：1) 探究學校行政支持與教師特教專業知能的關係；2) 探究教師的特教專業知能與其特教教學調整的關係；3) 探究學校行政支持與教師的特教教學調整的關係；4) 探究學校行政支持、教師的特教專業知能與其特教教學調整等的三者關係；5) 依據研究結果，為教師、學校及政府提供建議。

（三）研究問題

依據研究目的，本研究的研究問題有以下四個：1) 教師感受的學校行政支持與教師特教專業知能的關係是怎樣？2) 教師的特教專業知能與其特教教學調整的關係是怎樣？3) 學校行政支持與教師的特教教學調整的關係是怎樣？4) 學校行政支持、教師的特教專業知能是否能夠影響其特教教學調整？

二、文獻探討

（一）特教教學調整的意義

普通學校為融合生提供特殊教育服務時，為何需要進行特教教學調整？這是因為普遍來看，有特殊教育需要的融合生在學科的學習能力、學習成效上是不如普通學生，尤其像中、英、數等主流認知性學科，融合生在有關學科學習上往往會比較吃力。因此，普通班各項的普通教育措施與一般教育方案所提供給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支持與服務通常是不足夠或不合適的。¹ 隨着融合教育理念被社會大眾所接受，讓障礙孩子能公平在普通教育環境中學習，以減少被排斥，體現對兒童學習權利的基本尊重；因此，有越來越多障礙兒童進入普通學校學習，這亦會使到班裡的個體差異更會擴大；教師如果要令到這些障礙孩子能感受自己也是班裡的一員，而不是讓孩子隨班就座，則必須實施差異教學，對教學進行各項調整，否則這些障礙孩子不單不會體驗到被尊重，還會有失敗感及被排斥感。² 所以，為有障礙的融合生提供差異化的教學、課程、評量等特教教學調整，是普通學校推行融合教育中所必須要做的教育措施。

（二）特教教學調整的意涵

從特殊教育的差異化教學來看，特教教學調整是指教師為了滿足學生的需要，在教學上會設計多元化的課程、教材，以至實施多元的教學方法、評量等。³ 國外學者 Wood 認為，教師利用各種調整的方法，包括調整課程與教學、調整評量、調整環境等，使有特殊教育

¹ 林坤燦、郭又方：《因應個別障礙學生普通教育課程與教學調整方案之試探研究-以宜蘭縣國小輕度障礙學生為例》，載《東臺灣特殊教育學報》，2004年第6期，第33-64頁。

² 史亞娟、華國棟：《論差異教學與教育公平》，載《教育研究》，2007年第11期，第36-40頁。

³ 王輝、華國棟：《論差異教學的價值取向》，載《教育研究》，2004年第11期，第41-45頁。

需要學生在融合教育情境中學習，這些調整就構成了特教教學調整的要素。¹ 因此依據上述有關觀點，本研究會將為融合生提供的教學策略、課程教材、評量，以至班級環境等各樣的調整，都統稱為普通學校教師所實施的特教教學調整的重要組成部分。

（三）特教教學調整的影響因素

過往已有研究顯示一些變項可能是影響教師的特教教學調整的因素。例如有研究顯示女性教師在教學策略、教學情境等調整上，顯著優於男性教師，² 年齡在 45 歲以下的教師在評量情境、評量呈現方式、評量反應方式等調整上，顯著優於 46 歲以上的教師，³ 也有研究顯示有進修特教研習課程的教師，其特教教學調整會顯著優於沒有進修的教師。⁴ 此外，台灣亦有研究顯示了學校給予的行政支持、教師感受的特教專業知能、特教教學調整等三者之間均具有一定的互為關係。^{5 6 7} 因此影響教師的特教教學調整因素可能眾多，本研究將會從質性分析的方法，去探究影響澳門普通學校教師特教教學調整的因素。

三、研究設計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採用“立意抽樣”（purposive sampling），從三所從事融合教育的學校中，選取十位教師進行每位約 40 分鐘至 1 小時的個別式深度訪談。其中一所學校有 4 位教師，另兩所學校各有 3 位教師。這十位教師均具有教導融合生經驗，而且健談，能為訪談問題提供豐富真實的資料。為了盡量客觀瞭解研究問題之訪談結果，研究者從一所專為澳門普通學校提供融合教育巡迴支援的機構中，選取兩位融合教育支援專家，進行每位約 50 分鐘左右的個別式深度訪談，以作為教師訪談資料的補充。研究對象的人稱編碼上，會採用兩個英文字母加一個數字去代表。第一個字母為“T”或“E”，分別代表教師或專家，第二個字母為“A”或“B”、“C”，代表教師或專家所在的學校，最後的數字，代表受訪對

¹ J. W. Wood, *Adapting Instruction to Accommodate Students in Inclusive Settings*, New Jersey: Prentice Hall, 2002.

² 朱坤昱：《國小普通班教師對特殊需求學生實施課程與教學調整之調查研究》，臺中教育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0 年，第 122-129 頁。

³ 李佩蓉：《南部三縣市國中小普通班教師對身心障礙學生考試調整方式的看法與實施之調查研究》，臺南大學，2007 年，第 75-88 頁。

⁴ 洪靜怡：《國小普通班教師對學習障礙學生實施評量調整之調查研究》，臺中教育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8 年，第 85-95 頁。

⁵ 蔡樂生：《澎湖縣國民中學學校行政人員特殊教育理念之研究》，新竹教育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7 年，第 63-66 頁。

⁶ 何雅玲：《國小普通班教師實施教學調整情形與其特殊教育專業知能之關係-以特殊教育長期追蹤資料庫為例》，新竹教育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5 年，第 56-58 頁。

⁷ 陳蕙茹：《北部地區國民小學特殊教育教師學校行政支援與教學效能之研究》，臺北市立教育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9 年，第 84-86 頁。

象的名稱代號。

（二）研究工具

本研究的研究工具是一份半結構式訪談大綱，其好處是使受訪者能回答出研究問題的內容，同時又能讓受訪者充分表達自己想法，提供與訪談大綱更多有用的相關資訊。¹ 這份大綱除了含有與特教專業知能、學校行政支持、特教教學調整的現況問題外，也包括與本研究問題有關的問題。受訪教師、受訪支援專家的問題均為如下：1) 學校所給予的行政支持與教師的特教專業知識、技巧有何關係？2) 教師的特教專業知識、技巧與教師在融合教育中所實施的教學、課程、評量調整、班級經營等有何關係？3) 學校行政支持與教師在融合教育中所實施的教學、課程、評量調整、班級經營等有何關係？4) 您認為教師對融合生所實施的教學、課程、評量調整、班級經營等，與教師自己的特教專業知識、技巧及學校所給予支持的三者關係是如何？

（三）資料收集與分析

本研究依據半結構式訪談的特點，在訪談期間，會依受訪者回答時的情形，追問與訪談大綱有關的問題，訪談間進行全程錄音；訪談完結後，將錄音資料轉為逐字稿，然後將有關逐字稿給予受訪者加以確認，以達到訪談資料有足夠的效度。分析資料上，研究者參考持續比較法（constant comparative analysis）對逐字稿進行編碼，將每條訪談問題中關於教師、專家所表示的話題加以單位化，以分類方式、概念命名來整理話題，形成每位教師、每位專家對某個問題的“類別”；然後將該問題關於所有受訪者的“類別”歸納，形成該個問題最終的“主題”。² 為了達到編碼有較好的質量，研究者會對編碼所得的“主題”與訪談內容進行重覆比對，以確立最終得出的“主題”能代表被歸納的訪談內容。

四、研究結果

（一）學校行政支持與教師特教專業知能的關係

分析受訪者訪談資料，受訪者認為學校行政支持與特教專業知能存有關係，歸納主題為：1) 行政影響特教資訊的傳遞；2) 行政影響教師進修；3) 行政影響教師的溝通；4) 行政影響教師的特教態度或認知。茲述如下：

1、行政影響特教資訊的傳遞

1 位資源教師（TA4）、3 位普通班教師（TA3、TB3、TD2），認為學校行政支持程度，會影響特教資訊在同事之間的傳遞，繼而影響教師的特教專業知能。如受訪者所述：

TA4：“會啊，例如學校行政可提供資訊……學校讓我們知道，現今融合教育上的大方向

¹ 許碧勛：《幼兒融合教育》，台北：五南圖書，2003年，第113-122頁。

² 鈕文英：《質性研究方法與論文寫作》，台北：雙葉書廊，2015年，第236-259頁。

都是這樣運作.....”

2、行政影響教師進修

3 位學校行政 (TA2、TB2、TD3)、2 位資源教師 (TA4、TB1)、4 位普通班教師 (TA3、TB3、TD1、TD2)，認為學校行政支持程度，會影響教師進修的狀況，繼而影響教師的特教專業知能。如受訪者所述：

TB1：“我的專業知識都主要來自培訓而習得，而培訓是因為得到學校的支持。”

3、行政影響教師的溝通

2 位學校行政 (TA2、TD3)、1 位普通班教師 (TD1)，認為學校行政支持程度，會影響教師之間的溝通狀況，繼而影響教師的特教專業知能。如受訪者所述：

TD3：“當學校有較好的學校行政支持，同事之間就會有較好的氛圍去進行溝通，這樣也會使到同事在溝通間更快、更即時地提高大家的特教專業知識。”

4、行政影響教師的特教態度或認知

1 位學校行政 (TA1)、1 位資源教師 (TA4)、1 位普通班教師 (TB1)、1 位融合教育專家 (EC1)，認為學校行政支持程度，會影響教師對特殊教育的態度或認知，繼而影響教師的特教專業知能。如受訪者所述：

TA1：“學校行政支持得宜可讓我更加鞏固了我對這些學生在差異上的認知。”

綜合上述可知，學校行政支持程度，會對學校的特教資訊傳遞、教師進修、溝通、特教態度及認知產生影響，而這過程會使到教師的特教專業知能有所改變。

(二) 教師特教專業知能與特教教學調整的關係

分析受訪者訪談資料，受訪者認為教師的特教專業知能與其特教教學調整存在關係，歸納主題為：1) 專業知能影響各類調整；2) 專業知能影響教師對特教的認知。茲述如下：

1、專業知能影響各類調整

3 位學校行政 (TA1、TB2、TD3)、1 位資源教師 (TB1)、4 位普通班教師 (TA3、TB3、TD1、TD2)、2 位融合教育專家 (EC1、EC2)，均認為教師的特教專業知能與特教教學調整的關係，是一個因果關係，即教師的特教專業知能是“因”，特教教學調整是“果”。如受訪者所述：

TD2：“嗯，我學了有關知識後，又很少嘗試不倒的，通常都做到的。而那些方法再學了後，確實可以在實際操作中作出運用。”

2、專業知能影響教師對特教的認知

1 位學校行政 (TA2)、1 位資源教師 (TA4)、2 位普通班教師 (TD1、TD2)、2 位融合教育專家 (EC1、EC2)，均認為教師的特教專業知能的掌握程度，可影響其對特殊教育的態度或認知，最終會影響教師的特教教學調整行為。如受訪者所述：

EC1：“亦都是，如果我具有有關方面的知識，對於我面對不同學習障礙類型的融合生的時候，我會更加可以去思考如何調整會好一些。”

綜合上述可知，教師的特教專業知能的程度，可能會影響教師反思其對特殊教育的認知與態度，最終影響教師為融合生所做各項的特教教學調整。

(三) 學校行政支持與教師特教教學調整的關係

分析受訪者訪談資料，受訪者認為學校行政支持與教師特教教學調整存有關係，歸納主題為：1) 行政影響教師各類調整；2) 專業知能與行政同時影響調整。茲述如下：

1、行政影響教師各類調整

4 位學校行政 (TA1、TA2、TB2、TD3)、2 位資源教師 (TA4、TB1)、2 位普通班教師 (TA3、TB3)、2 位融合教育專家 (EC1、EC2)，均認為教師知覺學校行政支持的程度，可影響其特教教學調整行為。如受訪者所述：

EC2: “學校行政在此時間所作出的支持、決策，會很可能影響老師在實際評量中的操作，亦間接影響了對融合生評量的質素。”

2、專業知能與行政同時影響調整

2 位學校行政 (TA1、TA2)、1 位資源教師 (TA4)、1 位普通班教師 (TD2)，均認為專業知能與行政，可同時影響教師進行的特教教學調整。如受訪者所述：

TA4: “但我相信學了新的方法後，掌握新的特教知識後，只要跟學校行政說一聲，行政也答允的話，我就可以嘗試用新的調整方法去協助融合生。”

綜合上述可知，教師知覺學校行政支持的程度，可能會影響其特教教學調整行為。而且此部分額外讓我們知道，學校行政支持與教師的特教專業知能，能同時影響他們的特教教學調整行為。

(四) 學校行政支持、教師特教專業知能與特教教學調整的關係

分析受訪者訪談資料，受訪者均認為學校行政支持，與教師的特教專業知能、特教教學調整之間存有關係，歸納主題為：1) 行政支持對調整起重要作用；2) 三者關係並存；3) 專業知能與行政同時影響調整；4) 專業知能對調整起重要作用。茲述如下：

1、行政支持對調整起重要作用

4 位學校行政 (TA1、TA2、TB2、TD3)、2 位普通班教師 (TA3、TD2)，均認為行政在三者的關係中，會對特教教學調整起着重要的作用。如受訪者所述：

TD2: “如果學校行政是很支持，那麼行政也會提供了一個訊息，就算老師沒有這方面的特教知識、技能都好，但你在學校打一份工，都需要做到有關事項讓學校行政看到的。所以到最後，其實老師也會落手去做有關的調整。因此其實真的是很需要看學校行政的架構、想法是怎樣。”

2、三者關係並存

1 位學校行政 (TA2)、2 位資源教師 (TA4、TB1)、1 位普通班教師 (TA3)、2 位融合教育專家 (EC1、EC2)，均認為教師所知覺的特教專業知能、學校行政支持與特教教學調整間存在着一個並存的關係。如受訪者所述：

TA2: “我會覺得，如果這三者都能夠平衡的話，即三項因素都具有的話，那對融合教育是最好的。即學校行政是支持的，老師們又有相關的專業知識，亦都能將有關技巧在實際操作中應用、調整得到的話，則對融合教育是最好的。”

3、專業知能與行政同時影響調整

3 位學校行政（TA2、TB2、TD3）、2 位普通班教師（TA3、TD1），均認為教師特教專業知能、學校行政支持同時對特教教學調整起着作用。如受訪者所述：

TB2: “沒有其中一項也不能實施有關調整。即是說，可能學校在推動、支持，但老師不一定想做，都不會成事。或者老師想做，但學校不推動、不支持，也不會成事。或者老師想做，學校也推動支持，但老師沒有這個知識能力，也是不會成事。所以既要有學校行政支持，老師又要有心態及具備有關知識技能，才能推動融合教育的實際操作。”

4、專業知能對調整起重要作用

1 位學校行政（TB2）、1 位普通班教師（TB3），均認為教師的特教專業知能對特教教學調整起着重要作用。如受訪者所述：

TB2: “學校行政支持是融合教育實施的一個後盾，然而老師在融合教育實施中則是一個核心，因為融合教育的一切調整是需要老師真的將其知識、技能運用出來的。”

綜合上述可知，學校行政支持、教師的特教專業知能與特教教學調整等三者間都具有一定關係，而且學校行政支持與教師的特教專業知能，可能也會對他們為融合生所實施的特教教學調整行為產生影響。

五、綜合討論

（一） 結果討論

本研究顯示，學校行政支持、教師的特教專業知能與其特教教學調整等三者之間具有互為的關係。而且，研究顯示了針對學校行政支持與特教教學調整的關係上，以至學校行政支持、教師特教專業知能與特教教學調整的關係上，均可以歸納出“專業知能與行政同時影響調整”的共同主題，說明這兩者很可能可以對特教教學調整產生影響。綜合訪談結果可知：澳門普通學校中，領導層所提供的學校行政支持與教師的特教專業知能，都可以同時對特教教學調整產生影響，亦即是說，特教專業知能、學校行政支持可能是影響教師特教教學調整的重要因素。

過往，本澳曾有量化研究顯示，融合教育中的學校行政支持、教師特教專業知能、教師特教教學調整等三者之間均具有顯著的正相關，學校行政支持與教師特教專業知能均可以對其特教教學調整產生顯著的預測力；¹ 相關延伸的研究顯示，學校提供的行政支持能

¹ 董志文：《教師特教專業知能、學校行政支持與特教教學調整之關係-以澳門普通學校教師為例》，載

夠影響了教師的特教專業知能後，再影響教師的特教教學調整；¹ 學校行政支持能夠在教師的特教專業知能對特教教學調整的影響中起着調節作用。²

而本研究是以質性的訪談分析後，發現與上述量化研究有類似的結果。依據訪談結果的分析，我們可以得出以下結論：教師為融合生提供特教教學調整之前，實在需要具有良好的特教專業知識與技能，這當中需要具有為融合生提供教學調整、課程調整、評量調整、班級經營調整等各項的知識與技巧，同時也需要具有正向的特教理念與態度，因為只有具有這些足夠的知識與理念，教師才能夠為融合生實施各項的特教教學調整。同時，在支援融合生的過程中，也需要得到學校提供充份的行政支持，如果學校沒有給予足夠的各項支持，則教師就難以為融合生實施各項調整；反之，在支援融合生的過程中，學校為教師提供足夠的資訊、精神上的支持，則可能使到教師有更佳的融合教育態度與認知，繼而使到他們為融合生提供更合宜的特教教學調整。

（二） 研究限制

本研究以質性研究的半結構式訪談，以引證過往相關量化研究中所發現的學校行政支持、教師特教專業知能、特教教學調整等的三者關係。雖然訪談資料得到受訪者再度檢閱，保證了足夠的效度。然而，資料在編碼上，未能找到另一位編碼員對訪談資料進行編碼，因此研究並不能保證編碼具有足夠的一致性信度，此為本研究的不足。同時，影響教師特教教學調整的因素很多，本研究只是能夠呈現特教專業知能、學校行政支持是影響教師特教教學調整的重要因素。未來其他研究者需要在此基礎上訂立更加細緻的研究設計，以找出影響澳門普通學校教師特教教學調整的其它因素。

（三） 建議

依據上述的研究結果，本研究有以下建議：

1、教師

本研究顯示，教師的特教專業知能與特教教學調整具有一定的關係，且有關專業知能可以對教師實施的特教教學調整產生積極的影響。因此從事融合教育的澳門普通學校教師，實在有需要不斷提高自身的特教專業知識與技巧，平時可以多與在融合教育上資深的同工進行溝通，多向有經驗的同事請教，並需積極參加政府所舉辦的融合教育培訓課程與工作坊。工作中亦需要經常總結、反思自己的不足，通過政府培訓、校本融合教育培訓、自我研習等方式，努力提高自己的特教專業理念、知識與技能。對於所任職的是一所參與融合教育資助計劃的學校，教師更需要多向駐校的巡迴支援人員作出請教，因為這些融合教育專家能夠給予我們寶貴的知識及經驗。因此，做到以上這些，將有利於普通學校教師為融

《澳門研究》，2022年第2期，第95-110頁。

¹ 董志文：《澳門普通學校教師的特教專業知能、學校行政支持、特教教學調整的關係：基於結構方程模型的驗證》，載《社會科學前沿》，2023年第12卷2期，第902-913頁。

² 董志文：《澳門普通學校教師的特教專業知能與特教教學調整的關係：基於學校行政支持、實質性支持的調節效應》，載《社會科學前沿》，2023年第12卷6期，第2931-2940頁。

合生提供更合宜的教學、課程內容、評量等多元調整。

2、學校

本研究顯示，學校行政支持與特教教學調整具有一定的關係，且對教師的特教專業知能產生正向作用，同時還能對教師的特教教學調整產生影響。因此學校領導層實在需要有一套、有規劃地為前線教師提供各種不同類型的支持。依據社會支持理論的觀點，¹ 學校領導層可以為教師提供情感性、訊息性、自尊性、實質性的支持。情感性支持上，領導層需要為教師提供正向的融合教育理念與觀點；訊息性支持上，需要為教師提供各類的融合教育培訓資訊，同時在校內營造大家都有溝通合作的氛圍，容許教師之間就融合生的問題展開對話與交流；自尊性支持上，當教師在跟進融合生期間面對挫敗時，作為行政的領導者需要對有關教師給予鼓勵與安慰；實質性支持上，學校領導層需要為教師提供實務的幫助，例如允許教師採用巡迴支援人員的建議，必要時針對有關教師的工作量，通過調減上課節數、或協助教師跟進有情緒行為問題的融合生。

3、政府

政府方面，重點是向學校領導層宣傳為前線教師提供學校行政支持的重要性。除了在校長儲備培訓課程、學校中高層培訓課程中強調學校行政支持的觀點外，更需要在有關課程教授如何為教師提供各類型的支持。另外，在《學校運作指南》上，可以制訂相關學校行政支持的指引。這樣將有利於領導層為前線教師作出支援。

¹ J. S. House, "Social Support and Social Structure," *Sociological Forum*, Vol. 2, No. 1 (1987), pp. 135-146.

從社會理論的視角談自殺行為及預防策略

羅琨瑜¹

一、前言

2014年世界衛生組織提出預防自殺是全球性公共衛生議題，據統計全球每40秒有一人自殺，每次自殺有135人遭受強烈悲痛或受到其他方面受影響，包括自殺者的親友及鄰人，更有社會傳染性，自殺未遂者可能出現不同程度的身心損害甚或長期殘疾（世界衛生組織，2014，2019；於樂樂、李雨潔，2019）。根據澳門保安司（2023）向傳媒發佈的2023年全年罪案情況可見，自殺死亡個案為88人，筆者計算得出粗自殺死亡率²為12.8，已接近世界衛生組織所說的高自殺危險地區的臨界值，較過去十年間的粗自殺死亡率更高（見圖1），粗自殺死亡率有不斷上升的趨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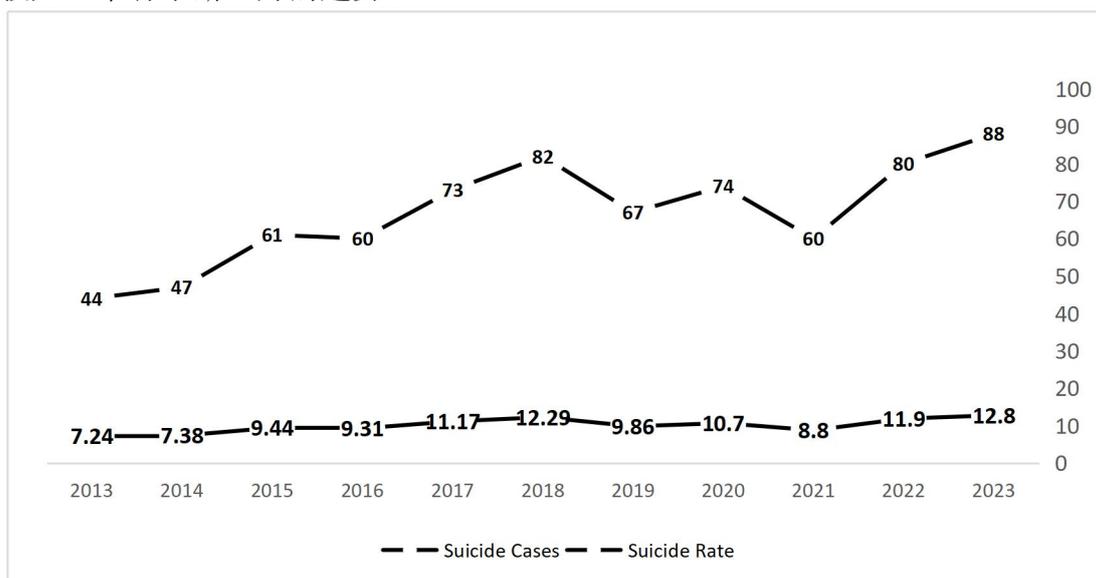


圖 1 過去十一年澳門自殺死亡人數及粗自殺死亡率統計圖（由筆者整理）

在疫情持續的影響下，對澳門的社會、經濟、市民的身心健康都帶來很嚴重的影響，市民較容易出現焦慮情況、家庭關係變得緊張，衝突會持續及增多，市民有急切性的需要

¹ 羅琨瑜，澳門社會及行為科學研究學會理事長。

² 粗自殺死亡率為自殺死亡人數/中期人口數 X100000，世界衛生組織指出自殺死亡率高於每十萬人中13人自殺死亡者屬於自殺高危險地區。

去處理疫情帶來的負面情緒及改善精神健康。衛生局（2024）指出，自殺的原因錯綜複雜，往往涉及精神疾病、心理學因素、社會經濟因素、家庭因素、人際關係因素，以及生物遺傳因素等。有不少學者都嘗試去瞭解自殺者自殺的原因，本文嘗試從不同的社會理論去探討澳門的自殺行為，從而提出預防策略。

二、文獻綜述

有關自殺的相關理論研究很多，從不同的學術領域均可作為探討自殺行為的視角，例如塗爾幹（Emile Durkheim）從社會學角度探討自殺行為、貝克（Aaron Temkin Beck）從心理認知的角度去探討自殺、黃勢璋（2012）從經濟角度去探討自殺等。筆者嘗試從社會學中常見的理論去解釋自殺的行為，這些社會理論包括：畢生發展理論、理性選擇理論、關係理論、社區賦權理論、社會網絡理論、關係理論、人本主義理論和正念理論等七種。

（一）畢生理論與自殺

韓布斯及朱莉琪（2012）認為畢生發展理論有三大特點：1.發展是畢生的過程，是一個多維度、多功能的動動態系統；任何一種行為發展都有其生長和衰退的時候，不是功能增長的單向運動，而是獲得與失去同時進行的動態過程。2.發展高度可塑，所有年齡的人都能發展某些技能以補嘗他正在降低的某種能力，他提到由於個體生活條件和經驗的變化，發展由多重影響系統共同決定，個體發展的任何一個過程都受年齡階段、歷史階段和個人生活經歷的影響。3.必須聯合有關人類發展的其他學科（例如人類學、生物學、社會學、醫學等）才能更深入地探索及理解人的心理發展。

筆者發現學者們多數會以畢生發展理論中的兩種模型來解釋人類的自殺行為，分別是 1. 選擇性優化與補償模型（Selective Optimization with compensation, SOC）、2. 控制模型。（韓布斯、朱莉琪，2012）它解釋，在人的發展裡會因年齡階段的不同而會面對不同的轉變與發展，也套用了 Erickson 的人生發展八階段的理論給予任務，一但未能適應，便會產生問題，特別提出中年人士開始進入老化階段所帶來的改變包括生理及認知機能下降，因此很多中老年人士自殺行為出現，當然某程度上也與他們患上了抑鬱症有關，具體而言，這些發現儘管人們普遍認為自殺行為和抑鬱是老化的邏輯後果，但事實上，這些經驗不是規範性的。“選擇性優化”和“補償”的研究表明有一些老年人可以成功衰老並適應不斷變化的環境，他們成功克服與老化相關的損失。“選擇性優化”是指因為隨著年齡的增加，人們會選擇一些他們認為對自己有益的活動或學習來提升自己“補償”是指當人們在生命中缺少了某樣東西，會採取另一種東西去取代之或替補，將損失減免得最少（Amy Fiske, Alisa A. O'Riley, 2016）。

從畢生發展理論中的“選擇性優化”和“補償”的解釋，當他們在自殺行為可能是他

們的思考認為自殺是處理問題最好的選擇方法，這一觀點與理性選擇理論有些類似。同時，自殺死亡可能存在著某種“補償”的意義，但這需要再進一步作實證研究。

此外，畢生發展理論還關注個體在不同生命階段的需求和滿足感。如果個體在某個階段的需求得不到滿足，例如情感需求、自我實現需求等，他們可能會感到沮喪和絕望，從而產生自殺的念頭或行為。

人的一生，有始有終，在這條人生的道路上，你怎麼走？怎樣活？雖然會受環境所影響，但最後還是取決於自己的選擇，在這個人生中，總會面對生活上的轉變，生老病死也是自然的現象，如果能早一點為中年人士灌輸生死的認知，及早讓他們做好老年化的生涯規劃，提升他們的適應能力，鼓勵強身健體，相信能大大減低他們因為轉變而帶來的煩惱與擔憂，成功適應老化，減低生理及心理帶來的困惑，甚至降低自殺行為的產生。

（二）理性選擇理論與自殺行為

理性選擇理論認為社會上的各種現象是由個體行為所產生的結果，而這些個體的行為是基於個人的理性選擇，Warms, Richard L., McGee, R. Jon (2015) 引用了 Rafael Wittek 的文章 Rational Choice Theory 中指出這種個人的理性選擇的關鍵因素有三大方面：1.個人偏好、2.信念、及 3.約束。當中有三個很重要的假設：1.個人有自私的偏好，2.最大化自己的效益，3.充分利用自身的資訊獨立行動。簡單來說，即是個人在決定之前會為自己進行充分的分析，並選擇對自己最有利的方案。在經濟學上來說即是主觀的期望效益，並設立了一個公式：

$$EU = P(S) * G - P(F) * L$$

當中 EU 是主觀利益期望值，P 是概率，S 是成功，G 是獲得，F 是失敗，最後 L 是損失，這公式最初是利用理性選擇理論運用在經濟學上，認為個人在作出選擇之前會先考慮成功的機率和所賺取的是否大於失敗的機率乘以損失，這個過程是經過個人偏好、信念及限制條件所影響。

有學者認為自殺者採取自殺的行為及方式是經過理性選擇，考慮自殺死後對其本身不會帶來效益，而採取什麼形式去進行自殺會受到自身的偏好所影響，例如夠不夠快、痛不痛等等。而且自殺者在剎那間的情緒失控情況下，個人的思考會變得較為偏激，雖然他們會為自殺的行為進行效益分析，當下他們可能以為死了對他們來說會更好，但因為危機的時間很短暫，沒法讓自殺者有深思熟慮的機會，同時因為他們將注意力他們往往會作出了不合理的決定或低估了自殺的後果，例如：一些犯罪後而自殺的人。有學者 Pratt 認為行為的結果並非完全都依據個人理性判斷，個人的衝動、自我控制、經驗、正式與非正式的社會控制等等均會對之影響 (Pratt, 2008)。

許明耀、楊曙銘 (2017) 曾從理性選擇理論來探討員警酒後駕車的現象，並利用蔡德輝、楊士隆 (2017) 提出的情境犯罪預防方法，以一個有系統、完善的方法對犯罪環境加以管理、設計以阻絕犯罪的發生，目的並非去改變犯罪者的意念，而是去阻擾其犯罪的進

行，結果發現除了個人特性外，當下情境狀況也對於行為決意過程中扮演重要的關鍵。雖然有些國家會將自殺視為犯罪行為，目前仍有好多國家及地區就自殺是否犯罪未有很清晰的界定，但情境的介入某程度上可為自殺者提供更多的預測來計算得失，從而達到阻擾自殺行為的發生。但筆者認為這理論所指的“理性”並非我們常說的在客觀的條件下，不受個人情緒所影響的思考，而是充滿著個人色彩在內；正如筆者工作中常遇到不少自殺個案認為自己的自殺行為是經過深思熟慮，這種深思熟慮的想法往往會讓個案誤認為自己是處於理性的情況下作出自殺的決定。顯然對他們來說，他們所認為的理性是來自於自殺者的主觀判斷和有限度的。

（三）社區賦權與自殺行為

根據宋暉（2014）的解釋，社區賦權是指培養社區能力，賦予社區以自我發展的權力。Wallerstien & Bernstien 在“社區賦權、教育參與和健康簡介”的文章中提到社區賦權是作為社區衛生改革的基礎，他們認為社區賦權是一種社會行動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個體和團體會在社會和政治環境的改變情況下去採取行動，以掌握自己的生活，而這種改變的過程可能發生在地區、機構和基於個體和團體所存在的社區中，賦權或社區賦權是一種首選用法，因為賦權發生在社會環境中，因此體現了互動的變革過程，其中，參與變革的人們的機構和社區也發生了轉變。社區賦權建設不是針對個人和社區以及整體社會需求，而是針對個人和社區變革，同時，社區賦權是社會轉型過程所必需的，他們認為因應社區的多種定義，以及我們如何對待社區工作（從社會計劃到社會行動以及不同地方的發展）的差異，也影響了我們實施綜合公共衛生模式的方式。如果沒有社區對話和圍繞問題定義和解決方案的決策參與，政策變更（無論是社會經濟因素還是特定風險因素的減少）都無法促進社區賦權（Wiley & Sons, 1994）。

在生活中，會很多問題發生在社區中，而我們需要就這些問題現象給了命名及定義，探究問題的成因及尋求解決的辦法，並採取行動，當中會涉及到社區參與。李聲吼（2007）認為人們能對自己的生活表達意見或積極參與，即是賦權，仍是社會工作實務中的一個焦點，並提出了賦權理論有兩個假設：

- 1.所有的人類具有潛能，即使在極端挑戰的情景中；
- 2.所有人類會遭受某種程度的失能情況，社工應用賦權原理，在工作上聯結能力和失能（Powerlessness）以使案主與環境在轉變的過程中能得到協助。

他認為賦權（Empowering）基本上是指一個個人、家庭或社區獲得能力或力量，並引述 Breton 在 1994 年所說：“賦權是指一個人具有能力去影響加諸在其生活上的不同力量。”

綜合而言，賦權有助於改善社區問題，以社區自殺為例，筆者認為可以在自殺案件發生的社區中，一方面灌輸有關預防自殺的資訊，教授社區市民學習辨識有自殺危機的人士，例如“生命守門人課程”，另一方面加強社區的資源運用及在社區中增加“珍惜生命、預防自殺”的宣傳，期望將珍惜生命變成社區文化之一，運用文化傳播的力量，由居民散播

開去，通過社區居民或社區組織的共同參與，塑造珍惜生命社區環境。

（四）社會網絡理論與自殺

張慧儀（2004）歸納了國內外學者就有關社會網絡的定義，認為社會網絡是指人與人之間的接觸所形成的社會關係，個人所認定互有親密關係的人形成社會網絡的結構，其結構可解釋個人的社會行為。它可以區分為結構面的網絡結構與行動面的網絡功能，而且不同的網絡結構會影響到網絡功能。在網絡結構的特性中，包括：社會整合、組成成分、關係品質、大小、頻率、互惠性、強度、持久度、密度、同質性等。Borgatti & Ofem（2010）提出社會網絡分析中的關係類型學說，在關係的類別裡提出三種關係類型，分別是相似性（Similarities），例如同一地區、同一個屬會等；社會關係（Social relations），例如血緣關係、朋友、上司、同儕等；精神關係（Mental relations），例如情感、認知等。在社會網絡的闡述了它的組成部分，提出了領域和層次的解釋，包括二元層次（Dyad level）、結點層次（Node level）、組織和網絡層次（Group/network level）。

由此可見，從社會網絡理論的建構來說，個體自己本身及他的周圍都存在著不同的結，是一種結構形態，說明在社會環境中所存在的關係是可以拆解成不同的部份來解釋，以弱連結為例，如果個體的連結是弱連結較多，即反映著個體所獲得的社會支持或較難獲得社會資源，依據社會網絡理論的論述，我們可以把自殺者視為存在著社會中的一個結，並由此作為延伸和結相連的對應部分有哪些，來分析自殺者所處的環境是否能獲得我足夠的支援，這和關係理論有著相依的關係，就有如協助案主進行心智圖（Mind-Map）。

（五）關係理論與自殺

從關係理論的角度來說，個體需要與其他人聯繫，而聯繫的好與壞不是取決於結果，而在建立關係中的過程，提及到社會關係是人格發展的核心，如果在建立關係中有一個積極的歷程，那人們的人格發展會變得非常積極的結果。周育勝（2015）特別地強調在諮商過程中的關係取向對輔導的影響，藉以瞭解在諮商輔導的過程中諮商者與個案之間所呈現的關係模式，輔導成效受關係模式所影響，例如依附、情感轉移等，甚至在諮商中建立同盟，這樣有助於同理生活困擾，進行生命課題的探索與協助案主洞悉自己。

由此可見，面對自殺危機的個案，諮商員需與個案建立良好的諮詢關係，並且能讓個案在這個諮商輔導的過程中獲得情感的依附，甚至是諮商員與案主能成為同盟，共同解決和面對個案的問題，這樣更能與個案進行生命探索與協助案主洞悉自己，深入探討自殺背後的意念及生命意義。

（六）人本主義理論與自殺

人本主義是用來研究整個人，它是對整個人的研究和理解的途徑，是屬於人類整個生命的課程，需要對人整個生命歷史去瞭解，當中人本主義與存在主義存在著很重大的關連，是探討人存在與意義的學問，更確切地說，存在主義是構成人本主義心理學的基本哲學思想，並與馬斯洛（Maslow）的需求層次論中提到人的存在是有被接納和歸屬的需要，有自

我實現的傾向有關，羅·洛梅（Rollo May）認為人存在是有其目的性和意圖性，是自我和動力的核心，人類經歷了自己的身份，即自我的認同，因此他認為以人為中心、自我等是人本主義心理學的重要觀念，並認為人有發展的潛能，有改變自己的能力，他認為人的創造力是人本主義心理學的核心概念（Buhler, 1971）。

因此，筆者認為我們可以採用人本主義理論的核心思想，以當事人為中心，運用同理心、瞭解自殺者自殺背後的原因，找出讓個案自己的核心問題，瞭解個案的需要為首要的任務。再配合正念理論來處理自殺者的情緒。

（七）正念理論與自殺

正念練習可以追溯到 2500 年前的佛教傳統文化，早期的佛教的四念處或四念住，在佛教傳統的靜心分類中，四念處靜心可分為“止的靜心”和“觀的靜心”，有兩個有趣的研究檢驗了正念靜心對於處在情緒情境中的注意力控制能產生干擾作用，研究一，以 28 位正念靜心者觀看會激發情緒的照片，照片出現 1 或 4 秒後會聽見聲音，他們需盡快地辨別聲音的高低，結果發現正念靜心經驗愈多的受試者，愈快能辨別聲音的音調，以此來推斷較不受照片透發的情緒干擾，研究二則以 82 位參加者分為正念靜心組、放鬆組和後備控制組，結果顯示，從情緒干擾作業來看，相對於控制組和放鬆訓練組，正念靜心組在七週訓練後，對於來自不愉悅圖片的情緒干擾顯著減少（溫宗堃，2017）。Sipe, W. E., & Eisendrath, S. J.

（2012）提到的論述主要是要描述正念認知療法的運用機制及如何將這治療法作為調節和控制情緒和焦慮病患者，並論述有關的這理論的最新發現，他們提到正念認知治療法對於抑鬱症患者預防病情復發有幹預的作用，它的功效與抗抑鬱藥相似。陳語、趙鑫、黃俊紅、陳思佚、周仁來（2011）的論述提到正念冥想對情緒有調節的作用，可調節個體的負面情緒，促進個體正向情緒，提出“再感知模型”、“正念應對模型”、“推動性上升螺旋模型”以及“正念情緒調節模型”，他們從生物學的角度解釋正念冥想可以促進左側前額葉腦區啟動增強，涉及的腦區主要包括背外側前額葉皮層（DLPFC）和背內側前額葉皮層（DMPFC）。

面對著自殺危機的人，當他們意識到無法再承受任何情緒的時候，易對生命產生無望感，而無望感是預測自殺行為與自殺意念的重要指標（Smith, Alloy, & Abramson, 2006）。因此，筆者認為正念理論可以處理自殺者的情緒，是可以減少對情緒刺激的延長反應，能對情緒能產生調節的作用，讓有自殺意念的人先處理其因壓力或悲傷所帶來的情緒有助延後他們採取自殺行為，這理論可運用在處理經常有自殺想法的人作為預防自殺的介入。

三、總結及建議

關於自殺理論的多樣性及其在分析個別自殺事件和廣泛自殺現象時的參考價值，從精

神分析、社會學、經濟學、生物學到綜合性的觀點，它們各自為我們提供了不同的解析視角。當我們多了解這些理論，相信能為從事教學和心理諮詢工作的教師和輔導師具有很大的助益，也可以幫助我們更全面、深入地理解自殺行為，並為預防和干預自殺提供有力的理論支援和實踐指導。

從上述七種社會理論來看，筆者認為可以分為解釋自殺行為的理論和介入處理的理論兩大類，解釋自殺行為的理論包括：理性選擇理論、畢生理論、社會網絡理論，而作為介入處理的理論包括：關係理論、社區賦權理論、人本主義理論和正念理論。綜合上述文獻，筆者就自殺問題，提出若干建議：

（一）如果要就自殺行為進行干預，需要從正面的態度與自殺者探討自殺的行為，並嘗試提供自殺者一些有助益的資訊，讓自殺者能有更豐富的資訊讓他們作出理性分析。

（二）運用情境界入，讓自殺者能為自己當下決定進行預演，從而獲得更多的預測結果來計算得失效益。

（三）早一點為市民灌輸生死的認知，及早讓市民做好老年化的生涯規劃，提升他們的適應能力，鼓勵強身健體，相信能大大減低他們因為轉變而帶來的煩惱與擔憂，成功適應老化，減低生理及心理帶來的困惑，甚至降低自殺行為的產生。

（四）提升社區中個人、家庭、社區組織對自殺行為的認識和介入方法，將生命守門人課程變成家傳戶曉的知識，提高市民對自殺者的辨識：

（五）多利用移動通訊平臺例如 Wechat、whatsAPP 等設立社區群組或大廈群組，增加社區居民間的交流與互動，增加睦鄰關係，以便達到及早發現、及早介入、及早預防的功能：

（六）社區組織主辦一些有關應對社區自殺問題的討論會議，讓社區市民發表意見及共同參與。

參考文獻：

- 1.於樂樂、李雨潔（2019）。2019年9月10世界預防自殺日：共同行動 預防自殺。取自網址：<http://218.194.248.211/article/print.asp?id=1161>
- 2.世界衛生組織（2014）。預防自殺:全球要務。取自網址：https://iris.wpro.who.int/bitstream/handle/10665.1/12828/9789290617488_chi.pdf?ua=1
- 3.許明耀、楊曙銘（2017）。從理性選擇理論探討防制員警酒後駕車策略。藥物濫用防治，第2卷第3期，633-89頁。
- 4.韓布斯、朱莉琪（2012）。人類心理畢生發展理論。中國科學院院刊，第27卷，78-83頁。
- 5.李聲吼（2007）。多元文化能力在社會工作實務上的應用。社區發展季刊，第117期，130-142頁。

- 6.宋 暉（2014）。社區賦權：當代社區的傳播和文化實踐。人文雜誌，第 3 期，108-112 頁。
- 7.周育膝（2015）。關係取向心理諮商之歷程分析—以一位國小中年危機教師為例。中華輔導與諮商學報，第四十二期，1125-156 頁。
- 8.黃勢璋（2012）。自殺的經濟分析。國立政治大學財政學系博士論文。
- 9.陳語、趙鑫、黃俊紅、陳思佚、周仁來（2011）。正念冥想對情緒的調節作用：理論與神經機制。心理科學進展，第 19 期，第 10 卷，1502-1510 頁。
- 10.張慧儀（2004）。社會網絡理論之探討。網絡社會學通訊期刊，第 37 期。
- 11.溫宗堃（2017）。淺談正念閱讀。佛教圖書館館刊，第 62 期，33-37 頁。
- 12.政府研未來三年醫療人手需求。（2020 年 10 月 30 日）。澳門日報。A14。取自網址：http://www.macaodaily.com/html/2020-10/30/content_1471506.htm
- 13.澳門保安司（2023）。保安司司長向傳媒發佈 2023 年罪案情況。取自網址：https://www.gss.gov.mo/pdf/2023_C_full.pdf
- 14.澳門衛生局（2024）。衛生局發佈 2023 年第四季自殺死亡監測結果。2024 年 1 月 29 日。<https://www.gov.mo/zh-hant/news/1040741/>
- 15.羅琨瑜（2022）。澳門中年男士焦慮狀況、求助態度與自殺意念的相關研究。澳門聖若瑟大學健康科學學院社會工作學碩士論文。
16. Amy Fiske, Alisa A. O'Riley (2016) . Toward an understanding of late life suicidal behavior: the role of lifespan developmental theory. *Aging & Mental Health, Vol. 20, No. 2:* 123-130.
17. Buhler, C. (1971) . Basic theoretical concepts of humanistic psychology. *American Psychologist, 26* (4) , 378-386.
18. Pratt, T. C. (2008) , Rational Choice Theory, *Crime Control Policy and Criminological Relevance, Criminology & Public Policy*, Washington State University.
19. John Wiley & Sons (1994) . Introduction to Community Empowerment, *Participatory Education, and Health. Health Education Quarterly, Vol. 21* (2) : 141-148.
20. Smith, J. M., Alloy, L. B., & Abramson, L. Y. (2006). Cognitive vulnerability to depression, rumination, hopelessness, and suicidal ideation: Multiple pathways to self-injurious thinking. *Suicide and Live-Threatening Behavior, 36:* 443-454.
21. Warm, Richard L., McGee, R. Jon (2015), *Theory in Social and Cultural Anthropology: An Encyclopedia Account*. EBSCO Publishing: 688-689.

《澳門新視角》徵稿啟事

一、《澳門新視角》係澳門青年研究協會編輯出版的學術理論性刊物，國際刊號 ISSN: 1995-8250。

二、《澳門新視角》以“研究青年、研究澳門”為宗旨，推動本澳學者特別是青年學者的學術研究與交流，力求發揮學術理論服務社會的基本功能。

三、本刊暫定為不定期出版，內容涉及政治、法律、經濟、文化等方面的社會事宜。第三十五期將會爭取在 2024 年 11 月出版。

四、本刊除發表本澳專家學者的有關論述外，歡迎外地專家學者惠賜有關論文，提供訊息及資料。

五、《澳門新視角》編委會成員為澳門青年研究協會全體理事。

總編輯：劉成昆

副總編輯：江華

編輯部設在澳門媽閣街中山新邨第三座 17/D

電話：00853-2852 6255 傳真：00853-2852 6937

電郵：macaumyra@gmail.com

六、文稿一經發表，即致薄酬（大學生習作也適當支付稿酬）。本刊有權在其他場合編輯採用。

七、本刊堅持學術自由原則，文責自負。所發表觀點不代表本會及編輯部意見。

八、本刊只接受通過電子郵件（本刊編輯部電子郵箱為 macaumyra@gmail.com）以文字檔傳來的稿件，手寫稿件一律不收；由於版面的原因，每篇稿件字數請控制在 5,000 至 10,000 字。

九、本刊特設“學者微語”欄目，以發表短小精悍、觀點獨特鮮明的學者文章，每篇稿件字數在 1,000 至 1,500 字。

十、本刊特設“大學生習作”欄目，並安排專家對習作進行點評。

十一、本刊編輯部對選用文稿有權進行必要體例規範工作，倘作者有所保留，請在來稿中說明。

《澳門新視角》編輯部

二〇二四年五月